目次

第一章 新關係的建立（一八四〇——六四）

一 侵畧勢力的東來

我們的討論從雅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開始，但必須先簡單說一下雅片戰爭前的中外關係。

在雅片戰爭前，北方邊疆上與俄帝國間發生通商關係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曾因通商的糾紛而引起軍事衝突和訂立條約（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圖條約）。在廣東和歐洲各國航海而來的商人進行貿易的歷史更爲悠久。葡萄牙人在一五五七年已經佔了澳門，繼之，西班牙在一五七五年，荷蘭在一六〇一年，英國在一六三七年，都各自開始以本國的船到中國來通商 這都還是在明朝的時候。法國的第一條商船到中國來是在一六

九八年（淸康熙三十七年）。美國建國最晚，對華貿易至十八世紀末葉才開始。

十六世紀遠東的海權與商業是葡萄牙人所獨霸，十七世紀荷蘭人取得霸權。到了十八世紀，英國在其東印度公司的經營下，對於遠東和中國的商業已居於首席地位了。在一七六三年（乾隆廿八年），瓦特完成蒸汽機的製造以後，英國的工業　尤其是紡織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在這以前：歐洲各國的從事『開拓事業』的『殖民家』們，雖然在所至之處對於土著的落後人民從事搶掠與殘酷的暴行，但對於遠東這一個有着悠久文化傳統的大帝國還不能不有所顧忌，只能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欺詐性的有利貿易。但是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英國的做法不同了：新興的工業資本家們有了更大的財富與實力用來擴充向外開拓的事業，同時他們有着推銷不完的商品亟望着能使遠東這個大國家成爲自己的市場。因此他向中國的發展愈來愈積極了。

但正在這時候，中國方面，滿淸政府在對外關係上是更嚴格地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一七五七年起沿海只准廣州一口和外國商船貿易（廈門、寧波、定海

本來都曾開放過）。在廣州的國際貿易也完全在滿清官方的統制之下。外國商人每年在廣州居留的時間住處與活動範圍都須遵守官定的規則，並只能和官方特許的中國商人做交易和交涉各種事件，既不能和別的商民來往，也不能和中國官府發生直接關係。一七九三年，英政府特派馬戛爾尼（Macartney）做特使，想直接和中國皇帝商量改進對華商務。這位大使雖然到達北京，但使命完全失敗了。

為什麼滿清當局採取這種政策呢？這倒不是為了預防資本主義的侵略勢力，因為直到雅片戰爭時，滿清當局對於西洋的知識可說是一點也沒有的；但其所以要堅持排外也並非完全出發於無知。原來在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封建朝代，『外患』總是與『內憂』同時出現。滿清自己就是乘明王朝內部不穩時闖進中國的，因此他更是深謀遠慮地防禦別的來自遠方的不相識的新勢力，尤其在他內部的統治愈不穩時，其防範也就愈為加緊。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向皇帝提出『防範外夷規條』，聲明其理由時說：

查夷人遠處海外，本與中國語言不通，向之來廣貿販，惟藉諳曉夷語之行商通事爲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輝（James Flint）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而漢文字義，亦能明晰。此外夷商中如洪仁輝之通曉語言文義者，亦尚有數人。設非漢奸潛滋教誘，何能熟悉？……

伏思夷人遠處化外，前赴內地貿易，除買賣貨物之外，原可毋庸與民人往來交接；與其懲創於事後，似不若防範於未萌。……㈠

由此可知，站在滿清統治者立場上所害怕的是外國人懂得中國情形，連外國人通曉中國語文都覺可怕；尤其害怕本國老百姓和外國接觸——認爲這一切都非「防範」不可。原來，專制統治者的防範外國人，其出發點是和防範本國人民一樣，同是爲了消弭足以危害統治權的因素。

在人民方面，沒有這種防範心理，所以倒是沒有排外畏新的成見的。和平的國際貿易本不會爲中國人民所排斥。如果說，後來在中國人民中出現了「排外」的心理和行動，那正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華實施侵略戰爭和經濟掠奪所造成的結果。而相反的，在滿清統治者方面，本是以「排外政策」作爲保護其政權的方法，後來看到這一政策敵不過外國人的砲艦時，便漸漸地轉而用「媚外政策

來做他保護政權的方法了。

進入十九世紀後，英國在對華貿易中仍佔第一位。美國在獨立建國後不久，一七八四年已有商船到廣東。他在中國的商業進展得很快，十九世紀初年已超過法國和別的國家，僅次於英國。各國之間雖也常發生衝突，但對於如何打開中國的門戶，是同感興趣的。這個任務自然落到了勢力最大的英國身上。俄帝國直到這時仍只在能滿洲邊境從事貿易，一八〇五年要求由海上到廣州海口與別的國家享受同等待遇，且被拒絕。

這時，滿清統治雖還保持着強盛帝國的姿態，但內部危機已經現出了。最顯著的標誌就是農村騷動的開始。從一八一〇年以後，全國各地的民變此伏彼起，雖然還沒有發展成太規模的農民戰爭，但作爲封建統治的基礎的農村經濟已經困窘，更多的農民已因生活的壓迫而參加秘密結社，漸漸捲入『造反』的潮流中，而官僚統治機構已經因腐化而日趨於無能，這一切病態是封建專制時代每當快要

滅亡時就要遇到的。因此對於外國人的要求更加深拒固絕。一八一六年英國又派阿美士德（Amherst）做大使到北京，想建立外交關係，不但毫無結果，滿清朝廷更因而下令不准以後再有外國使臣入京。

英國對華貿易本來是東印度公司所獨佔。因爲英國國內資本家大家都想來參與，所以一八三四年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獨佔權。就在這年，英政府派了諾斐爾（Napier）爲駐中國貿易監督，到廣州想和兩廣總督建立直接關係，也遭拒絕，被逼退回船上。這時，英國當局開始準備採取激烈手段了。因爲在東印度公司的獨佔取消後，中國政府的統制和限制，在英國資本家看來，便是他們開闢遠東市場的唯一障礙。如能够打破這個障礙，別的國家自然也會表示贊助。所以縱然沒有林則徐在一八三九年的嚴禁鴉片，戰爭還是可能在別的藉口下發生的。

滿淸統治者的排外鎖國政策固然出發於保守頑固的立場，但無論如何，滿淸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沒收企圖走私進中國的鴉片，是合法合理的，而英國以武力來保護這種不名譽的貿易是可恥的行爲。英國人當時不好意思把鴉片作爲戰爭的

原因，他們申訴滿清政府給他們的商人以種種『不平等』待遇，但這些仍不能成爲戰爭的合理原因。從基本上看，英國之發動這個戰爭是以武力來推展經濟的支配勢力以奴役中國人民。——這是一個侵略戰爭。因此，當戰爭一開始發動時，在廣東堅持抵抗的林則徐博得了人民的擁護。英國軍隊在各地登陸後以從事殖民地戰爭的姿態殺戮劫掠，在中國人民中第一次喚起了對『洋鬼子』的極度惡感。

但是在戰爭中中國統治者和人民間的一致並不能長久保持。因爲統治者對戰爭的態度由堅決變爲動搖，終於變爲妥協。滿清政府本是爲恐防外國勢力損害他的統治權而不惜破裂，及至戰端既開，英軍竟佔領浙江沿海，又北上威脅津沽，滿清大爲恐慌，立刻撤林則徐職，進行議和。但是又因爲究竟不知道英國實力如何，所以議和不成，忽又主戰。朝廷的決策既不定，一時打仗，一時又議和；各省長官也各自爲政，有時這省在作戰，那省却在送錢與敵請和。人民不但負担戰責，還要負担『和費』，不但受外國軍隊蹂躪，還要受本國軍隊的騷擾。這樣斷斷續續地戰爭繼續了兩年，終於在一八四二年英軍由上海進佔南京後，滿清政府

決心訂立「城下之盟」，簽訂了第一次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這種情形下，人民怎樣還會和政府一致呢？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二年廣州兩次發生人民自發的反英運動，都受到滿清官吏的鎮壓，這更是標誌着在對外戰爭中滿清和人民的立場開始分歧而對立了。當滿清政府第一次簽字於賣國條約上時，也正是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侵略前從事愛國主義鬥爭的開始。

因此雅片戰爭就成爲一關鍵：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的壓迫以此爲起點，專制統治者與人民的對立由此而加強，而拖着侵略野心的列强與中國政治之間也展開了前所未有的一新形勢。一方面在雅片戰爭開始時，外國侵略者還認爲滿淸政府是阻止他們對華自由行動的絆脚石，但雅片戰爭的結果却使他們看出，這個政府是經不起武力威脅，可以使其軟化的。另一方面，滿淸政府所堅持的排外政策也在雅片戰爭中第一次發生了根本的動搖；中國人民則表現爲不與外國侵略者相妥協的力量。——我們把雅片戰爭後二十年間當做一個階段來看，就因爲經過這二十年的發展，這一新形勢是確定下來了。在僅僅二十年後，我們就可看到，帝國

主義侵略勢力已經和滿清統治者携手合作，共同以武力對付中國人民了。

㊀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一冊，頁三八一。

二　官、民、夷

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條約中，英國得到了賠款（二千一百萬兩）和割地（香港），中國方面又承認五口通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並承認英貨入口應付稅率由中英兩國共同協定。次年（一八四三）中英間又在虎門訂『五口通商善後條款』十七條，其中最主要的是關於『最惠國』『領事裁判權』的規定。

美國雖未參加一八四〇年的戰爭，但美國商人也多從事鴉片貿易，在戰爭時期，美政府還特別派了一個艦隊到遠東來。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訂立後，美國便也乘這時機派顧盛（Caleb Cushing）爲全權公使到中國，以恐嚇和威脅的手段進行要挾。顧盛在給廣東巡撫護理兩廣總督程矞彩的照會中甚至說：『本國政府或有使中國人民再嘗戰禍之必要。』㈠其結果是在一八四四年訂立了中美望廈條

約。其中除了五口通商與英一樣外，關於『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最惠國』等等條款規定得更爲具體。同一年法國也要求依例訂約，訂立了中法黃埔條約。法國因對華商業較不發達，所以特別着重於傳教權的爭取。天主教基督教相繼被滿清承認其合法地位，於是西方列强各國的傳教士便和商品相伴隨着而漸漸潛入中國。

一八四二到一八四四這四個條約表示着滿清政府在一次戰爭失敗後，自動作了一連串的讓步，列强對華的帝國主義政策由此建立下穩固的基礎。這時，滿清政府中負外交責任的是伊里布、耆英等人。他們已漸漸失去了過去的自負不凡的驕態，所考慮的是如何滿足洋人的要求，而又不喪失自己的『面子』，至於遠大的和實質的利害，他們是顧不到的。

例如在虎門條約中關於最惠國條款的規定是：『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英一體均沾。』在訂約的中國大臣還以爲這是表示中國的寬厚，可以免得將來有爭執，不料卻開了『片面的最惠國』的先例。又如南京條約中本只規

定五口通商，並無設立租界的條文。但上海地方官吏立即答應英法美的要求，劃出一定地區成爲租界。列强豈能不感激這個政府和這政府培養下的這批官員？

但是在取得了這些便宜後，列强也還不完全滿意。在經濟上與政治上，他們發現仍有缺憾。在經濟方面合法的通商地點究只限於這五口，且只在中國的東南沿海，至於北部沿海和廣大內地，還是對洋人封鎖着，因此對華貿易在這些條約訂立後並未能如他們理想那樣立即大大擴展。政治方面，在這些條約中固然已特別規定，今後中國與有關國家進行交涉時須取平等對待的關係，但滿清政府仍拒絕外國公使入北京，因爲在他看來，這是有失『面子』的。在那時情形下，如果外國的外交人員正式入駐京城，就無異於向全國人民宣佈，九五之尊的皇帝也已經向洋人屈服了，所以滿清政府要力爭這『面子問題』，寧願在通商法權等問題上讓步。在訂立上述四個條約時，列强因集中於更有關實際利益的條文而未堅持這點，但後來漸漸地覺得，他們如要控制中國，非爭取這點不可。

侵略者在雅片戰爭後十五年又發動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七—六〇），就是

爲了使雅片戰爭中所已取得的政治和經濟權利更形擴大，更多保障。因此這又稱爲第二次雅片戰爭。爲了說明第一次雅片戰爭到第二次雅片戰爭間的中外政治關係的發展，首先要說到南京條約訂立後的廣州糾紛。

外國旣尙未能派外交人員入京，則其所接觸和辦交涉的還只是各指定通商口岸的官員。滿淸政府派兩廣總督兼理外交事務，他駐紮在廣州。中外的外交關係也就集中於廣州。在南京條約後，英國人依約要求開放廣州並進入廣州城。但條約中並無明文規定英人進廣州城。廣州人民紛紛起來抗議英人的要求，滿街紅白字帖，攻擊向英國人妥協的官員，號召紳民一致作實際準備，以武力對付進城的英人。於是廣州進城問題鬧了十多年。有些歷史研究者批評廣州人民當時阻止英人入城只是不明大體的胡鬧。固然，就那時情況看，外國人進不進廣州城，確不是怎樣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但那時候廣州人民還不能懂得帝國主義者侵略危機的性質和正確對付的辦法，因此表現爲在枝節問題上仇外的行動，那是不能怪他們

的。我們在觀察這段歷史時重要的是要看出中國人民的反帝行動的萌芽，尤其重要的是要看出雅片戰爭後，「官」「民」「夷」（也就是專制統治者、人民、侵略勢力）三者間關係的變化。

南京條約簽字後四個月，在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廣州發生英國水手與人民毆鬥，以致洋行被燒毀的事。兩廣總督祁塤報告這事件說：

英夷船隻，自閩浙駛回之後，聞住居香港，夷人詞氣傲慢。省城十三洋行原住夷人及水手，亦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搶取貨物，或凌辱過路婦女。均經地方官彈壓，尚未釀成事端。而士民蓄怒已深，爭欲得而甘心。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假托明倫堂名目，削貼告白，羅言該夷罪狀，欲與爲難。……十一月初六日（十二月七日）申時，適有紅毛黑夷水手，在十三行地面向華民買食水菓，不給錢文。賣果者向討，反被該夷用刀劃傷。衆民人在旁目擊，均爲不平。該夷自知理曲，旋即避入夷樓，將大門緊閉。衆民追呼而至，圍繞夷號爭鬧。夷人在樓上用磚瓦向下擲打。臣等聞知，卽飭地方文武前往稽查彈壓。至起更時，衆人漸散，而夷樓內忽然火起。……自初七日以後，因文武官帶同兵役在該處日夜巡查，均極安寧。夷人因見內地人民共切同讎甚爲畏懼，嗣經官兵防護撫綏，又均知感激。……㊀

從這個報告中可以看出，基本的形勢是很淸楚的：人民的反對洋人並非無因而起，官方並未能善盡保護人民之責，只是着力於撫慰洋人。

一八四三年耆英受任爲兩廣總督，他是經手簽訂中英南京條約的人。在他受任之初，卽肯定廣州反對洋人的行動『皆係無賴游棍卽俗名爛崽等輩所爲』。他又說：『民夷兩相疑懼，倘辦理稍有未協，必致重起釁端。』㉓他想把『官』的地位擺在『民』『夷』二者之上和之間，而實際的做法則是抑民以撫夷。這自然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反感。據英國人的記載，當時廣州人的揭貼有不少是直接攻擊官僚當局的。其中有一揭帖大意譯出如下：

外國强盜幹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而肉食的官員實爲之幫兇。……今年五月，外國人殺了好些中國人，尸身棄於河內，以飽魚腹。官方置之不理，視若無睹。官廳視洋鬼子如神，而輕視百姓如犬豕，以爲人命連一根頭髮都不値。他們只求保持祿位，不顧眼前事實，不加鄭重處理。千萬人民滿懷悲憤，憂思激骨，唯一的慰藉就是訴之於大庭廣衆。……㉔

由此可見，一八四六年湖廣監察御史曹履泰奏稱：『粵東官民上下其相爲冰炭也已非一日，……粵民與英夷爲仇讎，卽與地方官爲仇讎』，㉕這話並沒有說

錯。一八四六年一月，兩廣總督耆英已經向英國讓步，佈告開放廣州城，立刻引起人民的暴動，知府衙門都被反對媚外官吏的羣衆所燒掉，一時廣州入於混亂狀態。廣州開城問題就是這樣地因人民的反對而延宕着。

在這情形下，如果英國强行入城，勢必要應付大大小小的無數衝突，這使他不能不遲疑。因此他就更憎恨滿淸官吏不能全力鎭壓人民情緒，保障『條約的實施』。一八四七年，英國兵船撞入省河，實施威脅，和耆英約定兩年後開放廣州城。關於這事件，耆英向皇帝如此報告：『數年以來，於民夷交涉事件，斟酌調停，實已智盡能索，而不意猶有今日之變。撫夷愧怍，無地自容。』(六)他始終看定問題只發生在『民』與『夷』之間，『官』是在中間『調停』的立場！

雖經過雅片之戰，滿淸當局究竟還不知洋人的口胃有多大。因此在洋人的威脅迫在眉睫之時，即逆民而順『夷』，而在看到洋人已似乎『安撫』下來，人民中的反抗情緒日漸高漲時，便又覺得爲統治政權的利益打算，仍須多容納一點民意，對洋人要求也就不能不違逆一點了。現在，廣東的民情既是如此，而英國又

確乎是在廣州開放問題上容忍了許久，且最後也還是同意兩年以後再開放。這使滿清當局覺得，官的立場雖站在「民」「夷」之間而又不妨多偏向「民」一方面去一點。所以到了一八四九年英國要求遵兩年之約開放時，繼耆英而任兩廣總督的徐廣縉加以拒絕，且向英人表示：『民爲邦本，民旣不從，大皇帝亦不肯拂百姓以順遠人。』㊆當時廣州人民確已不願官方態度如何，自行編練，有十萬人之衆，準備抗擊。這使徐廣縉更覺得對英國還是以採取强硬態度爲宜，否則，這十萬人的力量就會打到自己頭上。徐廣縉向皇帝說明決策理由是：『婉拒之未必遽開邊釁（還可以向英國人敷衍延宕），輕許之必至立啓兵端（人民武力抗拒）。且阻其進城而有事，則衆志成城，尙有爪牙之可恃。（可以利用人民的力量）許其進城而有事，則人心瓦解，必至內外交訌（人民將反對政府）。』㊇由此可見徐廣縉的政策和琦善的政策出發點是一樣的：都是爲滿清統治者打算，找一條眼前能趨吉避兇的路。徐廣縉所代表的强硬政策並不眞是和當時的人民站在同一立場。

『官』站在『民』『夷』之間，操縱運用的結果，廣大人民與統治者間的矛盾到底不能消滅，『太平天國』的大起義跟着爆發了；同時外國侵略者則認為滿清官方有意煽動民間『排外』心理以對付他們。廣州進城問題雖一時擱下了，但列强提出了全面的修改條約問題，想更擴大他們在南京條約中所感到還不足的經濟與政治的權利，並準備用武力向滿清政府算一次總賬。

㈠ 李抱宏：『中美外交關係』頁四一

㈡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頁一四八

㈢ 同㈡，頁一五〇

㈣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224

㈤ 同㈢，頁一五一

㈥ 同㈡，頁一五七

㈦㈧ 同㈡，頁一六九

三 「中立」與勒索

在南京條約訂立後不足十年，掀起了太平天國的大運動，這不僅是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上的巨大波動，而且對中外關係也有重大的影響，這使得開始以其侵略的觸角探入中國的列強不能不嚴重考慮他們應採取何種態度。

洪秀全楊秀清所領導的太平天國的起義大運動開始於一八五〇年。在滿清專制統治下的饑餓的農民大衆湧進這個求生存的鬥爭，建立了政權，組織了軍隊。統治者的軍隊一遇到他，幾乎立刻就土崩瓦解。這支農民的隊伍所標榜的信仰是由基督教而改裝的上帝教，這自然很引起外國人的興趣，而尤其使他們不能不關心的是因爲這支農民的隊伍發展的神速。起義的農民由廣西出發，過湖南，入湖北，由安徽沿江而下，所向無敵，從最初起義起，不過三年，已經席捲五六省，打敗了滿清政府從四方八面調集來堵擊追剿的大軍。到了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

天國建都南京，成爲鞏固的政治勢力，與滿清對抗——中國成爲了兩個中國。

最初，外國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商人確有很多同情太平天國。他們因爲不滿意於滿清政府及其官僚機關的敷衍拖沓，不能事事如他們的意，便轉而寄希望於這接受基督教義的新政治勢力，以爲如果他能統一中國，或能開放全國准許各國通商傳教，不像滿清政府的頑固。爲瞭解太平軍眞象，當時英國公使文翰（G. B Bonham）法國公使布爾布隆（M. de Bourboulon）以及美國公使馬歇爾上校（Col.Marshall）在太平軍佔下南京後曾分別率隨員前往考察。在他們親自考察後，至少他們的有一部分隨員是得到了良好的印象。以文翰在南京所得到的若干太平天國的文件爲根據，英國在華牧師米都斯特（Medhus.）加以研究，寫出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由文翰送交英國的外務大臣，其中說：

叛亂者如能勝利，其好處可以預見到的是：全國將爲傳教與商業而開放，科學的進步也將能引入，這對給予者和接受者都有好處。如果各基督教國家幫助壓下這運動，那可說是很不幸的，因爲叛亂者有着滿清方面所絕對沒有，也絕不可能有的一種精神，一種進步的改革的趨向（由他們的曆

法可以證明）。雖然這或許還有問題，但叛亂者所表揚的基督教形式，無論如何總比中國人至今所敬奉的愚頑的偶像崇拜好得多。歐洲各國如站在敵對方面，那就很可能是去和一些在某方面說來比他們自己更好的人民作戰。滿清假使不由外國人幫助而戰勝了叛亂者（但這看來是極少可能的），他們就會變得比過去更加排外而驕橫。㊀

這個報告表現出外國人完全不了解太平天國的農民戰爭的性質。但他們能够看出，太平天國有着進步改革的趨向，爲滿清政府所遠不及。這確是事實。至於這報告中所建議的政策是：

在目前唯一的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捲入這鬥爭中，力避與雙方有政治上的接觸。但（在中國的）外國人必須準備好用足够的武力來驅敗叛亂者可能施於他們的任何攻擊，加以摧毀。

這就是所謂「中立」政策。美國法國和英國這時都同樣採取了這種維持「中立」的態度。

外國人對中國內戰保持中立自然是應該的。如果當時各國是在道義上同情太平天國方面，而在實際行動上則承認雙方爲對等的交戰團體，力避干涉中國的內戰，那可說是有利於革命的太平天國方面的。因爲正如米都斯特牧師所說，以當

時情形看，滿淸如不得外力援助，要戰勝太平天軍是極少可能的。

但我們必須進一步看出當時英美各國的中立政策的實際意義。原來決定各國政策的出發點並不是中國的政治進步，科學發展等等，而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之所以採取『中立』政策，只是爲了要觀望一下，好看淸楚究竟用什麼方法利用這一複雜的局勢爲自己取得更多的權益。

太平天國方面，對待外國人，固然因不懂得外交而處理得不好，但天然抱着革命的人民的氣節，並沒有一點媚外的表示。外國人雖然希望太平天國能開放全國，全部容納外國人的要求，但他們究竟沒有能從太平天國的領袖得到確實的保證。反過來，在滿淸方面，縱然這時對待外國人還未完全脫去在鴉片戰爭前的自尊自大的心理，但是在雅片戰爭中外國人已經有了經驗，這個政府是可以嚇得倒的。而且由雅片戰爭中產生的若干條約已成爲外國人可以作進一步要求的根據。因此所謂『中立』政策實際上就成了向滿淸政府勒索的政策。

美國政府於一八五三年訓令駐華公使馬歇爾說是『美國決定維持中立，可擇

可爲者而爲之。惟必須尊重條約的規定。對中國的統治者與其人民間所發生的一切爭執，尤須保持美國的不干涉政策，若不違反此種行動之規律，自可以儘量設法使中國處此危機之下放棄其加於中外關係的不智之束縛。』㊂這說法中所含的投機取巧的意義是很顯著的。所以英美法三國一面宣佈了『中立政策』，一面就聯合了一起去向滿清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正是利用『中國國內政治的危機』來取得權益的擴展。在一八五四年美公使麥蓮（Robert M. Maclane）向兩江總督怡良提出修約要求時，據怡良報告，麥蓮曾表示：『如蒙奏准（即如答應其一切要求），自當襄助中華，剿平反側（即助滿清剿滅太平天國），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㊃這就更顯著的是一面誘勸，一面恫嚇的口氣。

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國外交代表聯合要求修改條約，先在廣東江蘇交涉，未得結果，十月間由海道北上在大沽口外進行交涉。次年美國又特派充滿帝國主義侵略思想的『中國通』伯駕（Peter Parker）爲公使，會同英法公使繼續從事修約的要求。當時各國的要求的內容可以由英美兩國政府對其使節的訓示中知道。

英政府於一八五四年的訓令中所列各點的主要內容是：（一）要求中國把內地全部及沿海各城市開放，准許英商貿易。如不被接受，則要求揚子江自由航行，並加開放鎮江、南京及溫州、杭州為通商口岸。（二）要求承認販賣雅片為合法貿易；（三）廢除英國貨物在中國內地的通過稅。（四）要求外國使臣駐紮北京，至少要求外國使節得與中國政府中大臣公文往來。並要求各國使臣得與各省總督直接會晤。㊃一八五五年美政府給伯駕的訓令是：（一）要求美國外交官得入駐北京；（二）要求通商範圍無限制擴大；（三）要求盡行廢止一切限制美國人民在華活動的個人自由的禁令。㊄這正是向滿清政府勒索，要他全部屈服的要求。

滿清政府不能不因這問題而煩惱。因為一方面起義的農民羣衆已經用武力來向他爭取生存權利，並且要推翻他的政權；而另一方面『洋人』並沒有因一八四二年後的幾次訂約的讓步而滿足，一天天更加急燥地向他要求更多更大的讓步。——這在滿清政府看來，就是『內憂外患交迫』了。在『內憂』與『外患』兩方

面之間，也就是在人民與外邦二方面之間，他究將採取什麼態度呢？

前面已經說過了，從雅片戰爭以後，滿清統治者的態度搖擺於『民』『夷』二者之間，只是看那一方面足以直接構成對自己的生存威脅，就向那一方面妥協一下，以求苟安於一時。現在太平天國的性質既比一八四六年因開放廣州城問題而引起的人民騷動，嚴重得不知多少倍，他直接以推翻整個現存的政治社會秩序爲目的。滿清政府無論如何，斷不肯和反叛的人民妥協，非全力抗拒不可，那是確定的；因此，爲了堅持和太平天國戰爭，對洋人可以妥協，也就確定下來了。問題只是：一方面，洋人已看準這是向滿清要挾的最好時機，稍許的妥協已不能使他們滿足。另一方面看到了洋人有同情太平天國的表示，滿清又唯恐洋人眞去幫助『叛民』；究竟能否用妥協辦法改變洋人的敵對態度而建立『友好』關係，統治者是還沒有把握的。但上海的官員却首先在局部問題上作了妥協的先例。原來這時太平軍雖尙未發展到上海附近，但小刀會（上海附近人民的起義響應太平天國）已在一八五三年九月佔領上海縣城。上海道吳健章避居租界，原有的海關

不能繼續執行抽稅。英美各國又竭力阻撓重建海關，外國商船乘機拒不納稅。到了一八五六年六月，吳健章便與三國領事商議海關章程，由三國領事各派一人來主持收稅。——這樣一來，外國人竟輕輕地把這一重要海口的海關操縱到自己的手裏。這一實例更使他們相信，只要手段巧妙，完全能利用這時機向滿清政府及其官員敲詐到一切所需要的東西的。

對於三國所提出全面修約的要求，在滿清官僚中，一開始就主張採妥協態度的也是上海方面的官員。一八五四年八月江蘇巡撫滿州人吉爾吉阿在與美國公使麥蓮商談後已向朝廷提議：『茲麥酋固執十二年變通之約，欲由長江直至漢口，設立碼頭，勢將無從阻止。莫若將計就計，預派資望深重之大臣，前來議定妥協章程，允其所請。』他以爲如果『一朝決裂，（各國）乘金陵未復之際，闖入長江，諸事不復受商，動輒爲所牽制，一誤再誤，長江中又添一巨患矣。』㊅吉爾吉阿建議沒有立刻被朝廷接受，反受到『上諭』的申斥。照朝廷的意思對付洋大人要求的辦法，應該『示以撫綏之恩，折其虛矯之氣，俾不致更萌妄念，方爲妥

書。』并令官兵『於江路下游：扼守海口，毋令來船闖入，致與賊匪勾結。』[7]可見這時北京政府對洋人的基本態度是已採綏靖政策，但還懷疑他會和太平天國合作。而吉爾吉阿身在江蘇，直接當着太平天國的威脅，又直接和外國的公使接洽，却覺得洋人是可以相信的，因而更加力主妥協爲有利。他又說『若云（各國）助逆犯順（意爲助太平天國而反清），則長江現爲賊踞，何妨藉此橫行，而乃赴粵赴滬，并赴天津，必待請命而行，似又并非惡意。』[8]這是說，外國人來求修約，足以表示其對政府有好意。如果不接受這好意呢？『該商等（外國人）若藉端起衅，抗稅不交，則不但上海一營立即斷餉，即金陵京口紅單船等營，亦皆無協濟。』[9]這是說：爲了要進剿太平天國，不對外妥協將蒙不利。事實上，當時滿清財政已相當困難，極不易支持與太平天國的嚴重的戰爭。海關上向洋商所抽的稅是軍餉的一大來源。上海官員親切感到這種利害關係，所以首先主張對外妥協，而且實際上首先如此做，寧願把上海海關管理權拱手讓給外國人。

到了這一年十月，英美公使坐船北上到大沽口外，要求和北京政府直接談判

時，負責進行交涉的崇綸等接洽後也奏請「察其情理可原者，交辦理夷務督撫大臣，酌照原定條約悉心酌覈，妥爲酌辦，以示懷柔之意。……若一無所遂，必致羞憤而返。雖不敢遽肆鴟張，惟南氛未靖，倘再暗生詭譎，辦理更爲棘手。」㊉這也是主張對外妥協。以革命人民爲死敵的滿清政府這時已確定了對外妥協的方針，但因對外國人的疑慮尙存，還不願一下滿足他們所勒索的全部內容，只肯作局部的較少讓步。所以一八五四年的修約談判沒有結果。

列强決心乘這時機逼迫滿清一次作全盤讓步，談判旣仍無效，便進而訴諸武力。但因一八五四——五六年英法兩國都捲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不可能調兵到遠東來。所以對中國戰爭延到一八五六年底借廣東方面的一件小事端而發動。（所謂「亞羅船」事件。）美國雖因國內政治原因而未參加用兵，但美國外交使節與英法實際上完全採取共同步調。又有俄國也來參加，派了個公使到香港與英法美共同商議進行對中國的要挾。當一八五七年英法軍隊北上時，四國的使臣都隨軍

同行。所以第二次雅片戰爭雖是由英法聯軍所執行，却可說是英法美俄四國共同策動的。

㈠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 317

㈡㈢㈣㈤ 分見李抱宏『中美外交關係』頁九四　頁五一，頁八三，頁五五。

㈥㈦㈧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上，頁一七六，頁一八〇，頁七八。

㈨㈩ 均見李抱宏著，頁五四。

四 打與拉

我們必須認清這一次戰爭的動因。在長江流域滿清與太平天國大戰方酣、相持不下之際，發生了這對外的戰爭，這決不是因爲滿清以堅決態度對付侵略的外國的原故，相反的，這只是因爲他雖已願意對外讓步以求全力對內作戰，但他所應許的讓步還不够使外來侵略者滿足，而只足以鼓勵他們的慾求。同時這也決不是因爲各國已變更其對中國內戰守「中立」的政策，改而完全同情太平天國，所以才發兵威脅滿清，恰恰相反，這倒是因爲各國已看出革命的太平天國未必能盡如其意，寧可還是和滿清打交道，其用兵正是爲了使滿清更爲馴服。

所以對外戰爭中，滿清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態度遠不如對太平天國的戰爭那樣積極，根本沒有出全力抵抗，一被打痛，立刻就要求和議，不惜作原來所不肯作的巨大讓步。英法聯軍於一八五七年十二月進佔廣州城，（在廣州實行軍事統

洽凡三年，但仍恢復被俘巡撫柏貴之職，只要他順從合作，這一事給滿清政府的印象一定是很深刻的。）次年北上，五月攻下大沽砲台，入白河口，九天後卽攻入天津城。軍事行動也就停止，轉入外交談判。六月間與俄、美、英、法四國的條約均行簽訂，是爲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的內容把十六年前的南京條約的規定擴充了無數倍，上舉英美的修約要求大致上是完全做到了。簽訂天津條約的桂良、花沙納向皇帝的報告中說：『此時夷人窺破中國虛實，凡我國家艱難困苦情狀，瞭如指掌，因更大肆猖獗，毫無顧忌。』又說：『國家內匪未盡，外患再起，徵調既難，軍餉不易』，所以決不能戰。又說：『伏思該夷之與中國齟齬，均由疑慮所致，今番感激聖恩，從此待以寬大，示以誠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國家兵力，亦是覊縻一法。』㊀——在侵略者面前的怯弱心理，對人民決不和解，對侵略者則不敢言戰的心理，向侵略者討好結交的心理，於此都暴露無遺。

天津條約中中國的實際權利的喪失，滿清政府還不覺得怎樣，最使他傷心的是從此外國公使將入居北京。這是滿清政府認爲最失『體面』不過的。（實際上

他是害怕人民將由這事實而相信皇帝所居的京城已經向洋人屈服，因此便更輕視朝廷。）於是在英法軍從天津撤走後，滿廷又想經過談判來改變條約中關於這點的規定。這是列强所不願答應的。到了一八五九年，英法公使又至大沽口，擬入北京交換兩國政府對天津條約的批准。因爲進京的路線問題發生爭執，把守大沽砲台的僧格林沁下令發砲轟擊。這時英法兵力不多，受到重大損失而只得退却。同時到大沽口的美國公使按照滿淸政府指定路線而入京，英法則再度宣戰。一八六〇年聯軍又北上重行進據天津，並繼續前進，直下北京城，滿淸首都爲聯軍佔領。這一戰役固然是由滿淸所挑起，但他並無全面對侵略者作戰的决心和準備，所以雖至首都失陷，皇帝也逃到了熱河之時，却一點也不去調動在南方進攻太平天國的軍隊，仍甘願向外來侵略者再一度訂立可恥的城下之盟。這是北京條約。除了確認天津條約的一切均屬有效外，又加重幾分。

經過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侵略國家得到了，而滿淸甘心情願地承認了侵略國家要求的一切。從此以後，新的關係是確定下來了，在滿淸政府方面，對於外

來侵略者抱綏靖妥協態度，而對於人民則堅持武力鎮壓，這樣的政策已不再有什麼動搖了。在外國方面繼續培養和馴服滿清政府，經過這一個政府來源源不絕地搾取中國，這樣的政策也不再有什麼動搖了。如果說，「不打不成相識」，那麼經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滿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的關係的發展確是可以適用這句話的。

滿清以前害怕外國人以商業與宗教的觸角深入中國內地，現在讓步了，以前堅決拒絕外國使節入駐北京，現在也讓步了。滿清之所以作這些大讓步，本是出發於卑怯的心理，不惜任何代價以避免外來的危機，俾可以集中力量鎮壓內部；但他立刻發現，由於他向洋人做了這些讓步，他甚至還可以從洋人得到很大的助力。

不難明白，爲什麼在最初，如前所述，對太平天國表示讚美並宣佈對中國內戰「中立」的外國人，到了這時，又一次打敗了滿清，訂立了天津條約與北京條

約後，態度完全改變了。他們開始咒詛太平天國，而且開始在實際上支持和幫助滿清了。

研究中國近代外交的麥克納爾（H. F. Mac Nair）敍述當時的情形說：『英國和法國在一八六〇年在北方與滿清作戰，但漸漸地可以清楚看出，他們是願意在南方幫助滿清政府的。』㊀別的外國作家也有指出這一點的，如倍爾士上校（W. L. Bales）說得很明確：『在英法於一八六〇年佔領北京，結束了「亞羅戰爭」（即英法聯軍之役的別稱——引者）後，列強對叛亂者的態度起了顯著的變化。英國和法國（其實還有意國——引者）開始公開支持滿清政府』。㊁同樣的，梁啓超也曾看出咸豐十年（即一八六〇年）是列強態度改變的關鍵。他說：『英法美各國皆一變其方針，咸欲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亂，具述此變以請於政府者，實咸豐十年事也』。㊂事實上，這種轉變確是很顯著的。一八六一年，即北京條約訂立的後一年，一個英國官員密其（A. Michie）又到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考察，他的報告已完全和前引一八五三年英國人的考察結論不同，他說：『我毫

不存希望，有什麼好事情能從叛亂運動中產生。沒有正經的中國人會和這運動合作。他們（太平天國）除了燒殺破壞以外什麼也不幹。」㉝

至於美國，一八六一年冬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奉派爲駐華公使，他是根據天津條約入居北京的第一任美國公使，和中國外交史的關係異常密切。他雖在國內支持林肯總統，以宣揚自由平等而馳名，但他一到中國，對於中國人民爭自由平等的太平天國立卽表示敵意態度，而竭力支持那壓制中國人民的自由平等的滿清專制政府。他主張，「對於清廷不但應以合法的政府視之，且因人道關係，對於清廷之壓平內亂，也應給以道義上的扶助。」㉞他的主張爲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所批准。

各國之所以對於太平天國的態度激變，有人以爲，這是因爲太平天國後期的作爲一天天更壞，所以喪失外人的同情。固然，太平天國因爲只是單純農民的戰爭，就不免包含許多弱點，在定都南京後愈久，其弱點也愈見暴露。但是這些弱點在初期也並非不存在，那時外國人是把太平天國的行爲和滿清的行爲相對比而

看出前者實比後者進步。這種對比形勢實際上在太平天國後期仍然存在。滿清統治者的守舊、腐敗、貪汚和昏庸難道在進則太平天國的長期戰爭中有所改革麼？如果說，太平軍在作戰中有燒殺破壞的行爲，那麼滿清軍隊對於平民燒殺破壞刼掠其實是更加厲害。所以這種理由決不足以解釋爲什麼恰恰在一八六〇年外國人的態度突然改變。眞正的原因不能不說是：列强既然已經從那自命爲代表『正經的中國人』而與叛亂的『下等人』爲敵的滿淸政府得到了大的讓步，於是他們就願意和『正經的中國人』立場一致了。他們既然已經使得這個政府屈服，他們便樂於承認牠是個『合法的政府』，而要給以『道義上的扶助』，並且認爲幫助牠去屠殺中國人民乃是合於『人道』的了。他們要能安然享受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所給予他們在全中國範圍內的權利，就必須使太平天國趕快失敗，讓滿淸趕快完成『統一』。一八六一年初，英國和美國根據條約首先到漢口、九江設立商埠，因此幫助滿淸來掃除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的勢力，更成爲首要的任務了。

蒲安臣公使在致美國駐滬領事訓令中說得更淸楚：『目下中國政府當局似很

有維持秩序和各國條約權利的傾向，我們應贊成中國自行組織軍隊而雇用外人訓練華兵關於平時與戰時的技術，不過這些教官最好是向其他訂約小國聘請。』㉑這裏是把可以在軍事方面支持滿清政府的政策明白寫下來了。雖然附以條件說：『最好向其他訂約小國聘請』，但後來實際上出面作軍事援助的人正是屬於訂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這幾個『大國』。

浦安臣的這些表示最分明不過地說出了列强政府到這時已把『中立政策』的外貌完全卸脫。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標還榜着中立政策的時候，列強在軍事上與滿清合作的事實也已經有過的，不過這種合作以前只是個別的、局部的、非正式的，到這以後，是成爲正式的明確的列强政策了。

在北京條約以前，已有過些怎樣的軍事合作的事實呢？

前文已提到一八五三年上海的小刀會曾佔領上海縣城響應太平軍。那時候在『租界』上的英法美等國卽集合軍力，起先仍表示『中立』，只說如果小刀會來

攻租界，就要加以反擊。但到了第二年上海的滿清官吏拱手把海關權讓給外國人後，租界軍隊就積極參戰了。法國軍首先動手，用大砲轟擊爲小刀會所佔領的縣城，使得『官兵』很快地把這次小刀會的起義撲滅了下去。——這是外國兵幫助淸兵進剿人民的最初一次。

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國的名將李秀成大軍進迫上海時，北方與英法尚在戰爭狀態中。但是在上海的防守上，租界的洋人兵力與滿清軍隊是完全協同一致的。上海的所以未被太平軍攻破，主要是得洋兵之力。但是這時租界的外國正式軍隊究竟還只能限於消極的防禦，不便作積極的進攻以逐退太平軍。於是就有一個美國人華爾（F.T. Ward）出來向滿淸方面接洽，願意招集一批外國兵士，代爲進攻松江城，要求以三萬兩銀子爲報酬。這個交易當時就談定。華爾率領了一百個兵士（其中有英國的水手和菲律賓人）進攻松江，第一次失敗了，第二次勝利了。以松江爲基地，他又會同淸兵共同進攻靑浦，却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但是松江的勝利已使他贏得了上海官紳的信任。他便受委托在松江招募了一批中國人當兵，

由英國人和美國人爲教練，加以新式武裝的訓練。

一八六〇年時，江浙的滿清官員已極力主張借用外國兵助戰。但因爲北方和英法間既尙在戰爭狀態中，他們不敢正式和外國商量。其聘用華爾只算是通過地方紳商的關係，但實際上自然還是由官方主持的，而北京政府對這也採取默認的態度。至於英美各國的態度如何呢？『保護上海租界』之說被用來作爲在上海和滿清軍合作的藉口，但是華爾以外國人組成之部隊受滿清的雇用却顯然有違『中立』的原則。所以其時，英國方面曾向美國領事控訴華爾誘引英艦上的兵士，美領事卻以違反中立政策的理由，把華爾拘囚於美艦上，可是却又讓華爾泅水逃出去，繼續在松江練兵，也仍舊有英國的「逃兵」參加。由此可見，華爾及其助手們在一八六〇年的助戰，雖然在形式上是以個人資格，却是爲官方所默認的。由此可見，列強已經有了天津條約在手裏，雖又在北方動武向北京城進攻，確是同時已存心在南方幫助滿清了。

因此，到了北京條約訂立後，各國用不着再費什麼考慮，立刻放棄了原來的

「中立」的外貌，法國公使甚至向滿清當局正式表示願意助平『匪亂』，俄國公使也請許俄兵助戰，且代美國商人要求爲中國政府運送漕米。於是滿清政府也就認眞考慮借用洋兵問題了。

把一八六〇年前後列强對太平天國和滿清政府的態度的變化簡單說起來，就是：對於太平天國，由拉變成打；對於滿清，由打變成拉，——其所以在一八六〇年一直打到他的京城，本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拉。

㊀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上，頁二一一—二一二。

㊁ Mac 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 351

㊂ Bales: Tso Tsung-T'ang（左宗棠傳）P. 189

㊃ 梁啓超：『李文忠公事略』卷一。

㊄ 同㊁ P. 349

㊅ 李抱宏：『中美外交關係』頁一〇三

㊆ 同㊅頁一〇四。

五　軍事合作

前文曾借『不打不成相識』一語以表明經過英法聯軍以後的滿清與列強的關係。滿清當局這時對於列強究竟得到什麼新的知識？他們從前總担心，西方列強侵入中國，將如中國歷史上的每次蠻族入侵一樣，也和滿州人自己當初入侵中國一樣，在中國建立一個新的朝代。但現在他們放心了。英法聯軍在一八六〇年甚至已到了北京，但是條約簽訂，聯軍撤退，內部的統治秩序毫不變更。所以一八六一年一月負責辦『夷務』的恭親王奕訢等的奏文中說：『自換約以來，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尙執條約爲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似與前代事稍異。』試把這種打官腔的說法改得平易一些，那無非是說，外國人仍舊尊重我們的政權，不會從我們手裏搶去土地人民的統治權，所以和他們把關係拉攏好是有益的。由此進一步更說：『綜計天

下大局，是今日之羈夷，譬如蜀之待吳。蜀與吳，仇敵也，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再說得清楚一點，便是：『就今日之勢論之，髮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肘腋之憂也。英國……肢體之患也。故滅髮捻爲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㊀——這已是明確地把『聯吳伐魏』來影射聯合列强、消滅太平天國的政策了。（『髮』指太平天國，『捻』爲其時在北方與太平天國呼應的農民起義組織）。

但如實行合作也有什麼『流弊』麼？滿清政府在最後下結論前，於一八六〇年底令有關各省督撫陳述意見。江蘇巡撫薛煥有和華爾合作的經驗，滿口贊成，以爲借助洋兵，必能水陸並進，大收成就，可以直搗金陵，肅清長江了。而新任兩江總督主持對太平天國戰事的曾國藩表示的意見，雖担心洋兵助剿勝利後或者會引起麻煩，但基本態度也是認爲不妨答應外國人來『助剿』，尤其認爲美國態度最好，最可合作。到了一八六一年五月，恭親王奏請購買『外洋船砲』，說是『臣等自聯絡英法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睱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

以滅賊爲志，不難漸次掃盪。」㊀

到了一八六一年冬，李秀成的太平天國主力軍又向長江下游進行巨大攻勢，他由江西入浙江，大事掃盪，攻下了杭州，並由杭州發動再度向上海方面前進，於是左宗棠奉命率兵入浙，而李鴻章受命編練淮軍援滬。但李鴻章的淮軍在安慶駐紮，要立即到達上海附近是不可能的。英國人很快地出來幫忙，在英國海軍大將允許下，在長江下游的英國商輪調到了安慶，把八千淮軍運送到上海，進入內戰的前線。同時滿淸政府也正式宣佈借助洋兵的決策。一八六二年二月八日的「上諭」中無恥地說：

……上海情形實屬萬分危急，借師助剿一節，業經總理衙門（新成立的外交性質機關）與英法住京使臣商酌。現據薛煥（江蘇巡撫）奏，英法文武官員願爲出力。且法國輪船爲我開砲擊賊。是其眞心和好 固已信而有徵。上海爲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爲保衞。……軍務主緊，若必俟總理衙門在京商酌，轉致稽遲。所有借師助剿，即着薛煥……與英法兩國籌商，就日辦理，但於勦賊有裨，朕必不爲遙制。其事後如有必須酬勞之說，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㊂

列強自然極歡迎這種『聯絡』，英法在上海租界組成英法聯軍，幫助滿清作戰，由最初出征高橋起，繼續兩年之久；但其活動範圍比較不大。更有影響的是由華爾創設的那支軍隊和另一支在浙江作戰的法國人的隊伍。

美國國內這時正發生南北戰爭（一八六〇——一八六四），所有在華軍隊均陸續撤回，但是華爾以『私人』資格所編練和率領的軍隊仍存在着，且發生重大作用。現在這一支隊伍不再是『私生子』性質了。他為滿清中央政府所承認，且為美國英國官方所公開支持，在上海外圍積極地參與『剿匪』戰爭。一八六二年三月，滿清政府竟不識羞恥地下令稱華爾的軍隊為『常勝軍』。但在這一年的九月，華爾軍隊奉令渡杭州灣由寗波方面進攻太平軍，在攻下慈谿的戰役中，華爾自己受重傷身死。美國公使蒲安臣特別把他的死報告國務院表示極度悲悼，並說『他（華爾）教導中國人以力量，他建立下一個基礎，形成中國政府所可以希望拿來剿滅叛亂的唯一力量。』[注]繼華爾之位是美國人白齊文（H. A. Burgevin）。白齊文幹得不好，去職，又繼之以英國的戈登（C. G. Gordon）。戈登率所謂常勝

軍，和李鴻章的淮軍於一八四三年起向太平軍進行反攻，一路攻嘉定、常熟、崑山、蘇州、宜興、溧陽、常州，都靠了戈登，如果沒有戈登的幫助，李鴻章的淮軍根本不能取得如此的戰果。

在浙江，在一八六二年五月英法艦隊曾在杭州灣外登陸幫助清軍攻下寗波。法國軍官就在寗波仿效了華爾的辦法，組訓成一支中法人混合的軍隊，當時號稱『法國洋槍隊』。九月攻慈谿之戰中，華爾死後，其『常勝軍』退回上海方面，法國洋槍隊仍留在此區作戰。正如華爾與戈登給了李鴻章以極大助力一樣，法國洋槍隊對於左宗棠在浙江作戰有決定性的貢獻。其時幾乎整個浙江省都在太平軍控制下，左軍由錢塘江上游艱難地一步步北攻，法國洋槍隊則以寗波爲基點向西發展，幫助滿清奪取浙江東部沿岸的地區。一八六三年三月左軍與洋槍隊在紹興地區會合，合力攻下紹與城。以後左軍進攻富陽，太平軍死守了六個月，不能攻下，調了洋槍隊來用大砲轟擊，才使太平軍撤退。一八六四年三月左軍與洋槍隊合作攻下杭州。

曾國藩的湘軍主力從一八五三年初開始圍攻南京城，直到一八六四年七月才攻破南京。但如果沒有在『常勝軍』幫助下的李鴻章在上海南京之間地區內的勝利和在『洋槍隊』幫助下左宗棠在浙江的勝利，肅清了南京的外圍，那麼湘軍主力對南京的圍攻是否能堅持和成功，是很成問題的。

自然我們也不應認爲，太平天國之失敗完全因爲外國人幫助滿清之故。太平天國的失敗主要還在其內在的原因。但是列强在滿清最危急時挽救了他，幫同壓平太平天國，那是不爭的事實。梁啓超於一九〇一年作的李鴻章傳中站在清朝的立場上說：

李文忠平吳大業，固由淮軍部將驍勇堅忍，而其得力於華爾、戈登者實多。……左文襄平浙功亦得力於法國將官托格比、吉格爾（按即D'aiguebelle 和Giquel——引者）之徒甚多，本朝之絕而之復續，蓋英法人　功焉。㊃

爲左宗棠作傳記的倍爾士（W.L.Bales）上校在他的著作中檢討這歷史事件時指出：『外國人（關於太平天國的）早期的著作很自然地都集中於外國人參加鎮

壓叛亂，尤重視戈登指揮下的常勝軍所起的作用。那時有一個觀念傳播於海外，認為實際上消滅太平天國的就是外國人。』倍爾士上校自己不同意這種過分誇張的說法，但也認為，『他們（列強）的貢獻在戰爭末期具有重大價值。他們為政府管理海關稅收，由此而供給中國人一部分的軍餉。他們在上海和寧波地區使用了軍隊和戰船。他們借用了軍官使由華爾創始的中外聯合隊伍得以繼存。他們賣軍器和裝備（也許有一部分是貸予的）給中國人並在實際上禁止出售給太平軍。這一切幫助，如果並不是決定了這戰爭的勝利，也確是加速了他的完成。』㊅這節話中，應該把『中國人』的字樣改寫做『滿清統治者』，那就十分確當了。

對我們在這裏有興趣的倒並不是外國人與滿清在對太平軍的勝利中各佔多少功績，而是：滿清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已經因共同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而建立了友誼，表明了他們之間雖然有猜忌、嫉恨，甚至有過戰爭，但在基本上究竟是可以建立互相信託的關係的。這樣就使得從南京條約以來在中外關係上所形成

的新的結合達到了最高峯。

在一八六四年一月，有一個在上海的英國人列士特中校（Lyster）寫信回國說：『現在的中國政府很弱，已不可能長久存在。如果戈登願意，他能夠推翻皇帝，創立一個新朝代，只要外國列強不加干涉。』㊂這位年青的中校的話固然是帶着帝國主義者的浮誇的優越感而說出來，但他畢竟還是太天真了。他不懂得滿清政府雖然因爲腐朽卑劣而弱，但能夠使得列強喜歡的正是這樣的政府。如果眞要實現『戈登王朝』這怪想，並不是沒有種種困難的。列強已經計算清楚，爲了控制中國和搾取中國人民，是寧願保留和支持現在這個皇朝，而絕不能隨便把它推翻的。二十年間經過了兩次雅片戰爭，最後作戰雙方却形成了對中國人民的軍事合作，這並不是值得驚異的事。

㊀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頁三三三——三三四。

㊁ 王之春：『通商始末記』卷十五

㊂ 同㊀，頁三四〇—三四一。

㊸ MrcNail,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 P.357

㊹ 梁啓超의 『李文忠公事略』卷一

㊺ Bales, Tso TsungT'ang (左宗棠傳) P.185,PP.189-190

㊻ 同㊸ .363



第二章 「中興」和媚外

一 可恥的「中興」

滿清軍隊雖然在一八六五年七月攻下了太平天國的南京，消滅了農民起義的革命政權；但這不表明滿清政權統治地位已經鞏固，已經完成了「武力統一」。不但太平天國的殘餘力量仍在活動，而且在北方，在西北，在西南，到處都有農民和少數民族武裝起義，像野火樣地四處蔓燒。當滿清統治者爲打下南京而大擺「慶功宴」時，試環顧一下在它治下的中國，就可看到：

一、太平天國留下的力量一部分由江浙退至安徽江西，轉入廣東福建，聲勢仍浩大，滿清集湘軍，淮軍以進剿。至一八六六年春太平天國運動才完全失敗。

二、太平天國留下的力量又一部份在長江以北的加入了「捻」黨。捻黨是河

南安徽的農民起義，早在太平天國初興時卽已活躍。到了太平天國這一部份力量加入後，聲勢大振，其勢力達到江蘇安徽湖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河北八省。一八六五年五月在山東戰敗並殺死滿清名將僧格林沁親王，使清廷大爲震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相繼受命剿捻，用殘忍的殺戮才在一八六八年『剿平』捻黨。

三、貴州的苗民起義。苗民不堪滿淸官吏的壓迫，早於一八五五年已起義造反。到了一八六四年時，貴州全省只有省會貴陽還在官軍手裏。鬥爭且發展到附近的雲南廣西湖南四川各省。滿淸調湘軍加緊進剿，至一八七二年在殺死了十多萬苗民後取得『勝利』。

四、雲南的回民起義。雲南回民數目不多，但於一八五五年開始團結起來反抗滿淸官吏，繼續了十多年的戰爭，最盛時在一八六八年左右，佔據全省五十餘城，至一八七三年。在滿淸官兵的大屠殺下結束。

五、西北的回民起義。在一八六一——六二年，陝西甘肅回民也相繼起義，與捻黨相呼應。捻黨被消滅後，滿淸又以左宗棠率大軍進剿回民。至一八七三年

始平定。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軍隊又遠征新疆的回民。

這就是說，在佔領南京後，滿淸政府還不得不用十年以上的時間來繼續從事內戰以鎮壓國內各地起義造反的人民。以上所舉的還不包括這期間其他許多較零星的事變。

太平天國的興起，已經充分暴露了滿淸統治機構的腐化和無能，已經搖鬆了它的統治的基礎。統治者本身已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而當時的外國人站在旁觀地位也已能看出這危機，所以在幫同進攻太平天國的外國軍人，像前舉的列士特中校也認爲滿淸政府已接近其垮台之時。——但是事實上，滿淸政府依舊在風雨飄搖下繼續支持了下來，不但消滅了太平天國，而且還在繼續的十年內戰中削平了各地的叛亂，甚至在一八六四年後若干年間滿淸統治者相信自己已經度過難關而『中興』了。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

其原因要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當時起來反抗滿淸的人民的主力只是被壓

追的農民。太平天國已經是封建時代的單純農民戰爭所可能達到的最高的成就，但仍不免於暴露了其本身的弱點，不可能建立鞏固的政權，而終被消滅。其餘的農民和少數民族的起義，在政治組織力和武力的組織上都更不如太平天國了。他們不能構成廣泛的全國範圍的人民革命以推翻滿清政權。

另一方面，當時的滿清政權爭取到兩種有利的條件使他能够通過國內的重重危機而苟延殘喘。這兩種有利條件是：

第一、經過太平天國的戰爭，滿清皇朝和漢族地主之間取得了進一步的合作關係，後者給予前者以有力的支持。本來滿清皇朝以異族入據，在二百年的過程中，在基本上已經和漢族的地主打成一片。但是直到太平天國興起時，清廷對於上層漢族地主在政權與軍權上仍是採取猜忌和防範態度的。到了太平天國的戰爭時，不但滿清的基幹武力——八旗兵毫無戰鬭力量，連他平日所畜養的招募漢人而編成的『綠營』兵也不堪作戰。於是滿清就不得不完全依賴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率領的湘軍淮軍——這都是以各省區的地主武力（團練）為基礎而建立的。

曾左李等都因軍功而位居方面，封侯封伯，這是滿清統治下前所未有的。滿清統治者既作了這樣大的讓步，以曾左李等爲代表的地主士大夫也就『赤胆忠心保皇朝』了。當時在外國人中散播着一種懷疑：『爲什麼像曾國藩這樣的人，手裏有着充分的力量，却去支持一個搖搖欲墮的異族政權，爲什麼他不推翻滿洲人而建立一個漢族人的新朝代呢？』㈠——其實這是不難了解的。因爲農民起義的浪潮所打擊的不只是滿清的統治而是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漢族地主得到了滿洲統治者在實際權力上的更大讓步後，就寧願支持它去壓平造反的農民而不去冒別建新朝代的險。我們不妨把在元朝末期的情形作一個比較。那時也是異族的統治（蒙古人），也是廣大農民的起義，但蒙古統治者始終在政治上排斥漢族地主士大夫，所以有一部分漢族地主就被迫另尋出路，他們鑽到農民隊伍中，利用農民的力量。他們努力去改變農民戰爭的性質，狡滑地吞食了農民戰爭的成果而建立了一個地主階級的新朝代以代替蒙古人的統治。由這比較便可知道滿清能夠團結全部漢族地主實力以渡過國內危機，這是他的聰敏狡獪的表現。

第二、外國侵略者既幫助滿清打敗太平天國，又在戰後繼續維持着支持滿清政權的政策，這是滿清政權爲自己的生存而爭取到的又一有利條件。曾左李的地主軍隊，如果沒有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與外國人合作的經驗，接受了不少新的槍械，得到了若干外國軍官的幫助，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在以後十多年的鎭壓人民的內戰中取得『勝利』。在山東打捻黨時，也還曾有英國軍官柯納（Captain Coney）參加。在雲南打回民時，曾得到法國方面的協助。滿清當局把法國商人睹布益（Jean Dupuis）請到雲南，商量購買軍火，許他從越南經紅江轉運軍火入雲南。法國由此探得了滇越間的水路，而滿清官方則得了消滅叛亂人民的武器。又如對於新疆的回民起義，帝國主義者的態度也曾有過像在太平天國時期那樣的變動——先對太平天國表同情，末後則反面相向。新疆回民領袖阿古柏（Yakub Beg）已於一八六七年在新疆西南部建立對滿清統治獨立的政權，起先英俄兩國都表示承認，且與訂約，但到了左宗棠已消滅了陝西甘肅的回變，準備遠征新疆的時候，英俄都轉而助滿清了。他們發覺阿古柏勝利對他們並不有利。英國商人

借軍費給左，俄國也供給他的遠征軍以糧餉，這些對於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並不是不重要的。

在此，我們必須指出，有許多研究中國最近百年史的著作有意無意地造成了一種錯覺。他們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策描寫得這樣單純，以致於把滿清政權寫成是不斷地受着帝國主義國家所欺凌侮弄的可憐的存在。這種描寫是不合歷史事實的錯誤觀念。甚至於有些努力要擺脫傳統的歷史觀念的著作也出發於單純的民族情緒而犯了這種錯誤。原來如前章所分析的，自一八四〇年以後的二十多年間，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已經漸漸形成了中國統治者和中國人民雙方不同的與外來侵略者之間的新關係的結合。尤其經過了太平天國的慘烈的國內戰爭之後，更不能把當時中國看做是由滿清政府統治着的一個整體。存着滿清政權和環繞其四周的地主階級的中國，也有着經常爆發武裝抗爭的農民的中國。帝國主義是繼續積極展開其對中國的侵略行爲，同時它是採取着繼續支持滿清政權的政

策，幫助他鎮壓人民。這是很自然的事。事實上，在太平天國的戰爭後期，我們已看到這種政策的實施，而在這以後十年間，這樣的政策是一貫施行着的。

拉多來特（K.S.Latourette）在其所著『中國的歷史及其文化』一書中雖然包含許多缺點，但在這一點上他根據事實作了正確的說明。講到一八六〇——一八九三年間的中國對外關係時，他說：

> 清朝生命之所以能延長，不僅由於有了慈禧太后（這裡是把慈禧太后個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了——引者）和壓平了內部的叛亂，而且由於清帝國對西方列強的關係上沒有再發生像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一八五六——一八六〇那樣的嚴重的危機。由於這幾次戰爭而締結的條約，雖還沒有使西方列強完全滿意，但是從前外國人對中國情況所抱的反感，現在已大半可能消除掉了。西洋人還是帶着侵略性的。他們總是希求更增加他們已得的特權，並且一次次地侵害中國的領土。但是在一八六〇年後若干年間，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和美國，其對華關係的推進是建基於一種信念上，他們相信，最有利於他們的還是去維持滿清皇朝的威信和權力，使它更有力量壓平內部的不安。⑬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也同樣指出：

> 在雅片戰爭時期（泛指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六〇年的時期——引者），滿洲朝代已經顯然在衰敗

中。鴉片戰爭嚴重地損害了滿洲人的權威。如果不是因爲外國人在打敗了滿洲以後，有意要維持這朝代，爲了可以通過滿清朝廷而製造出一種適合他們的利益的政府，那麼滿清很可能在一二十年中就崩潰了。㊂

不難看出，滿清最嚴重的危機是在一八六〇年皇室逃到了熱河的時候，北方是英法聯軍深入京畿，南方太平天國正得到新的勝利，而同時曾國藩湘軍也在全盛期。這三方面都有使滿清皇朝覆滅的可能。——一八六〇年的危機渡過了。以曾國藩爲代表的地主勢力仍覺得支持這政權爲最有利，外國侵略者也覺得最有利的辦法還是支持這個皇朝。滿清向這兩方面妥協讓步，以換得壓服太平天國的可能，也同樣，壓服了太平天國以後的歷次人民叛亂。但我們必須看出，這些人民叛亂之所以失敗的最基本原因還在於單純農民戰爭的弱點。到了人民革命的力量發展得更強更健全時，統治者雖有全體地主的擁戴與帝國主義的扶持也沒有辦法了。正因此，滿清政權的生命在一八六四年後究竟也只是多活了四十六年，并不能億萬斯年存在下去。

有所謂『同治中興』的說法。同治年間（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人民的大起義既遂一失敗，對外關係也在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下維持着和平局面，所以當時官僚地主站在統治者立場竟誇爲『同治中興』。如編輯『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的陳弢一八七五年歌頌同治政績是『戡平僭僞，綏靖邊陲，偉烈豐功，爲書契以還所罕覯。』⑫——即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意思。好可憐而可恥的『中興』啊！所謂『綏靖邊陲』實際上豈不就是向外國侵略者屈膝麽？所謂『戡平僭僞』實際上豈不就是借外國力量鎭壓人民麽？到了同治末年，光緒初年後，外交的糾紛漸漸嚴重，『中興』的紙老虎已經漸漸地顯出原形，但是一八七九年，奉南洋大臣沈葆楨命令到日本考察去的王之春居然還吹牛說：『我朝威靈震叠，一道同風，受萬國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問之使聯翩而賦皇華者幾於無遠弗屆焉。蓋中天運會所開，初非秦皇漢武徒逞遠略者所可同年語也。』⑬統治階級的自欺欺人已經到了何等可笑的程度！

⑪ Bales: Tso Tsung-Tang（左宗棠傳）p. 191

[illegible] Latourette, Th. Chinese, 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p. 387

[illegible] Owen and Eleano La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119

[illegible] 陳欽編『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刻本）的自敘。

[illegible] 王之春：『談瀛錄』（刻本）卷一頁八。

二 政治上的控制

就在所謂『同治中興』期間帝國主義是在逐步建立着對於滿清政府的控制。首先應該提到海關。

早在一八五四年，外國人已由滿清官吏手裏接受了上海海關。當時是由英美法三國領事各派一人共同管理上海海關而由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Wade）負總責。幾個月後由李泰國（H. N. Lay）代替威的職位。直到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訂立時，中國海關爲外國人支配的仍只有上海一口。但在天津條約後又續訂『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十款』，其中第十款規定：

> 通商各國收稅如何嚴防偷漏，……現已議明各口劃一辦理，是由總理外國通商事宜大臣或隨時親詣巡歷或委員代辦，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幫辦稅務。……

條文的含意本是很模糊的，外國人就抓住『各口劃一辦理』一語解釋爲上海

海關所已實行的制度必須推行於其他各口岸，在上海以外各口也須請外國人幫辦稅務。這個解釋事實上爲滿清當局所接受。原來只有權管理上海一海關的李泰國卽於一八五九年由兩廣總督任命爲總稅務司（一八六一年滿清政府設總理衙門後改由總理衙門任命）。一八六三年李泰國去職，由赫德（Robert Hart）繼任。

赫德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是地位很重要的一個人。他在一八五八年前爲廣州英國領事館的翻譯員，和廣東的滿清大員已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以後曾在李泰國請假的短期間代理總稅務司，並爲上海海關的稅務司，贏得了滿清官方的信任。當他正式被任爲總稅務司時是二十九歲，從此他繼續担任這職務四十五年，至一九〇九年才去職回國。中國在外人支配下的海關制度由他所一手制訂並推行。按照這種制度，總稅務司（Inspector—General）向中國的中央政府負責，每一口岸的海關設一外國人担任的稅務司（Commisioner of Customs），稅務司下有副稅務司，幫辦，書記等職員，較高級的職員也全用外國人。滿清政府本來在每一海關上派有海關監督，稅務司名義上應爲海關監督的助理，實際上，稅務司只向總

稅務司負責。到一八六四年時中國沿海十二個商埠（包括台灣的兩個）和沿長江的九江、漢口均實行了這種制度。

以後，到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之後，海關洋員與總稅務司的權力更形擴大；那是後話，暫且不提。只就中日戰爭以前的情形，已可知道這樣的海關制度的建立不僅大大便利於帝國主義發展對華貿易，實施經濟侵略，而且還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有些人竭力誇稱外人管理海關的效率。這固然是事實，外國人管理海關後，的確比在貪污中飽的官僚支配下時有更多的收入每年送到滿清國庫中去。因此滿清政府對這制度表示滿意，認爲洋人稅務司確是幫忙。滿清的財政經太平天國的戰爭後已十分竭蹶，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規定下了巨額的賠款，對內的戰費仍每年增加，而收入卻越來越少。田賦、鹽稅是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但經過戰爭期的破壞，稅收大見減低。於是海關收入愈顯其重要。滿清政府得到了海關收入，而帝國主義者則可以十分方便地進行其吮吸中國人民血汗的不等價交換。總稅務

司控制着海關，又不曾掌握着滿清的命脈。帝國主義通過海關的管理便有可能進一步支配中國政治。——挾持滿清政府而展開對中國的侵略，這在海關制度的實施上面表現得十分清楚。

一八六五年起，總稅務司開始設官署於北京，赫德經常在北京，這使得他可以和他的上司——總理衙門（外交部）直接接觸，而各地的稅務司自然也有充分機會可以和各地的地方當局接觸。這些海關『洋員』表現為雙重的人格，一方面是『洋人』，背後有帝國主義的實力，一方面又總算是滿清政府所雇用而為他辦事的人員。這種條件使他們既為滿清官僚所畏懼，而又易於取得官僚們的信託，因此他們比各國派在中國的外交人員有着更多的機會以參與並支配中國的政治。慕思（Dr. Morse）在其著名的大著中說：『總理衙門在那時還沒有經驗，所以在一切國際問題上，從商議一個條約到解決一個土地糾紛，都常求取在北京的總稅務司的意見與幫助。各省的總督、巡撫、道台也經常和各地的稅務司商議，聽

取其意見而行動。……各國的外交人員也總是支持它（海關）的威信。……赫德爵士及其屬下人員由他們的工作而贏得了中國人與外國人的信仰。」㊀這種說法是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對海關洋員的讚揚，但這也宣洩了一個事實，就是帝國主義者由於控制了中國海關，便進一步地可以直接利用海關人員對中國政治起支配作用。

赫德自常任北京後，就以海關總稅務司的身份而在實際上成了滿清總理衙門的最高顧問人員。滿清的一切重大外交事件幾無不有赫德參與。這裏舉幾個最顯著的例。一八六六年，赫德請假回國一行，由於他的勸說，滿清派了一個官員和若干學生隨他回去考察，是爲滿清派員出洋的第一次。一八七八年滿清任命美國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爲專使訪問各國，也是赫德的授意。一八七六年滿清政府與英國舉行烟台會議，訂立烟台條約時，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却以赫德和天津稅務司德璀琳（G. Detring）當他的助理。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中，赫德竟成爲訂立中法和約的一個要角：在戰爭還在進行時，他已派了一個海關職

員金登幹（J. D. Campbell）到巴黎和法國政府接洽；在和約尚未訂立前，滿清政府已授權給他，令金登幹以中國特派專員的身份和法國先訂立草約。金登幹這人早就以中國稅務司的身份被派駐在倫敦，那時還沒有常駐外國的中國公使。一八七六年滿清派出第一個公使郭嵩燾到了倫敦後，立刻就向金登幹請教一切。㊂中法和約的訂立更是這『洋稅務司』金登幹直接參與中國政治的證明。——只舉這幾件事，就可知道作爲海關人員的赫德及其下屬在中國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了。但赫德所起的作用還不止此，而且甚至在內政上起作用。據慕思說，在一八六七年雲貴總督和四川總督人選卽是先由赫德向滿清政府建議，滿清政府果然按照赫德建議而發表，雖然這兩省在當時還根本沒有外國人的貿易。

當時已有人看出赫德勢力的可怕。如陳熾在一八九〇年左右著『庸書』，其中提到赫德，說：『海關釐稅，歲入三千萬，仰其鼻息以爲盈虛，引黨類數百人，靡工資二百萬，濡而陰持朝議，顯縮邦交，偶或侵之，顚蹶立至。……家貲之富，可以敵國。……阻撓稅則，左袒西商。……貌類忠誠，心懷鬼蜮。……英君主授以

男爵，功在彼國，其事可知。』㊁陳熾在這裏還不敢直呼其名，但所指爲誰，是很顯然的。所謂『陰持朝議，顯結邦交』就是明白說出了他在政治上的威權。

但滿清朝廷對於赫德是如何呢？正如陳熾所說，是『倚任多年，毫無疑慮；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㊂在一八六七年底李鴻章（其時他任湖廣總督）曾說：『自來敵國相交，最忌情形隔閡。……今則中外交際多年，彼固得知我之虛實，我亦略悉彼之情僞。……如總稅務使赫德，心雖深狠，而貪戀薪俸，願爲効力。美使蒲安臣爲中國出使，據稱遇有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屆時皆可備居間轉寰之用。……』㊃——由此可見赫德當時確已博得滿清負責官員的信任了。

李鴻章所說『可備居間轉寰之用』的另一個外國人是蒲安臣，那也就是前文（第一章第五節）已提到過的第一個入居北京的美國公使，他一到中國就竭力鼓吹支持滿清政府幫同撲滅太平天國。由於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訂約各國公使有權利入駐北京了，美俄英法各國在北京的使館相繼於一八六一年設立。滿清在還

一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類似外交部性質。以前滿清中央政府中沒有這種機構，對外交涉的責任是由兩廣總督兼任的。——多年來列强企望與滿清中央政府直接接觸，現在是達到目的了。最初到北京的美國公使蒲安臣，英國公使普魯斯（E. W. A. Bruce），阿禮國（P. Alcock）都在當時對於滿清政治起了不少支配的作用。

各國公使入居北京後又提出要求中國派遣使臣出國和要求中國皇帝接見外國使節這兩個問題。滿清政府對這兩點起先是堅決拒絕的。由於赫德和英美公使的努力，才對前一點半推半就地答應了。一八六六年滿清政府派員隨同赫德去英國一次，但那並不是正式的外交官員。到一八六八年又正式派遣出使外國的使節。但那可說是一幕滑稽劇，因爲所派的外交官是外國人而且本來是外國派在中國的外交官。美國的蒲安臣公使於這一年解職回國，他因一直堅主支援滿清政府，很爲滿清官方所感激，這時又因赫德授意，總理衙門便聘請他當中國全權特使，訪問歐美各國。又因英法兩國在旁表示妬嫉，便又加聘英國使館繙譯官柏卓安（J.

McLeavy Brown）及法國人德善（Deseampo）爲協理。這個奇怪的外交使團先到美國，然後至英，再經歐陸上的各國而抵俄國。蒲安臣在俄國病死，才結束這幕不倫不類的怪劇。到了一八七一年，因天津教案，滿清政府被迫向法國道歉，派滿洲人崇厚爲特使赴法。一八七六年，又因馬加理案向英國道歉，派了郭嵩燾赴英道歉，郭嵩燾由此而被任爲常駐英國的公使。以後三年間在美法俄各國也都相繼設立中國使館。滿清政府最初派出國的外交使節是以各帝國主義國家派在中國活動的人物充任，而最初派本國人爲外交使節却是因受帝國主義壓迫而去乞憐道歉，這都是很堪注意的事。

至於外國使節覲見中國皇帝的問題，雖然滿清官方多方留難，也在一八七三年實現了。參予『覲見』的有英、美、法、俄、荷蘭五國公使與日本大使（其時爲明治維新後六年，日本已開始侵略中國，在這一年派了副島種臣以大使銜持國書到北京）。他們以五鞠躬禮而見滿清皇帝。他們很滿意於這個『勝利』，因爲滿清官方終究放棄了任何外國人對於中國皇帝必須叩頭的成見。

交換使節和『覲見』這兩件事情本身，我們在現在看來，固不覺得有什麼重大意義。但在當時列强各國與滿淸當局同樣重視這些事。因爲在這裏是表現着滿淸統治者在政治上向列强各國逐漸地屈服，而列强各國逐漸地爭取到對滿淸政府的支配地位。列强使館力求入京，不是作爲普通的外交使者，而是爲了來做中國的主人。外國公使要爭取按照他們的禮儀面見中國皇帝的權利是爲了要鞏固他們在北京的地位，他們要中國派出外交使節是爲了要通過各種關係把他們的影響滲透到滿淸的統治集團中去。

帝國主義侵略國家的這種政治上的努力確是表現着顯著的效果。如果在一八六〇年英法軍入據北京，强迫定約行約時，滿淸的官僚士大夫還以爲這是奇恥大辱；可是漸漸地已經習以爲常了。所以除了訂立天津條約的英、美、俄、法四大國外，其餘各國中，瑞典、挪威已在一八四七年和滿淸訂立了商約。在一八六〇後又相繼和下列各國成立新約：普，葡（均在一六六二），丹，荷（均在一八六

三），西（一八六四），比（一八六五），意（一八六六），奧（一八六九），日本（一八七一），祕魯（一八七四）。所有各國不論强弱都按照英美法俄的先例，使滿清政府承認他們在中國同樣享有領事裁判權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

滿清的官僚們能够在這樣的條件下維持着現狀，已經覺得非常滿意了。例如所謂『中興第一功臣』的曾國藩在一八七〇年說：『皇上登極以來（按指一八六二以來——引者）外國盛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往事之成效。……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萬不得已而設備，乃所以善全和局。』[23]又如第一個駐外使臣郭嵩燾在一八七六年的『出使日記』中也是反覆說明，列强各國實在都是極守信義的，中國只應該和他們維持友好的關係。他在海行中看到印度各地情形時說：『西洋之開闢藩部，意在坐收其利，一切以智力經營，囊括席捲而不必覆人之宗，以滅其國，故無專以兵力取者，此實千古未有之局也。』又引據中國史事說：『程子大儒論「本朝五不可及」，一曰「至誠待夷狄」。北宋以前規模廣博，猶可想見。……漢高祖一困平城而遣

使和親，唐太宗至屈尊突厥，開國英主不以爲諱。終唐之世，周旋回紇吐蕃，忍隱含垢。王者保國安民，其道故應如此。』又直接發揮他對於中國外交關係的意見說：『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角立稱雄，創爲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俄羅斯……英吉利……足稱二霸，……而絕不逞兵縱暴以掠奪爲心，其構兵中國，猶展轉據理爭辯，持重而後發。……處今日之勢，惟有傾誠以與各國相接，舍是無能自立者。』㈤當時有許多士紳罵郭嵩燾是漢奸，固然是出發於極端保守的立場，但在我們看來，如果說郭嵩燾是比守舊派較爲『進步』，那也不過是因爲他迅速地接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政治觀點，認爲滿清朝廷下的中國要能維持下去，就必須『隱忍含垢』，與侵略者『傾誠相接』才行。

㈠ H.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3, p.386

㈢ 郭嵩燾：『使西紀程』（刻本）卷下頁廿八。

㈣ 陳熾：『庸書』，（刻本）外篇卷上頁十四。

㈤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頁三二——三三。

㊄ 同㊅ 頁九五—九六。

㊅ 同㊂卷上頁十九，卷下頁三及頁二四—二五。

三　老師學生之間

但列強各國對於滿清政府也並不是完全滿意。不僅在上述的覲見、出使、修約等問題上，滿清政府的延宕敷衍，列強各國很不耐煩，還有其他許多事也使各國對這個他們所願維持的政府十分不滿意。

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六六年間在北京英國使館担任參贊的米特福（A. B. Freman-Mitford）曾把他在北京時所寫信件出版，從那裏面可以看到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使館所感到不滿的是些什麼事。寫到一八六六年四月間英公使阿禮國與恭親王的一次會談（恭親王奕訢自總理衙門設立以後卽爲其主持者），米特福說：

> 鐵路，電報，違背條約等等，這一切老話已經談過一百次了。恭親王很煩躁不安。他像一隻野兎子似地躁跳，繞圈子　迴避。

這裏列舉的幾點正是英國公使和別的公使所不滿意的事。在另一信中，米特

這眞是叫人生氣的事，已經盡了一切努力來勸這不幸的政府自救，只要用最平常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結果，只看到半打的射擊手在城外打着二十碼遠的靶子，那種樣子好像十八歲的姑娘一樣，這眞叫我們國內的射擊俱樂部會員都羞於看見。但中國政府爲鎭壓叛亂而有了這樣的工具已頗爲自滿。他們照外國辦法訓練軍隊只是對外國人的建議淺嘗一下，並不足以表示誠意求改進。

接着他又講到滿淸借用外國軍官訓練軍隊，他說：

有些高級官員不願受命於外國軍官 使他們（外國軍官們）很受障礙。加以軍隊得不到確實的供應和軍餉，更使他們的處境十分困難。戈登將軍就曾不止一次遭遇這種困境。被借去教育中國軍隊的英國軍官要靠他們來辦以順利工作，不可能執行他們所認爲必要的辦法。在這樣情況下，毫不足怪的，叛逆的隊伍總能吸收了地方土匪，秘密會社 因欠餉而譁變的官兵，不斷膨脹，永遠難以根除。

然後他又提到滿淸政府仍常有『違反』其與列強所訂立的條約的行爲，他說的是：

條約屢屢被破壞。中國現在這種朝代的存在依賴於外國政府的容忍，外國政府因爲在這國家里有着極大的利害關係，所以在船還有希望浮起的時候，總不願意讓它沉掉。

好了，我們已經引錄得太多了。滿清，雖已是快要沉的船，但只要在它還沒有最後沉下時，列强就還是要努力幫助它浮起來。這是很生動地說出了當時列强對滿清的政策。但我們還要引用一節頗可注意的話：

> 我們聽到中國要有革新的傳說。如果這朝代還要維持下去，中國要保持獨立，革新必須快行，因爲時機已十分迫切。行政機關的每一部門都已腐敗到極點，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不守信義也已到了極點。國內有苦難和不滿，國外有對於破壞條約的憤怒，這政府已開始爲其命運而發抖了。如果改革不快點來，就會太遲了。（一）

照這個英國使館參贊的話，表面上看起來，要中國設電報，改革軍隊，對外「守信義」，「革新」，都好像眞是爲了要中國好，要中國進步。但實際上是如何呢？

先說鐵路電報的問題。很清楚的，列强之所以對這十分熱心，不過因爲這種工具將更便利於他的侵略，並可伸展其勢力到中國的內地去。就商業一端來看，天津條約實施後，列强對華經濟侵略雖大得便利，但進出口貨値總量增加仍甚緩

慢，從一八六五到一八八五年只增加了五分之一。只就這一方面看，列强各國也亟盼能築成伸入中國內地的鐵路，以擴展其商品的市場。滿清政府固然已處處妥協，但這個本身腐爛透頂的政府對於新的東西實在害怕到了極點了，像電報鐵路這樣的東西還不是他們所敢於立卽接受的，所以能夠拖延總還是拖延下去。到了一八七六年英國商人才自作主張地在上海吳淞間築成一條輕便鐵路，但仍爲滿清政府出了錢贖回毀去。——滿清政府的這種胆怯守舊的情形是使得列强各國極爲「生氣」的。

其次說到違反條約的問題。我們必須明瞭兩件事：第一、列强各國口口聲聲講中國不守國際信義，其實際意義自然是要中國遵守在武力脅迫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本身是不合理的，固不待說；而且列强各國當時在中國的各種行動雖處處以條約爲護符，其實並不只限於條約文字上的規定，如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租界地的劃定，海關制度的建立以及傳教士在內地的庇護教民，那都遠超過已有的條約範圍。列强各國任意行動，以旣成的事實要滿清政府給予合法的承

認，稍有遲疑，即以違反條約爲藉口，以不許中國「獨立」爲威脅，其意即是，如果你不承認這一切，那怪不得我們用厲害手段來使你雖在名義上也不成爲獨立國了。另一方面，我們還須明瞭一件事，即第二，難道滿清政府在已經對外步步妥協，簽訂屈辱條約，承認各種既成事實後，還會有計劃地來破壞這些條約，以求解除片面的束縛麼？恰恰相反，滿清政府是在處處力求使「洋大人」滿意的。但他有他的困難。整個統治機構，從中央到地方，是冥頑不靈的，中央控制不了各地方的行動；加以內部人民的騷動如此頻繁，使得滿清政府往往不敢在國內公開他和外國所訂立的條約，更無能力來約束人民的自發行動，怕更激起人民的反感。「蒙上欺下」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滿清政府也用這態度對下敷衍人民，對上向「洋大人」蒙混。這就使得「洋大人」十分不滿，不滿意於這個政府無力壓制人民的排外行動，就拿「無誠意於執行條約」來責備這個政府。

米特福講到對於滿清軍事的不滿，更顯著地表明了列强各國所不滿意於這個政府的，就是覺得他太沒有能力了，不能够對內很好地鎮壓人民，造成穩定的秩

序。所以他們是這樣緊迫地要求這政府『革新』，這所謂『革新』的意義不是別的，就是為了這政府對內更能強有力，而對外能更好地執行列強所委托的任務。

米特福的信件中寫得很清楚，列強各國這時在中國的利害關係已與滿清政府的生命結合在一起了，所以『在船還有希望能浮起的時候，總不願讓它沉掉』，耐心地對這政府負起了教誨和支持的責任。

誰能說對於這個壓迫中國人民的滿清專制政府，列強各國不是像啓蒙老師一樣地盡心竭力呢？他們不但出力幫助他壓平了太平天國，而且屢次三番把他們的新式槍砲送給中國的將軍們試用。關於電報，在米特福信中還講了一個故事，說是在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俄國政府想為中國建立一條從恰克圖到北京的電報線，為此他派了一個技師帶着全套機械到北京，請中國官員到公使館中來參觀，俄國公使夫倫加里（M. Vlangary）還設法訓練了幾個中國人學會這玩意使中國官員看了易於接受。約在此四年以前，法國的格羅斯（Bran Gros）已曾送一副電報

機給恭親王，被拒絕接受，但到這時，如米特福所說，「中國政府已較為成長，能接受外來的影響」，所以恭親王和總理衙門其他官員都曾親到俄國使館，表示重視，雖然結果仍未辦成，但俄國人這種「成功」已使得法國人十分嫉妬了。

英國的威妥瑪曾特地把英國步兵操典譯成中文。因此米特福的信中便記載着他們被請去參觀一次中國軍隊的檢閱，「兩千兵士已不是手持刀箭和寫着「勇」字的盾，而是按照着威妥瑪為他們譯出的我們的操典而演習，使用的是俄國人所奉送的槍砲。」

美國的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又譯出了惠頓所著的「國際公法」（譯名為「萬國律例」），一八六四年由總理衙門接受了去出版。——這事在米特福的信中也提到，認為這書的出版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不用說得，其所以被目為重要就是為了使得中國官僚能學會作為半殖民地的國家的規矩。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於一八六六年呈遞「局外旁觀論」一篇給總理衙門，可視為代表各國使館給滿清寫的教科書，其中歷數中國內外情勢的危急，他說，因為

內政不修，才弄到『萬國之內，最馴服之百姓，竟至處處不服變亂。吁！事不以實，徒飾虛文可乎？』他勸滿清對外要謹守條約，對內要採用西法鑄幣，築路，造船，設電等等。㊂英國公使阿禮國又特別叫威妥瑪寫成一『新議論略』遞交給總理衙門，所勸說和警告的內容也大致相同。

對於諸如此類的事情，有的歷史書上說，完全是外國人要中國好，並無自私打算，有的說，都無非是爲了貫徹其侵略的目的。說得完全一些，應該這樣說：這一切在基本上確是帝國主義爲他自己打算，但同時他們也確是誠意扶持滿清政權。因爲扶持這個政權和發展對華侵略終久是同一件事。『可惜』的是做着『老師』的列强各國雖然如此地循循善誘，但那『學生』因爲本身已到了腐敗透頂的程度，已成爲不易扶起的阿斗了。

有時老師發脾氣了，如威妥瑪一八七五年當面教訓李鴻章說：『自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到今，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活到十六歲，倒變成了一歲了。……總署向來遇事總是從容商辦，究是一件不辦。今日騙

我，明日敷衍我，以後我斷不能受騙了。中國辦事那一件是照條約的！」又說：「今不改變一切，恐終不能自主。非獨我一國意見，各國官民皆如此說。」㈠每蔑詭詐，到這極點，何嘗還能算是「外交談判」。堂堂「朝廷重寄」的大員李鴻章居然受得下去！但「老師」有時也爲這冥頑的學生多少有了一些進步而覺得滿意，如米特福信中說到一八六五年滿清軍隊對於捻黨的戰爭說：「關於山東的叛亂最近有些好消息，叛黨看來將被消滅，已經東西分散，首都是安全了。這是第一次中國人（應該說「中國政府」——引者）自己得的榮譽，因爲他們沒有外國人的幫助而幹成功了。」（其實還是靠的外國槍械。）同一年米特福又說：「雖然在最近和中國人的交涉中，他們已表現得比過去較爲老實和忠誠，但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和他們辦交涉。」㈡這就是對這學生覺得還有出息，還要繼續加以督促的意思。

㈠ 以上所引米特福的話分見 M Lord : Attache' at Peki ,g pp.83--85p ,170.

㈡ 同㈠，p.105, p.77, p.90.

㊂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頁二五五

㊃ 蔣廷黻：『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卷中，頁一四四

㊄ 同㊀，p.93, p.176.

四　紙老虎拆破

所謂同治中興，不過是可恥可卑的紙老虎，由以上所述已可概見。到了同治末年，光緒初年，紙老虎已漸拆破了。

首先有天津教案的糾紛。所謂『教案』就是人民與外國教會間的衝突。外國傳教士在一八六一年後藉條約的保障紛紛進入內地。他們中縱然有極少數並不是有意識地做着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但無例外地是藉強國的威風而自居於優越的地位。滿清官員害怕洋人，對於傳教士竟也誠惶誠恐地像對待上司一樣。教會的權勢，甚至使信教的中國人也能在法律與社會上享有特殊地位，官府在處理訴訟事件時，不敢作不利於教民的判決，在征收賦稅時，只向普通老百姓勒索，不敢向有教會做後盾的教民催取。這一切都增加了一般人民對教會的憤恨，甚至發展爲燒教堂，殺教士的暴動。最早在一八六二年江西和湖南已發生這種教案，以後

在江蘇的揚州，直隸的大名、廣平及四川、貴州各地都曾連年不斷地發生這類案件。但還沒有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至一八七〇年爆發了著名的『天津教案』。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M. Fontanier）爲對抗羣衆的反教會運動，公然開槍向滿清官員和羣衆射擊，官員迴避，而羣衆在憤怒中殺死了這個領事，并毀了一個法國教堂。法國方面立刻以出兵宣戰爲威脅。其實當時因爲法國本國正在和普魯士作戰，不可能到遠東動兵，但是滿清當局立刻低首下心，滿足『洋大人』的要求。曾國藩被派到天津辦理此案，天津的府縣官員充軍，無辜的老百姓十八人處死刑，又賠償法國人四十六萬兩，並特派大員赴法道歉。曾國藩於處理這案時，一面雖也表示，各地發生的『教案皆百姓積不能平所致』，但同時仍說：『此次天津之案……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㊀所謂『委曲求全』就是犧牲人民以順從帝國主義者。『中興第一名臣』的媚外面目就首先被拆穿了。

接着正在同治的最末一年（一八七四），初興的日本竟開始向這『中興』的紙老虎捌了一槍。他借琉球漁民到台灣被番民殺死的事出兵琉球，進行威脅。滿

淸當局一面旣力辯琉球本是中國的屬地，與日本無干，一面却又不敢和日本啓釁端，請了美國、英國出來調停，願意賠錢給日本，使他把軍隊撤出台灣。在這一事件中，西方列强看到這個東方小國居然『初生之犢不畏虎』，是極感興趣的，他們很願意扶持他一把，因爲用他來做監守中國的走卒，是最方便不過了。

同時，英國也借『馬嘉理案』來作更大的勒索。天津條約雖然是保障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廣大利益，但他們仍想加以擴充。天津條約中本有十年一修改的規定，一八五九年中英間卽遵約重議新章，新章雖對英國有利，但英國商人還覺得不够，英國政府便不加以批准。到了一八七四年，英國更藉馬嘉里事件而恫嚇威脅，達到了改訂新約的全部目的。馬嘉里是英使館職員，這時到雲南『考察』，途中被人暗殺，這本是因英國勢力透過緬甸而謀向雲南發展造成的事件，與修約並沒有關係。但英公使威妥瑪立刻廣泛的提出許多要求，並以公使出京，訴諸武力爲威脅。滿淸當局着了慌，總稅務司赫德又出來做好做歹，說是幫助中國政府調解此事。於是由李鴻章在赫德的『協助』下和威妥瑪舉行烟台會議，一八七六

年成立新的條約，除了結束馬嘉里案（賠款，道歉，保障今後英人入滇調查），並使英國的其他各項要求均得到滿足。領事裁判權有了更具體的規定，新的通商港口開放，長江向英國輪船開放，西藏讓英國人自由出入。——這個條約的意義實爲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與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的繼續與擴大。前二次條約都經過戰爭才成立，這一次却已不費英國一兵一卒了。在訂立了煙台條約後李鴻章向人說：『徒以廟堂憂系，時局艱危，不得不隱忍以圖息事……從此妥爲駕馭，二十年內或不至生事耳。』㊀於是還另一個『中興名臣』的奴相又完全拆穿了。

到了一八七九年，一面因『伊犂問題』發生了對俄國的交涉（帝俄軍隊佔領伊犂，經反覆交涉後一八八一年由滿廷借款贖回），一面日本又強行佔領琉球，正式實行兼併。加以德國在這時又在英國支持下脅迫滿清政府重訂商約。對這各方面，滿清政府都只能奴顏婢膝的妥協敷衍。左支右絀的狼狽狀態充分暴露。儘管當時在官員中也有大聲疾呼主張以戰爭解決爭端的，但那不過是憤慨的空喊。朝廷的決策總是力求避免戰爭，生怕一有戰爭，就又會重演一八六〇年的慘劇。

——可是戰爭在一八八四年還是發生了，那就是爲越南問題而發生的中法戰爭。

但中法戰爭也並不是根據當時滿清政府的政策必然發生的。中國方面站在這一戰爭的最前線的是劉永福的「黑旗軍」，——這是由太平天國時期活動於粵桂邊境的農民起義部隊流亡至安南而組成的。這支出生於農民革命軍的部隊挺身而爲民族戰爭的先鋒，雖然沒有充分的武器，却也很給法國侵略軍吃了一些虧。滿清當局自始就一面口頭喊戰，一面却在和法國講和，準備承認他對安南的權利。爲了達到一次吞併安南的目的，法國在一八八四年向中國宣戰。到一八八五年，海軍方面，法國雖在福建台灣海面得勝，但陸上，在安南北部的諒山，法軍却打了很大的敗仗，至少還不能算中國方面已完全戰敗。可是滿清却在這時，願意接受屈辱的讓步條件而講和，承認越南爲法國保護國，連法國人一時也覺得詫異。這固然由於滿清當局的卑怯，也由於列強各國的共同政治作用。本章第二節已經提到，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對中法和約的訂立是出了很大力的。於是在安南問題解決後一年，英國就能「和平」地解決了緬甸問題，使滿清承認了英國對緬

甸的宗主權。

由以上所述，可見到了中法戰爭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已經又有了重大的進展：一方面，重修條約以更擴大天津條約中的收獲；另一方面，削去中國的「外藩」，並開闢向中國西部腹地的入侵道路。——除了緬甸，越南，琉球外，朝鮮這時也已暴露在日本的侵略刀鋒下；而蒙古、西藏及川、滇各省也都漸漸滲入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印痕。

滿清統治者怎樣來掩飾這種屈辱失敗的慘狀呢？「中興」的迷夢既已做不下去，剩下來的就只有曾國藩所說「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也就是郭嵩燾所說的「傾誠以與各國相接」。目前暫時讓步，以待異日自強，不過是聊以解嘲；「以夷制夷」也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而已。

其實統治者那裏有什麼雪恥的存心呢？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曾出使英俄）在中法戰爭後一年在外國報紙上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其中甚至說得如

此直率：

……中國與西國人相交，更爲親睦，事出以實心，爲從前所未見。其於英國尤爲莫逆。諸國有所請於中國，苟能合理，毋許虛公妥議，可從則從，從前亦無不舍己從人之美意。近日與諸國交接，中國可謂和諧而無偏求，以後當復如是也。愚以中國雖記其前之覆敗，決不因棄其和好之心，蓋中國不似他國，一受毀害，始終切齒……(三)

以外交官身份而發表這樣不要臉的說話，的確是後來的中國一切買辦政客的先聲。

被稱爲「以夷制夷」政策的外交家是李鴻章。他在一八七四年對於台灣問題說：「與其聽一國久踞，莫若令各國均霑。」(四)對台灣一地，他是如此看法；對整個中國，他的看法也是如此。在日本對朝鮮的野心越來越顯著時，滿清官方勸告朝鮮政府的對策就是與歐洲各國都建立外交關係。其理由如總理衙門奏摺中所引丁日昌條陳中的話：「日本有吞噬朝鮮之心，泰西無絕滅人國之例，將來兩國啓釁，有約之國皆起而議其非，日本不致無所忌憚。」(五)李鴻章也爲此致書朝鮮的政府大員說：「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

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㊅李鴻章這時已漸漸躍居滿清外交政策的領導地位，爲列強各國所歡迎，重大的外交交涉幾乎都非他担負不可。他爲朝鮮畫的策也正是他用來爲滿清政府應付列強各國的不二法門。如果我們嘲笑李鴻章『以毒攻毒』策，結果只是把所有的『毒』都加到中國民族身上，使中國迅速地墮落到半殖民地的深坑中，那麼李鴻章是並不覺得無辭答覆這種嘲笑的。因爲他無論如何已因行施這種政策而博得列强侵略者稱許他爲『頭等的外交家』，而且博得滿清統治下的封建秩序繼續爲列強所容許而生存下來了。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只覺得能够這樣地生存着己是再好不過的事。他們的最大希望就是這樣的現狀能够繼存下去。

但是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後十年，中日戰爭突然爆發，使得連這樣的可憐的現狀也不能不發生激變了。

㊀ 蔣廷黻：『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頁一〇〇，頁九五。

㊁ 同㊀，頁一六六——一六七。

㊂ 原文係英文 此處用當時顏詠經袁竹一兩氏之譯文 見刻本『新政眞詮』初編之附錄。

㊃ ㊄、㊅ 均見㊀，分見頁一一三，頁三七五，頁三七七。

五　辦洋務的高材生

現在我們還要補充所謂『同治中興』的另一面的現象，就是『洋務運動』。儘管如前所述（本章第二節），外國人在電報、鐵路問題上極感不滿，並且嘲笑滿淸的『新式』軍隊，但是在同治年間的一班『新』官僚已很以自己的洋務建設而自傲了。到一八八〇年左右，鐵路、電報已開始建立，同時又積極購買兵艦，編練海軍。在中法之戰中，新式海軍並沒有拿出來用，所以在戰後，『面子』雖已丟盡，但在李鴻章經營下的北洋海軍仍似乎保有着強大的潛力，被看做支撐場面的一筆值得誇耀的資本。

滿淸官僚漸漸分化為兩種類型，是很明顯的。有一種是極端頑固的守舊派，他們用着仇視的態度對待從西洋來的一切新事物，輪船鐵路電報，一切都被他們視為『奇技淫巧』萬不能學，如果學了，例如大學士倭仁就認為那便是『變而從

夷，正氣爲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㈠每當局勢緊張之際，如在天津教案時，在瑪嘉里事件時，在安南問題上對法交涉時，在伊犂問題上對俄交涉時，在琉球台灣朝鮮問題上對日交涉時，滿清朝廷間都有主戰派的激昂的議論，這種主戰派往往就是那頑固守舊的官僚。

如果我們以爲他們是鑒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危機而反對西化，如果我們因爲他們有主戰言論，即以爲他們眞是因受外來侵略的刺激而有了民族思想，那就錯了。事實上，他們只是站在最腐敗的統治者的立場上，朦朧地感到在內外重重危機下自己的地位已異常不安，經受不住任何新事物的刺激，所以竭力迴避拒絕，作着卑劣而無效的努力，以求退到他們的美好的舊時代去。他們之誇誇其談地主戰，不過是出發於傳統中國皇朝對待『四夷蠻邦』的態度。所以當時較有實際的西洋知識的馬建忠在一八八一年嘲笑這類主戰論者說：『問其所以能戰，所以求勝之具，亦不過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鞭倭俄而笞英法。……師船尙未備也，則譁然而起曰，何不一逞於東？將士尙未練也，則

又譁然而起曰：何不一還於西？……』㊀這種主戰論者對實際情勢不了解，對他們自己的議論也不負責任，也決不能想到如何使中國真正能够抗拒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一到戰機眞的逼在眼前時，他們就噤若寒蟬，對於屈辱的讓步條件並不敢作任何主張了。而在他們所堅決拒絕的一切西洋新東西——電報鐵路等終於一一到來，列強各國的侵略一步步深入的時候，他們也無可奈何地默認下來，只要自己從這裏面還能分到一點油水也就引爲滿意了。所以到中法之戰中日之戰以後這類主戰論者就愈來愈消聲匿跡了。——這樣的一批官僚對於列強侵略者固然並不能成爲眞正敵人，但到底因爲他們太不『長進』了，不能積極地爲侵略者作有用的功臣，自然不能爲侵略者滿意。

同時也產生了一批較『新』的官僚，他們完全承認『洋人』的厲害；承認滿清政府要能穩定內部的統治，必須向『洋人』學習一些本領，並且承認滿清統治要維持下去，必須和『洋人』關係搞好，寧可凡事讓步吃虧，不宜惹起『洋人』的脾氣。——就在這樣的一批官僚的倡導下，產生了所謂『洋務』的風氣。求勤

於外國軍隊而剿平了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就是站在洋務運動方面的這批官僚的代表。如果我們因為這一批官僚在提倡洋務一點上不像前一批官僚那樣頑固，便以為他們在當時是促使中國進步的勢力，那也錯了。因為他們不過是想以洋務的皮毛來維持舊社會秩序、舊統治秩序的實質，他們也只是在當時列強侵略者所允許，所給與的範圍內從事洋務運動，只是盡着為侵略者開闢道路的任務而已。這一班『新』人物對於外交的看法和做法，在前面各節中已分別說到一些了。

曾國藩可算是中國政治史上第一個親美派的官僚。他在開始商量借洋兵『剿匪』時已力主應借用美國力量，那時他的說法是：『米夷質性淳厚，於中國時思效順。』㊂他曾於一八六四年派美國留學生容閎（第一個受美國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到美國去買機器，擬辦廠造槍砲，輪船。一八七二年滿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學生到美國，也是由他所倡議。但就在這一年曾國藩死了。他在洋務運動上成績不

多。至於他在外交上的成績，就是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的處理，使他在當時已被罵爲『賣國賊』。

左宗棠在浙江和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已與法國人建立了合作關係。一八七六年他在福建設立『船政局』（造船廠），聘用了法國人日意格（Giquel）與德克碑（D'aiguebelle）……即在太平天國戰事中在浙江助戰的法國洋槍隊的統領來主持。當他受命往西北剿捻與回時，他購辦了不少外國武器，這是他作戰順利的一大原因，德國的克虜伯大砲給了他很大幫助。一八七二年他在蘭州設兵工廠，由歐洲購置機器，經寧波福州和廣州而千辛萬苦地運到。爲了遠征新疆，他向上海的英國商人借軍費（這是內戰借外債的第一次）。一八八一年，他赴兩廣總督任過上海時，租界鳴禮砲十三響表示歡迎，左宗棠因爲外國人的這樣推崇他而極爲得意。

但左宗棠在一八八五年也死了。曾左兩人在洋務運動上的地位都遠不如李鴻章。李鴻章在太平天國之戰中和英國的戈登締結了很好的關係，戈登成爲李鴻章

所敬愛的兩個外國人中的一個[四]。在因伊黎問題對俄交涉時，李鴻章還特別從印度請了戈登來求他指教，借他在中國官員中的威名以壓下誇誇其談的主戰論者。英國人赫德總稅務司是在中日戰爭前李鴻章辦外交時所倚靠的顧問。雖在和英國舉行烟台會議時也以赫德爲幫手。無怪乎在他死後，日本人說他『前半生甚親英國，後半生最親俄國。』[五]（所謂後半生是指中日戰爭以後。）

中日戰爭以前李鴻章已辦了十多件外交事件，其中主要的如瑪嘉理案，中法安南之役等，前面已說到過了。在『洋務』建設上，他的確做了不少的事。他從外國購買機器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一八六五），又辦「天津機器局」（一八七〇）。他從一八七五年開始向英國，德國不斷地購買軍艦以建設海軍。他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一八七六），并聘請多數的外國軍官訓練他的陸海軍，英國海軍軍官朗威理（Capt. W. M. Lang）曾受聘爲海軍總教習，德國人漢納根（C. Von Hanneken）直至中日戰爭時一直是李鴻章海軍中的得力洋員。此外，在海軍中還有 Tyler, Mc.Giffen, Mc.Clure, Purvis, Nicholls，很多人爲

軍官。中國之開始設電報鐵路也是李鴻章經手的。他在一八七八年設立開平礦務局，以英國人巴賴（R. R. Burentt）爲技師長，爲運煤方便見起，再聘英人肯德（C. W. Kinder）主持築鐵路，並設開平鐵路公司，後在一八八七年爲興工延展這鐵路，向匯豐銀行借款一百萬兩，這是中國鐵路借款的第一次。此外他還創設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二），上海織布局（一八七五），這是官督商辦的企業制度的開始。

對於李鴻章的洋務建設，應該指出：第一，其中心是在軍事上，而他的軍事建設完全是靠向外國人買武器，並靠外國軍官們直接幫助的。第二，縱然在他的努力下使中國開始有了近代工業和交通事業，但完全在買辦的官僚資本控制下，他的官督商辦一開始就沒有好成績，成爲阻止民間資本自由發展的鐐銬。而他自己卻已致富。梁啓超說「世人競傳李文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約數萬金之產業意中事也。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商鋪銀號全屬其營業云。」㊅

在中法之戰中，李鴻章是極力反對戰爭，力求媾和的人，在戰後，他的權勢蒸蒸日上。他所編練的海軍似乎成爲中國將來希望的唯一寄託。布蘭德（J. O. P. Bland）給李鴻章作的傳記中說得好：

北洋艦隊的組成經過了二十多年，他在一八八六年（即中法和約後一年——引者）在數量上達到最高點，在一八九〇年在效能上也達到極點。在一八九一年艦隊訪問日本，使日本得到深刻的印象。……李鴻章每三年檢閱一次海防，其最後一次（一八九三年）帶着勝利進軍的神氣。他的畢生事業展開在一切人面前，讓大家欣賞：他的要塞和學校，鐵路和船塢，艦和砲，都粉飾油漆得煥然一新。禮砲齊鳴，龍旗招展，向他的來和去致敬。……這是李鴻章的威望的極盛時，但是烏雲已經漸漸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聲望的陽光永遠掩蓋起來了。但當着他成功地展覽了他的出品，在歡呼與感謝聲中回來的時候，人們不能不奇怪，這個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等程度，竟然自滿於這虛幻的偉大工程。因爲在他周圍的一切，在他的船的甲板上，在他的一切衙門機關裡，有的都是他自己委派的許多無賴漢，他們只是忙着把錢裝到荷包裡，出賣了國家的安全。〔註㊆〕

僅僅用貪污一點還不够解釋李鴻章的失敗。整個社會的封建生產關係既沒有任何變動，仍建築在腐敗的專制主義、官僚主義基礎上，一切發展工業的計劃和建設近代國防軍的計劃都只能是沙上建塔一樣而已。李鴻章自己何嘗全不知道。

所以他在中法之戰中決不肯動用他的軍力，而中日之戰也是他所再三迴避，終於在無可奈何下才出而應戰的。

不用說得，李鴻章這樣的人，是列強侵略者可以引爲滿意的高才生。列強固然不願意中國因改良軍事而眞正成爲强國，但在這時，列强決不怕滿淸太强，只怕他太弱到無力安定內部。照李鴻章這樣的辦法來建設軍事，更是只對列强有益而全無害處的。李鴻章建設其洋式的軍事時，雖然口口聲聲說是爲了加强海防，預防洋人侵犯，實則只是爲外國的軍火商人開闢了市場，使外國人能控制中國軍事。拉鐵摩爾說得好：『經過太平天國革命後，在中國政治上發展出了一個新的邪惡的因素——半新式的中國軍隊。這種軍隊和指揮他的軍閥，有足够的力量以肆虐於中國國內，却無力量從事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自衛戰爭。』㊇一八九四年對日本人的戰爭完全證實了這說法，在這一戰中，李鴻章所苦心孤詣締造的新式海陸軍全部崩潰了。

㊀ 陳恭祿：『現代中國史』一、頁二五五。

㊁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影印本）卷三，頁二四。

㊂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上，頁三二七。

㊃ 梁啓超：『李文忠公事略』卷四，頁一〇一——其所舉另一個人為美國的格蘭德將軍，但格氏與李只見過一次，沒有多少直接關係。

㊄ 同三，卷四，頁十二所引德富蘇峯語。

㊅ 同㊂，卷四，頁一一。

㊆ J. O. P. Bland, Li Hung-Chang, pp.227-228

㊇ Owen and Elinor La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120

六　人民的新課程

前面說到（本章第一節），太平天國的南京陷落後十年，一八七四年左右，國內各地區的農民起義與少數民族起義都已相繼失敗，於是在以後的二十年間，我們就只看見封建統治者阿Q式地自誇『中興』，而進行着其無恥的『媚外』課程。但這能否表示中國人民中革命的機運已經消滅，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媚外官僚眞已得到全勝了麼？

太平天國及其同時的其他運動的失敗，表示着屬於封建時代的單純農民戰爭已經過去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封建統治者學習着新的課程，用新的辦法來維持其存在；同時，人民大衆也在學習着新的課程，將不能不以新的認識，新的陣容，展開新的鬥爭。——但這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是極艱難的事；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以前，還只能看到一些新的萌芽、

這種新的萌芽，一方面表現於廣大下層人民中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及媚外官僚的思想和情緒漸漸普遍；另一方面表現於士大夫階層中受到環境的刺激，漸漸形成接近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思想。

我們看到經過一八四〇年的第一次雅片戰爭後，沿海各地——特別在廣州，已經產生反對外國侵略的羣衆鬥爭。到了一八六〇年後，經過了第二次雅片戰爭後，外國侵略勢力漸漸深入內地，外國的商人和教士的特權地位與官僚當局的媚外醜態都暴露到人民的面前，這就不能不啓發人民的新的認識。

在一八六五年時，有一個外國人記載他在北京附近農村中曾遇見一個姓馬的農民向他說：「沒有一個官是好東西。他們拉着我們和洋人打仗。但是一看見高大的洋人騎着大馬來了的時候，你說他們怎麼樣？他們馬上溜掉了，讓我們代他們活受罪！」㊀——這姓馬的說的是他對於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的評論。這樣的認識在當時的民間並不是不普遍的。一八六二年的南昌教案時，江西巡撫沈

葆楨於奏摺中報告說：『臣訪聞街談巷議，咸謂官藉外國威迫小民，人情洶洶，深恐復激成變故。』他還把他派出查訪的人所聽到的民間說話如實記錄了出來，那說的是：『官府紳士是依他（指『洋人』——引者），做官的止圖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性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有家當的也會搬走，受罪的都是百姓，與他何干？我們如今都不要他管。我們只做我們自己的事。』㊁這江西巡撫所報告的話和那外國人在北京城附近鄉村中聽到的話，內容幾乎完全一樣。足以證明這些紀錄的眞實性是可以相信的。

但這還是較早的情形。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發生時，內閣中書李如松的奏文中說：『庚申（一八六〇年）以來，外夷英法俄美等國和議既成，各夷館分設中國，到處激變居民。近而淮陽，遠而黔蜀，莫不與夷搆難。』㊂足見當時人民中的情緒了。

自一八七〇年曾國藩辦天津教案，開了以重刑壓制愛國人民的先例，在各地方官的嚴厲彈壓下，所謂『教案』一時比較少了。但這不表明人民已習慣於新的

情況。丁日昌於一八七四年說：各地方官吏是『見教士則若天神，視平民則如魚肉』，又談到各地稅卡情形說：『權吏卡員，苛索萬狀，翻囊倒篋，無異盜賊。隨身需用之物，在洋人尚有優免之章，獨至華民漏報一絲一縷，雖全船貨物充公而尚須加以重罰，不知當事者何厚於對洋人而薄於對華商也。』㊃李鴻章也承認這種事實，他在一八六七年說：『各國皆知自爲百姓，獨於中國百姓欲加強迫，且欲脅各官以制百姓，脅朝廷以制官民，情理本欠公允。』㊄連這些在朝的大官都不得不說出這事實，可見這已是民間普遍的觀感了。一八九四年馬建忠說：

竊謂今日之中國，其見欺於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來，彼與我所立之約款稅則，則以向欺東方諸國者轉而欺我。於是其公使傲睨於京師以陵我政府，其領事強橫於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於租界以剝我工商，其諸色教士散布於腹地以蠱我子民。㊅

在這有改良主義新思想的人所說的話中，也正反映着當時個個人所能看得到的現象。

廣大的下層人民一時還敢怒而不敢言，並且除了那種反對教會的比較幼稚的

行動外，也一時還沒有能找到別的方式以從事新的鬥爭。而在上層士大夫中便醞釀着改良主義的思想。

近代中國第一批的改良主義者是在帝國主義侵略狂潮下產生的，在他們的思想中深刻地表現着這個特點：他們多半還是出身於仕宦之家，而且自己也博得了一官半職，他們和洋務運動的大官僚關係常很密切，但在思想上却有差別。洋務運動的大官僚以在既存的條約下維持「和局」爲滿足，而這些改良運動者看出這種條約對於中國是種鐐銬；洋務運動者以爲只要官督商辦的工業和使用新槍砲的軍隊就够了，而這些改良主義者却漸漸地，雖然用着極其胆怯的口氣，透露出了進一步的自由發展民間企業的要求乃至政治改革的要求了。在中日戰爭以前，中國沿海各省的工商業已有了初步的發展，新興的工商業者還不能成爲一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的微弱的想望就在這一班改良主義者身上找到了代言人。

此地不可能詳論這些改良主義者的思想主張，只能就本書的主題範圍內略舉

一二。

我們前面提到（本章第二節），像郭嵩燾那樣的洋務運動者，在一八七六年還在歌頌外國人講「公法」，講道義；但到了一八七八年，馬建忠因爲自己留學於法國，已能看出：「泰西之講公法者，發言盈庭，非說理之不明，實所利之各異。……辦交涉者不過藉口於公法以曲徇其私。」㊆一八七九年，那是在烟台條約訂立之後數年而中德又在擬修條約時，薛福成斷然指出，與外國已訂立的條約根本上是不平等條約。他說：「中國立約之初，有視若尋常而貽患於無窮者，大要有二：一則曰一國獲利，各國均沾也；一則曰洋人入居中國，不歸中國官管理也。」㊇

改良主義者已能看出，當時的中外關係是不利於中國民間工商業發展的。關稅爲外人操縱，低的進口稅率便利了洋貨的進口，而厘金的盤剝又獨加於土貨的運銷上。馬建忠說：「（通商各國）數十年吸中國之膏血，官商貧富無不仰屋而嗟。」所以他認爲：「稅章之損華商而益洋商歷有年所，……急須更張。……華

商爲我國之民，故輕其稅賦，洋商奪我國之利，故重其科征。」(九)他的主張是釐金而加重入口稅。陳熾也說：「稅則者國家自主之權也，非他國所得把持而攙越者也。」他主張關稅自主，增加進口稅，減少出口稅。這些正是發展民族工業的主張，却決不是買辦式的洋務運動者所能做到的。

像馬建忠、陳熾、薛福成以及王韜、鄭觀應、陳虬、宋育仁、何啓等人，都可算是當時的提出進步思想的人。對於洋務運動的官僚們，他們已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批評。在前者以新式陸海軍自傲時，他們特別重視本國工商業不振、利權外溢的病態；在前者以官僚勢力控制工礦交通時，他們則强調由商民自行集股經營，而由官方加以獎掖；在前者死死地掩着專制主義的傳統政治的時候，他們已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和「君主立憲」的思想。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前不久著「庸書」的陳熾主張設立議院時說：「國家設官分職，本以爲民。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現今日萬國通商，要求無饜。旣立議院，即可以民情不順，力拒堅持，合億萬人民爲一心，莫善於此。夫民心即天心也，下協民心即上符天道。」(十)閣

然還是極有限度的民主思想，但在沉沉死氣的古老中國出現了這樣的議論，不能不說是新鮮而值得重視的事。

由此可見，在漸漸展開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一方面，不滿與騷動情緒正在下層廣大人民中積蓄着，而在上層士大夫中，也出現了這種雖只是改良主義的，但終究是與當權的統治集團的意志相違背的新思想，——那麼，到了中日戰爭給整個統治秩序以致命的一擊時，中國的社會政治就不能不發生巨大的波動了。

(一) Mitford Attache at Peking p.129

(二)、(三)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頁八十及八三 頁八九。

(四) 丁日昌，『海防條議』，引自海防要覽（木刻本）卷上，頁廿五。

(五) 同(三) 頁二二

(六)、(七)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四，頁二十，卷二，頁十二。

(八) 薛福成，『籌洋芻議』（文瑞樓石印本）頁一。

(九) 同(八)，卷四頁六，頁九。

(十)、(十一) 陳熾『庸書』（文瑞樓石印本）外篇，卷上，頁五，卷下 頁一〇。

第三章 「洋人的朝廷」（一八九四——一九〇一）

一 『瓜分』與『門戶開放』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對於遠東國際關係的發展，也就是說，對於列強對華關係的發展，可說具有劃時期的意義。在中日戰爭後六年（一九〇〇年）發生『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事，而在一八九五到一九〇〇年之間已出現了所謂中國被『瓜分』的危機。

中日戰爭中，一方面是新興的日本，他從一八七一年與中國訂立第一個商約後已開始對中國和朝鮮從事侵略行動，以全力作了軍事侵略的準備。另一方面是老大的滿清帝國，他雖然在這二十年間也在洋人幫助下建立了新式的海陸軍，但是國內政治的腐敗與帝國主義的控制，使他不可能進行眞正的對外反侵略戰爭。

戰爭進行只有半年，滿清的陸海軍戰無不敗，李鴻章的北洋海軍全部覆沒。這時雖然有在北京『公車上書』的士子們主張遷都決戰，但怯懦的滿清統治者已不敢再打下去了。英國和美國先後出來調停，李鴻章被派爲全權大臣赴日本乞和。屈辱的馬關條約於一八九五年訂立。

日本的勝利和馬關條約的訂立，對於列强侵略中國的陣營直接引起了巨大的波動，是非常顯著的。

在一八九四年前，日本雖已在西方列强的同情下併吞琉球，伸展勢力到台灣朝鮮，但西方列强只是用他作爲看門犬，以直接監視中國，同時牽制帝俄，他還沒有能和西方列强列於平等的地位。因爲馬關條約及其附帶的中日通商條約的訂立，日本不但得到了割地和賠款，可以更養壯他的軍事帝國主義的力量，而且從此他在中國取得和西方列强平等的地位，成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陣線中的正式的一員。沙俄帝國對於日本的興起是極度猜忌的，所以他在馬關條約訂立後即聯合法國德國而共同施壓力於日本，逼他把已取到手的遼東半島退還中國，而由滿清

政府贖回。為了防止沙俄帝國的發展，英美則繼續支持和鼓勵新盛的日本帝國。因此在遠東國際關係上列強縱橫捭闔的對抗形勢愈加尖銳。

西方列強看到滿清統治下的中國竟然在這戰爭中潰敗得如此迅速而乾脆，多少也有點出於意外。這隻似乎還有希望浮起的船簡直是隨時都可沉下去了。如果日本或別的國家單獨用武力吞併中國，或者如果中國國內再發生太平天國那樣的人民起義，則滿清政府勢將毫無抗拒能力。於是列強各國一面仍繼續其『支援破船』的政策，一面又各自為保障自己的利益而爭先恐後地向中國作進一步的行動了。而且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正是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國內工業生產飛速發展，獨佔金融資本的統治漸次形成的時期，由此他們進入資本帝國主義的階段，對殖民地有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幾乎全部非州已為他們所瓜分，亞洲的極大部分也已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對於中國，過去雖已取得充分的政治特權，以保障其商品傾銷和經濟掠奪，現在他們覺得不能滿足。因此自中日之戰後，五六年間，列強在中國展開了獲取『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並向中國投資的大競爭。

列强間的角逐競爭的結果，使中國沿海的大部份重要海港均成爲列强的租借地，列强各國又分別取得中國全國各重要鐵路線的投資建築權和各重要礦山的投資開採權。某一帝國主義取得某一段鐵路的建築權，即等於在這段鐵路的沿線取到了特殊勢力。他們爲使其特殊的『勢力範圍』合法化，更令滿清政府公開承認在某一地區內之土地不得租借給某國以外的其他各國。在他們相互間又常因爲避免衝突的激烈化而互相約定，承認各自的勢力範圍。——到了一八九九年時，我們已可看到，英國取得威海衞港口並以長江流域爲其勢力範圍，俄帝國佔旅順大連而視滿蒙爲其獨佔權益的地區，德國攫取了膠州灣，更把山東擺在自己的控制下，法國迫使滿清承認其在雲南和兩廣一部份地區的特殊權益，並以廣州灣爲其租借地，日本除了已由馬關條約而取得台灣和控制朝鮮外，又逼令滿清政府聲明福建省及其沿海島嶼永不讓與別的國家。——這樣就形成了當時所謂列强『瓜分中國』的形勢。

對於這種形勢，滿清的對策是什麼呢？這期間實際上主持外交的是李鴻章。李鴻章的外交政策是什麼，在前一章中已經說到。如果說，在中日戰爭以前，他除了以所謂『以夷制夷』的政策來掩飾其屈服外交外，還可以拿養精蓄銳，長期準備之說來欺騙人民，那麼到了現在，李鴻章的一些軍事上的本錢既已在和日本戰爭中輸光，便只剩下了『以夷制夷』一塊空招牌了。拉攏俄國，成爲他應付日本的唯一辦法。一八九六年（即馬關條約後一年）李鴻章奉派出洋，遍訪歐洲各國，首先到俄國，和俄國訂立了中俄密約。滿清政府和李鴻章以爲靠俄帝國可以制服日本，這固然引起了日本的反感和英國的不滿，但結果不特俄國如願以償，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而且英國、日本和其他各國也都各各提出要求，同樣有求必應，無不滿意。因此所謂『以夷制夷』，在這幾年中實際應用的結果更證明了不過是全面地向列強妥協讓步而已。在這政策下，滿清政府只是照例在列強的要求下簽字，對於軍事威壓和外交脅迫，連一點抗拒的表示都沒有。

滿清這樣的不顧一切向列強『施捨』，能夠換到什麼東西呢？所能換到的，

第一就是列强繼續承認滿清政府。列强的要求既然向他提出，要他簽字承認，那麼，他作為中國統治者的地位，就在列強面前取得存在的理由。第二就是列强對他的借欵。因為中日戰爭對滿清政權的打擊太大了，使他只能更加依賴帝國主義列强的『承認』而存在，同時，外國對他的借欵更成為維持其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在列强方面，因為可以用借欵來換得任何在中國的特權，所以他們中間發生了劇烈的競爭——爭着做中國的債主。中日戰爭前，滿清借外債還不多，戰後五年間（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已借款七次，總數合五千四百多萬英鎊。英德銀行團爲一方面，俄法銀行團爲另一方面，幾乎每一筆債務，都引起雙方的爭奪。各國在這幾年間，又提供給滿清好幾筆鐵路借款，誰借錢築那一條鐵路，誰就能控制它。因此也惹出劇烈的競爭。列強爭着借款，自然都是爲各自的利益打算，但在國庫如洗的滿清政府看來，總是可感的甘露。而且，列强愈多借錢給滿清政府 也就是他們愈把自己的利害和滿清統治者的利害深深地結合了起來，於是滿清政府也愈覺得有把握不至於被列强所拋棄了。

因此，對於滿清政府的對外屈服，全面妥協，我們與其說他是麻木不仁，自蹈危機，毋寧說這實際上是滿清政府從他統治者立場出發的精明的打算。因爲，縱然當時中外都哄傳要『瓜分』中國，但是列强究竟還不能拋棄滿清政府，而把全中國分割爲各自獨有的殖民地，所以在滿清統治者立場上看來，決不肯因違抗某一帝國主義的要求而危及自己的生存，寧可對外一切屈服，以維持其對內的統治。因此就出現了所謂『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之說，梁啓超在一八九九年所著的『戊戌政變記』中說：『大學士軍機大臣剛毅常語人云：我家之產業寧可贈與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㊀正是滿清統治者心理的寫照。

所謂『瓜分』，本來是指帝國主義列强分割非洲的那種情況。但列强在中國利害關係的交錯，遠比非洲爲複雜；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國有着這樣的一個政府，它已經對外馴服，對內還能維持統一政權的姿態，所以對列强各國最有利的辦法，還是通過滿清政府，以確保各自所得到的權益，並加以擴大，而在相互間盡可能取得協調。拉鐵摩爾對於一九〇〇年前的形勢，指出得很對，他說：『

……一次次的戰敗，毀滅了政府的威信，因戰敗而付的賠款，使得中國的財政收入中，受外國人控制的部份，愈來愈大。可是外國人並沒有眞打算瓜分中國，總是給還滿清朝廷以充分的權力，使它能繼續統治，其統治也就只能是很糟糕，而不能是很有效力。』㈢

就是在這情形下，一八九九年美國政府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

上文講到列強劃分勢力範圍的競爭時，沒有提及美國。美國並非對此不感興趣，他也在一八九八年由滿清政府取得了粵漢鐵路的投資建築權（雖然又因別的國家的干涉而失去）。但是他的確沒有分到勢力範圍，這是因爲——如麥克納爾所說：『與其說他（美國）是反對歐洲列強在中國的侵略政策，毋寧說是他因爲太忙於從事對西班牙的戰爭，和應付菲律賓人的叛亂，所以他不能對中國表示積極的興趣。』㈣原來美國雖於一八四四年已脅迫滿清政府訂立望厦條約，但在一八六一後數年間，即英法幫助滿清政府打太平軍的時候，美國却因國內的南北戰

爭，失去了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好時機。以後三十年間，本國內的經濟開發，佔去了美國資本家主要的注意力。這期間美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得很快，一八七〇年時，他的工業生產在全世界列強各國中僅次於英國，但到一八八〇年後，已超過英國而位居第一了。美國大資本家挾着巨大的生產力，雄心勃勃，開始作帝國主義的開拓。一八九八年爲爭奪殖民地而和西班牙戰爭，太平洋上的關島與菲律賓遂落到他手裏。菲律賓人的獨立運動也在一八九九年爲美國武力征服。就在這時，美國向其他列強關於中國問題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

曾有人以爲，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是和當時別的各國政策相反的：別的國家想『瓜分』中國，只是由於美國這提議，才使中國免於『瓜分』的危險；別的國家是對華侵略，而美國却是好意地保全中國。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乎事實。

首先，美國向其他各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並不是反對侵略中國，只是要求在對中國的侵略中，也讓他有一份。所以美國並沒有表示反對歐洲列強所已經建立的『勢力範圍』，只是提出了『利益均霑』的原則。那就是說，你們各國在

中國所佔的權益，我也得有一份。你有份，我有份，大家都有份。大家都承認現在的中國政府，而共同享受在中國的一切權益。——『門戶開放政策』的基本內容就是如此。當時美國人雷德（Whitelaw Reid）在『擴張的問題』（Problem of Expansion）一書中，曾如此說：『合衆國的勢力伸展到菲律賓之後，構成了防禦中國海的障壁，換句話說，太平洋的彼岸已和此岸一樣的確立了支配的地位。我等支配太平洋的權利已經倍加，支配二十世紀可驚的貿易的責任是落在美國的肩上。只要我們方針不錯，合衆國領有菲律賓之後，太平洋早變成了美國的一湖水。』㉔同時斯考特．尼陵（Scott Nearling）也說：『菲律賓對於美國的重要正與德國的膠州灣，英國的香港立於同等地位。』㉕有一個美國參議員波佛里治於一九〇〇年一月九日發表的演講中說：『菲律賓羣島永遠是我們的。……而中國的廣大無限的市場就在菲律賓的後面，我們兩者都不放棄。我們不能忘記我們對這一個羣島的責任，我們不能放過那給我們在東方開闢前途的機會。』㉖這些說法，完全可以表明，美國正是在太平洋上舖好了向中國發展的道路後，抱着帝

國主義的擴張的雄心而對中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

其次，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實是和其他各國的意願相反麼？——也不是。當時美國只是用一紙文書，向有關各國提出這主張，各國即先後表示接受。美國並沒有什麼實際力量以壓迫各國接受這主張。所以美國這個主張，實際上不過是把過去五十年來列強齊頭並進共同侵略中國的事實，和當時各國在基本上相一致的共同態度，寫成概括的條文而已。英國本來在中國最佔優勢，但他既不可能制止別的國家劃分『勢力範圍』，所以也不反對『利益均霑』，只要自已能享有最大的一份。美國提議門戶開放政策的文字，實際上最初是由一個曾經在中國海關服務的英國人西比斯萊（ Hippisley ）所寫出，而由美國駐華公使洛克希爾（Rockhill）帶回國去，交給國務卿海約翰（ J hn Hay ）的。日本當時也滿口贊成美國的提議。石川菊次郎在『外交餘錄』一書中說：『我國保持東洋和平之策，在於防止列強分割鄰邦中國。……所以美國政府的提議，對於日本正是「要渡河而船來」。』[7]原來當時列強各國既是誰也無力獨吞中國，所以每一個侵略

者，爲自己打算，都覺得讓現狀繼續保存着，使自己沒有被別人排斥的危險，而有乘機發展的可能，是最有利的事。因此跟着美國的提議，英、日、俄、德、意各國都表贊同，這就是無異於列強互相保證共管中國。

「門戶開放政策」雖是有關中國，但列強並不覺得有關一下中國政府的態度如何的必要。滿清政府不免因此覺得有點「失面子」，而且從此更不能拿所謂「以夷制夷」法來自欺欺人了。但是他立刻發現，在這政策下是更加保證了他作爲「統一而完整」的中國的統治者的地位；只要老老實實承認列強各國做共同的主人，就不至於有「亡國」的危險。所以後來，滿清政府以至繼滿清政府後的專制賣國政府，甚至是靦顏無恥到自己向各國要求「尊重」「門戶開放」了。

(二)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初版本）卷四，頁十四。

(三) Lat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123

(四)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563

(五)、(六) 李蔣麟，『門戶開放與中國』頁四三，頁四四。

(七) 李昂季葉夫，『美國擴張政策的史的發展』（時代週刊三二八期頁三三）

(八) 同四，頁四八

二 「君子」們的幻想

中日戰爭和戰後列強分割中國的危機，對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生活，也不能不發生重大的影響。中日戰前已經出現了的新現象——如前一章第六節所說——一方面是上層士大夫的改良主義的政治思潮，又一方面是下層羣衆中反對外來侵略的情緒也漸次高漲。這兩方面在中日戰爭都進一步發展了。前一方面的發展，表現爲康有爲領導下的變法維新運動。

康有爲於一八八八年已曾以「布衣」諸生的身分上書皇帝，爲他從事政治活動的初露頭角。那次上書的內容大致上與同時代的改良主義者的看法差不多。到了一八九五年，在中日和約尙未訂立時，他又聯合在北京應考的各省舉人（據說有一千三百餘人參加）聯名上書。但這先後兩次上書都沒有能送到皇帝眼前。同年間，他又單獨兩次「上書」。一八九七年冬因爲德國強據膠州灣，他再入京作

第五次「上書」。這次「上書」中的激昂的詞句和周到的議論使他博得了年青的光緒皇帝的信任。次年他和他的門徒及同志們進入政府，從四月到八月他們通過皇帝的「諭旨」進行政治上的「變法維新」，但一共只有一百天的命運（所以史稱百日維新）。八月間，發生戊戌政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一舉而撲滅了所謂「新政」，皇帝被囚，康本人亡命出國，「康黨」有的被殺，有的被拘禁開革。

康有為及其同志們努力爭取一個皇帝，並企圖獲得已具有勢力的中央大員和地方督撫的贊助，這種做法已表現了他們的政治運動的性質。但同時他們也注重辦「學會」（如一八九五年的「强學會」，一八九八年的「保國會」及其他各省的學會），辦報紙（如萬國公報，時務報），所以這已是帶有組織性和政治性的運動，比以前的改良主義者只是作個人活動的，進了一步。但他們所爭取和團結的究竟只是在上層社會的小圈子裏，他們並不信賴廣大的人民力量。他們的政治主張在基本上也沒有超出改良主義範圍。廢除八股考試制度是他們的最「激烈」

的主張；他們希望實行以地方紳士勢力爲基礎的「地方自治」，並趨向於實現一種君主立憲的制度。可以說，這些維新運動者是給二十年間的改良主義政治思潮做了一個總結，更顯豁而直率地提了出來，以形成一個政治運動，想直接運用皇帝的權力而大刀闊斧的實行起來。

這個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在當時的進步意義是不可否認的；而這一運動並不能衝破黑暗反動的既存統治勢力，終不能不悲慘地失敗，尤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並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他們的思想和主張中的弱點，是不能不受到檢討的。——但一般地論述這個運動不屬於本書的範圍，這裏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這一運動和當時國際政治的關係。

很顯然的，在這運動中強烈地表現着愛國主義的性質。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直接促成了牠；也可以說，它是當時士大夫層中的「救亡運動」。

康有爲的歷次上書無不痛切申述亡國危機，可以代表當時時局所造成的士大

夫層中的悲憤心理。如在一八九五年中日和約後的一次上書中說：「近者朝鮮之變，日人內犯，此聖清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發憤痛心者也。然辱國之事小，外國皆啓覬覦，則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邊民皆不自保，則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又說：「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斃，蓋在此也。」(一)到了一八九七年冬德國強佔膠州灣時，康的上書內容更激昂了。他說的是：「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分中國爲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恐懼回惶，不知死所。……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斷；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權亦失。……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二)這樣的警告口氣，在康有爲的立場上，確已可說是至矣盡矣了。他向「士大夫」們大聲提出救亡的口號：「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

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保國會演說詞）

不能不承認，康有爲及其同志們在當時對於民族危機是有着敏銳的感覺的。甚至他還指出，作爲中國的皇帝其實已無權力，一切已受外國的操縱，所以實際上已可算是『亡國』了。他說：『路待商之德廷（此指當時築津鎮鐵路，擬經山東，電德國政府商量，德國不許），道員聽其留逐（此指清廷所派山東道員，爲德國限令撤去），是皇上之權已失。』（保國會演說詞）『雖名爲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客予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矣。』（統籌全局疏）

但問題是——雖然他們是看出了在帝國主義侵凌下的危亡局勢，究竟這局勢由何而來，癥結何在呢？

他們提出一個極簡單的看法：中國自己太不行了，所以難怪人家來欺負。例如康有爲在一八九七年的『上書』中說：『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

吾旣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他們的議論僅僅做到此地，於是，第一，他們不再進一步看出，中國的『弱昧』與『亂亡』是腐朽的專制統治機構所應負責的，反而以爲只要皇帝領導着士大夫們振作一番，問題就能解決。第二，他們也不敢追問，是否中國自己一振作起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就會停止，就會自行撤回呢？他們看不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是他們斷不會自行放棄的政策。——這正是所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由此出發，他們的愛國思想並不能進而爲反帝運動，反而成了爲侵略者辯護，而向帝國主義者繳械。

旣然是片面地斷定因爲中國不行，難怪別人侵凌，那麼推論下去，侵略者一向的行爲倒反而成爲合理的了。康有爲的有名的學生梁啓超在一八九七年爲湖南的南學會作『序言』（也可說就是宣言），固然也沈痛地指出：『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但他接着就問，何以外國不馬上瓜分中國呢？他以爲還是因爲瓜分會使中國『淪胥糜爛』，於各國商務不利之故。於是他說：

而無如中國終不自振，終不自保，則其所謂瓜分者終不能免，而彼之商務無論遲速而必有受牽累之一日，故熟思審處，萬無得已，而務給必出於瓜分云爾。然則吾苟確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機，則其謀可立戢，而其禍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東之役（一八九四中日戰爭）後，而泰西諸國猶徘徊莫肯先動，以待我中國之有變一局。及至三年，一無所聞，而德人之事（奪膠州灣）乃復見也。㊂

照這樣說來，泰西各國是好意企待中國的自振，其所以發動侵略的行動，是出於「不得已」了！

康有為的另一同志譚嗣同，戊戌政變中勇敢的殉道者，本身是個湖南紳士，在思想上表現得最為激進，但是在這一問題上同樣犯了嚴重的錯誤。在他一八七四年的一封著名的長信（覆貝元徵書）中甚至於如此說：

萬國公法為西人仁至義盡之書……惜中國自己求亡，為外洋所不齒，曾不足列於公法，非法不足恃也。……中國不自變法，以求列於公法，使外人代為變之，則養生送死之權利，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黃種之民胥為白種之奴役，即胥化為日本之蝦夷，美利堅之紅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此數者皆由不自振作，遂他人入室，悉驅之海隅及窮谷寒瘠之區，任其凍餒。

這是說，中國太不行，「自己求亡」，所以雖有「仁至義盡」的萬國公法也不能適用於中國！這說法甚至還比改良主義者馬建忠（見第二章第六節）更落後了。

「維新志士」們所說的這些話，幾乎使我們看不出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辯護士們有多少不同了。當他們宣傳着發奮自強而掩蓋了帝國主義者的罪惡時，他們就同時在如何解脫帝國主義束縛的問題上跌入輕率的幻想。照康有爲說起來，「所有新政詔書，雖未推行，德人聞之，便當退舍。……然後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矣。」（第五次上書）譚嗣同說得較謹愼一點：「凡利必興，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須保護，人自不敢輕視矣。每逢換約之年，漸改訂約章中大有損者。……但使一國能改，餘皆可議改，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強。」㊄他也是幻想不經過根本的改變，由漸進的過程便可得帝國主義列強的同意而解除一切束縛。但是這些幻想立刻就被歷史事實所打破了

事實上，當時他們的政治運動非但並沒有嚇倒侵略者列強，反而爲他們所蔑

迎。因爲很淸楚的，維新的愛國運動並非正面的反帝運動，並不會對於帝國主義在華權利的保持有何妨害。帝國主義本來也不滿於滿淸的過分庸碌無能，担心牠將無力完成其統治中國的任務，因此也希望牠變得較有效率一些。而維新運動者所提出的主張內容並沒有超過他們所願望的範圍。由此可知，當戊戌政變時，英國和日本的使館盡很大的力幫助康有爲與梁啓超脫險，那並不是偶然的事。

而且我們還該指出，這些維新運動者甚至幻想中國可以依靠某個帝國主義的力量而完成他們所主張的政治改造。前節已說到，在中日戰爭後，李鴻章所主持的淸廷外交政策是拉攏帝俄，來平衡日本的勢力。於是在維新運動方面就漸漸趨向於一種主張，卽拉攏日本及他當時的與國——英國。如戊戌政變中與譚嗣同同時殉難的楊深秀就曾明白地向政府提出過這主張。梁啓超爲他作的傳中說：「光緖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台（御史台），第一疏卽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㊄又如譚嗣同的好友唐才常（後來在一九〇〇年也爲淸廷所殺）也曾竭力主張此說，在戊戌政變前寫了「論

中國宜與英日聯盟』一文，他以爲俄國對中國危險性最大，而斷定『英日必不坐視吾中國之漸焉澌滅』，所以他認爲『欲醫中國』有治本治標之法，而『治標者卽聯盟英日之謂』。他說：『合中日英之力縱橫海上，強俄雖狡，必不敢遽肆其東封之志』。甚至還說：『今日人旣願聯盟我，且願密聯中英相犄角，且願性命死生扶持，千載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唐才常的這篇文章還透露了一件事，日本參謀部這時密派過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宮太郎三人到中國，他們曾於漢口和譚嗣同晤談。他們向譚表示中日戰爭實在是個錯誤，日本很願和中國盟好，且曰：『如聯盟計成，吾（日方自稱）當爲介於英，而鐵艦資焉，兵輪資焉，一切政學資焉。……』這幾個日本特務的甜言密語竟使得唐才常如此高興地說：『千載一遇，何幸如之！』㊆

這要算是可驚的事。中日戰爭的血跡未乾，這班維新志士一面聲嘶力竭地高喊列強『瓜分』的危機，一面却已輕信日本帝國主義的甜言蜜語，相信可以和他結盟好關係！原來在帝國主義已經對中國建立了強盛的支配勢力時，任何中國國

內的政治運動，如果不是以廣大人民的力量爲基礎，就總不免會幻想從帝國主義方面去找支持力量。士大夫的戊戌維新運動在這點上正是後來的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改良運動的先導。在中日戰爭後數年間，國際間形勢大致上是以俄德法爲一方面，而日英美爲一方面。滿淸統治集團既想以前一方面爲靠山，而維新運動者也就把幻想寄托到後一方面去了。

所以梁啓超在戊戌政變後因日本使館的幫助而逃到了日本後，著『戊戌政變記』一書，其中分析『支那與各國之關係』的一章中，認爲支持西太后（慈禧）和李鴻章的反動政權的只是俄國，又竭力申說英國日本是不欲『瓜分』中國的。他說：『夫英國日本之不欲支那瓜分也如此，而支那瓜分之勢也如彼。欲免支那之瓜分，惟望支那之改革。然支那必如何而後能改革，則日本英國之人不可不深察也。』這就是說，要求日本英國『扶植』中國的改革運動。於是他建議日本英國應趕緊和俄國決一戰，他認爲戰爭發動『在今日，則中國獲保全，戰而有益於世界者也。』㈧ 梁啓超所希望的這個戰爭，果然到了一九〇五年發生了。日

本在英國美國的默默支持下果然打敗了帝俄，然而對中國的政治革新有什麼好處呢？

原來中國的獨立解放固然絕不可能依靠帝國主義者的好意，就是極有限度的政治改良也不可能在帝國主義的贊助下實現。一八九九年，各國相互保障『門戶開放政策』，其實不僅打擊了李鴻章的以夷制夷政策，而且實際上也是對於這些維新運動者的當頭一擊，雖然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

這正是戊戌維新運動及其以後同類的政治運動的悲劇。他們的運動無論怎樣熱鬧，終歸煙消雲散，就因爲他們一方面堅決排斥下層人民大衆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寄托幻望在帝國主義身上。這兩方面是互爲表裏，也是互爲因果的。

㈠ 康有爲的第三次上書，『南海先生四上書記』（上海時務報館初版本）頁一五，頁二一。

㈡ 康有爲的第五次上書，據梁啓超著『戊戌政變記』卷一，以下同。（本節所引康有爲的文字除第五次上書外，『保國會演說詞』及『統籌全局疏』也據梁氏此書，分見卷三，卷

一，以下不再一一註出。）

⒀ 梁啓超：『南學會序言』，載『戊戌政變記』卷八。

⒁ 『瀏陽二傑文』，卷一，『譚嗣同文』，頁五一。

⒂ 同⒁，頁四三——四四。

⒃ 『戊戌政變記』卷六。

⒄ 『瀏陽二傑文』，卷二，『唐才常文』，頁六——九。

⒅ 『戊戌政變記』卷五。

三 義和團的受騙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失敗後的局勢，一方面促成了上層官紳士大夫中的救亡維新運動，另一方面又使下層廣大人民中對於外國侵略者的不滿情緒發展爲實際鬥爭。當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使前一運動遭受慘敗後，後一運動就跟着上昇到高潮——那就是在「義和拳」「義和團」名義下的農民運動。

這期間的農民運動和太平天國時期的農民運動有一點重要的不同：太平天國和捻黨等等都是單純的反抗地主剝削，反抗官府壓迫的運動，而到了這期間，卻是濃厚地帶着反「洋人」，反「洋教」的性質。義和團本來是北方農民中有悠久歷史而爲滿淸當局所嚴禁的白蓮教組織的一支派。中日戰爭中，北方人民直接受震動，到了一八九八年，德國派軍隊登陸膠州灣，並强築膠濟鐵路伸展其勢力，於是山東的義和團也就成爲當時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先鋒了。

農民的政治程度還極幼稚，義和團的行動只表現爲偏狹的仇外和排斥教會，那是不必諱言的。但不能因此證明他們是落後保守，蔑視一切新事物。人們應該想到，早在三十年前，太平天國恰恰就是利用了基督教的形式，他們所宣傳的教義和中國民間原有的各種宗教思想相比較也是新的，但廣大農民並未因其是新而拒絕。由此可見，如果以落後保守來解釋廣泛羣衆參加義和團運動是不公平的。這運動恰恰在帝國主義侵略最激烈時發展到最高潮，決不是偶然的；內地人民已從實際生活中感受到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而外國教士則是普通人民所直接接觸到的外國人，於是教會成爲羣衆憤怒的對象，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前一章我們已說到在一八六二年後各地的教案已會不斷發生；日積月累，終於就爆發爲一八九八年後的義和團的猛烈行動。

當時的外國人都竭力辯說，無論如何，外國人在中國內地傳教是有條約根據的。他們雖把「條約」看得和「聖經」同樣地神聖，但旣然是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把「聖經」傳播到中國，也就難怪普通中國人要把「聖經」看得和不平等條

約同樣地可憎惡了。何況教會在中國的行動，也確是處處憑藉着侵略國的優越勢力，更難免引起中國人民的敵視。如在一九〇〇年在中國的普特博士（Dr.F.L.H.Pott）——他自己也是個傳教士，就承認外國傳教士，特別是天主教的，在中國採取直接干涉政治的行動並以官員似的身分作威作福，他說：「我們相信，天主教在這方面的政策是這一次暴動（指義和團暴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如果中國政府不是無力維持秩序以壓制反基督教行動，那末天主教教會也不至於要求或擅取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權力。」（這種辯解是極其無力的！）普特博士的結論說：「傳教士之被攻擊，與其說因爲他們宣傳基督教義，無寧說因爲他們是外國人。」㊀這話如果再修改一下，就更確當了；當時中國人反對教會，並不因爲討厭外來宗教，而是因爲當時中國人心目中，教會正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最具體的代表者。

但同時我們仍必須指出，義和團並沒有能發展爲一健康的人民反帝運動，相

反地，他流於發育不全，畸形生長而至悲慘失敗的命運。

如果只看表面的現象，就會發生不可解釋的問題。義和團的活動似乎一開始就受到滿清地方官員的支持，繼之，甚至得到滿清朝廷的庇護，而義和團也揭出了『扶清滅洋』的大旗，活動到了京畿地區，甚至進入北京，在一九〇〇年四五月間，北京天津都幾乎成爲義和團的天下。於是官軍和義和團民聯合圍攻北京的各國使館，於是八國聯軍經由塘沽天津直撲北京，於是滿清政府甚至宣佈向各國決戰，對義和團活動完全表示獎勵的態度，於是聯軍攻入北京，滿清的太后和皇帝逃走，……如果全部事實就是如此，那麼人們就不能不問：既然義和團是自發的農民運動，難道他們竟已背叛了太平天國的傳統，一變而爲擁護封建專制統治了麼？既然滿清政府在一九〇〇年前已安於做侵略者列強的代理人，那麼牠在這時眞是忽然站到了人民一起而向帝國主義決戰了麼？

原來事實的眞象並不是如此。我們不妨再來引一段康有爲一八九七年上皇帝書中的話，他說：『自台事（卽中日戰爭）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

惑，奸宄生心，陳莽輟耕於隴上，石勒吟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伏莽遍於山澤，教民遍於腹省，……各連匪黨，發作待時。加以賄賂肆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蠹亂於下，亂機遍伏。即無强敵之倡，揭竿斬木，已可憂危。……」[illegible]他把當時在對外失敗屈服的滿清統治下的動亂不安情形，寫得淋漓盡致。他很顯然地是肯定了這種內部的農民叛亂對於滿清統治者是可怕的事。義和團是一個農民自發的運動，其本來面目決不是『扶清』的。拿事實來看，例如在一八九九年夏秋間活躍於山東北部平原、恩縣的義和團領袖有一人名朱紅燈，自稱爲明朝後裔，又有一和尚號爲『本明和尚』，他們的姓與號就表現出他們是反清的。他們一面和教會爲難，一面也和官軍作戰。官軍搜獲到他們的文件中還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之語。[illegible] ——這可表明義和團作爲農民運動的本色。當時有一個官員勞乃宣，也這樣地描寫義和團的活動：『聚來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立，儼同敵國，動言焚殺，官吏莫敢誰何？』[illegible]

但是因爲義和團提出了反洋人的宗旨，這就比單純的反封建鬥爭較爲複雜。

農民以外的人也有帶着各種不同的動機而表示同情和支持這運動的。有些士紳帶着極端保守落後的心理，害怕跟着洋人勢力而來的新思想，新事物；有些地主因爲他們的佃戶成爲基督教徒後不能再由自己任意支配，所以特別憎恨教會；有的地方官員既因教會侵奪他們的權力而忿忿在心，又因無力鎮壓人民騷動，只好採取『綏靖』政策把人民的抗爭引導到集中於教會一方面，使自己不受直接損害，如果洋大人提出責備，可以完全歸咎於『暴民』。在這情形下，義和團便由單純的農民運動而漸漸地成份複雜起來，許多在豪紳地主影響下的流氓地痞勢力也參加了進去，而且得到官府支持。這些參加者和支持者所努力的是煽動羣衆的排外心理的一面，來湮沒其反封建、反統治者的性質。農民羣衆在政治上的幼稚使他們不可能抗拒這種誘惑和影響，於是這運動就愈來愈走入歧途，陷在狂熱無理性的排外和仇視新事物的行動中，成爲被統治勢力所利用和玩弄的犧牲品了。

一八九九年，山東巡撫毓賢就是採取這種態度來贊助義和團的。這時美國和其他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北京政府立刻把毓賢調到山西，而令繼任的

袁世凱與外國在山東的軍隊合作，全力鎮壓義和團民。袁實在山東玩弄了一下義和團，他自己並不吃虧，吃虧的還是人民，所以他到山西後，仍以同樣態度對待山西人民反洋運動。不過由毓賢調離山東這件事就可看出，這時北京政府還是對於帝國主義主人的命令百依百順的。實質上，在一九〇〇年的全部事變中，他也從未真正和他的主人們決裂。

為了瞭解這些，第一，我們不妨回想到雅片戰爭後廣州的『官』、『民』、『夷』三方面的關係（見第一章第二節）。我們已指出，當時『官』的態度是看民夷兩方面那一方面足以直接形成對自己的威脅，便向那一方面『綏靖』一番。第二，我們又該知道這時的滿清統治政權已十分衰頹，連自己也失去信心了，所以康有為曾如此描寫說：『舉朝上下，相顧嗟吁。…羣居嘆息，束手待斃。……生機已盡，暮色悽慘。氣象如此，可駭可憫！』[39]——像這樣一個衰敗的統治集團，在已經對外處處屈服，感到不致於發生從外而來的危機時，忽然在自己內部看到了類似太平天國的危機，而且是發生在他統治的中心地區——晉冀魯各省，

他的驚慌失措是何等利害！他不能不這樣想：如果全力鎮壓而鎮壓不了，那就是他的死期到了；如果採取籠絡和欺騙政策，就至少還能苟延於一時，而且義和團本身的弱點又不是絕不可以被利用。因此滿清政府對於義和團先是怯懦的害怕，又轉而爲欺騙的利用。既然是欺騙的利用，也就不得不表示對外強硬。但這不過是表示一下而已，所以一轉身來，看到帝國主義軍隊已經進入北京，殺戮人民，也就立刻向『主人』表示懺悔，而惡狠狠地向『暴民』宣佈討伐了。

在滿清中央政府身上的這種變化的發展，只在三四個月的短短過程中全部表現了出來。我們可以從那時的所謂『上諭』中清楚地看出變化的軌跡。

一九〇〇年六月義和團已發展到北京附近時，『上諭』還是呼爲『亂民』，爲『匪』，聲稱要加以剿除：

五月廿九日：『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團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毀電桿鐵路，似此愍不

畏法　其於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拏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以昭儆戒。現在人心搖動，遇事生風，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當實力保護，俾獲安全而弭亂變。』

五月卅日：『……拳匪滋事……現在直隸及附近京畿一帶，到處人心浮動。若不迅速剿辦，何以靖邪慝而絕根株。……』

六月八日：『……近來京城地面，往往有無賴之徒，三五成群，持刀執械，游行街市，聚散無常。若不亟行嚴禁，實屬不成事體。……』

六月十五日：『拳匪滋擾禁城，……各處焚掠如舊，……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夕數驚，民居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至此，再不嚴行懲辦，為禍不堪設想。……』

這幾段話，把義和團這期間在京津一帶的活動說得很清楚。滿清當局的張皇失措，恐懼萬分，更是活畫在紙上。如果不是因為義和團畢竟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天然帶着反抗統治者的色彩，他是用不着如此害怕的。這時他對於義和團一面既已下令剿除，一面又曾派大員向羣衆安撫。但這兩方面都無效。

六月二十日：『近日京畿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剿撫兩難。洋人麕聚津沽，中外釁端已成，將來如何收拾，殊難逆料。』

這段話把滿清當局這時的窘狀也自行刻劃得很明白。後一日卽有向各國宣戰的「上諭」：

六月二十一日：「……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衛社稷。……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

如果只看這文件的字眼，似乎滿清當局確是號召人民決心禦侮了。但是只隔四天，在答覆李鴻章等督撫的「上諭」中已經說明了這一舉動原來是出於不得已的苦衷：

六月廿五日：「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從不曾輕於開釁。奏中所稱中外強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大局安危，正難逆料。……」

六月廿六日：「……茲據奏到，言兵釁萬不可開，亂軍急宜剿除等情，誠老成謀國之見。無如此種團軍，京津一帶已不下十餘萬人，聲勢蕃衍，誓與洋教爲難，甚至宮禁前後所在多有。剿之轉恐患生不測，不若因而用之，倘可轉危爲安。此乃天時人事相逼而成。……」

這兩節話老實說出了「朝廷」的「方寸已亂」的苦況。這裏也說得再清楚不

過，其所以對外宣戰，只是因爲害怕義和團民的聲勢，想藉對外戰爭之名來躲過人民的鋒芒，雖明知這種辦法足以激起外國主子的憤怒，但也實逼處此，只好如此幹了。所以滿清這時一面嘉獎在天津一帶協同官軍抗戰的義和團，譽爲義民，賞以巨款，提拔了一些豪紳士劣爲團民領袖，並派朝廷大員統率，一面則又命令在外國的使臣向各國解釋『苦衷』。

六月廿九日：『……此時直東（河北山東）兩省之亂黨已聯成一片，不可開交矣。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而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爲各國所深諒。……現仍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

從來沒有過比這更醜的文件！滿清政府一面向人民說：你們不要反對我，我現在率領你們去打外國人了；一面却奴顏婢膝地向洋大人說：請你們千萬不要誤會，我不過是騙騙我的人民罷了，我一定把這些使你們討厭的『亂民』『自行懲辦』。

在這情形下，滿清當局怎麼會眞正抗戰下去呢？事實上，清廷沒有調動很多

軍隊抗戰，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犧牲的多半是團民。所以到了八月初：八國聯軍由天津直逼北京時，清廷馬上表示乞和，但帝國主義這時沒有理他，一直打進了北京。倉皇逃出了京城的朝廷只好怨恨地說：

八月十九日：『此次釁起，兵教互鬥。朝廷辦理爲難情形，已歷次備國書詳告各國。彼方以代除亂民爲辭，於國家並無他意。而似此舉動，殊屬不符邦交，未符原議。』

這是向列強各國說，你們來『代除亂民』，固然是歡迎的，但逼得朝廷在北京站不住脚，實在是太不給我面子了。到了九月初，在李鴻章由上海趕赴北京去議和時，『上諭』中已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亂民』而又下令『剿除』了。

九月七日：『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爲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直隸地方義和團蔓延尤甚。……倘仍有結黨橫行，目無官長，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責成帶兵官實力剿辦以清亂源。』

帝國主義軍隊佔領北京雖使清廷怨恨，但也幫助他解決問題。當他一看到八國聯軍已經在京津一帶以剿滅『團匪』名義對一般平民大肆刼掠屠殺時，他雖是成了『流亡政府』，也覺得有恃無恐，可以追隨着主人而向人民恐嚇了。於是滿清宮

兵與帝國主義武力又一次地協同合作起來了。

很多歷史書上說：當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執政的頑固派本也很恨洋人，所以同情義和團。但這樣來解釋這歷史事變是不够的。固然，忠順的奴才對於主子也常不是絕無怨恨之心的，而當時帝國主義者對於無能的滿清政府已極表示不滿，且有表同情於康梁維新黨的，也是事實。在慈禧太后實行了戊戌政變，幽囚光緒皇帝後，曾指定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大阿哥』（預備皇帝），列强又都不加以承認，這確也使慈禧太后和端王等守舊頑固派更不滿意『洋鬼子』。然而他們絕沒有因此懷恨在心，決心求助於人民而反抗帝國主義，那是在上面列舉的『上諭』中已可看出的。

在這整個事變中滿清統治集團的態度只有着這樣的兩個趨向：慈禧太后、端王以及在北方的多數守舊官僚，他們因直接感受義和團勢力的威脅，所以冒險走了這一條路。而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東南各省的督撫，他們既與

義和團事變區域隔離較遠，又和帝國主義關係較密，並且還有過剿太平天國，剿捻黨的經驗，始終堅持應以『剿除亂民』爲第一義，無論如何反對把和列强間的關係當兒戲。在北方八國聯軍猛烈進攻時，他們却在東南各省和各國維持着外交與商務上的『友好』關係。山東的袁世凱擁有較强的武力，却也按兵不動，提出『保境安民』的口號和東南各省督撫採一致態度。

這兩種趨向雖是互相不同，却又是在滿清整個政策中並行不悖的。東南各省督撫的做法都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他們的意見在前引上諭中且被稱爲『老成謀國之見』㊁。

所以我們的結論只能是：反對外國侵略者的義和團運動在實質上是和封建專制統治者相對立的，後者並沒有眞正支持人民的愛國運動，只是加以狡詐而惡毒的欺騙。

㊀ Mac 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587

㊁ 梁啓超，『戊戌 變記』，卷一

[illegible] 蔣楷，『平原拳匪紀事』（一八九九木刻本）頁十四。

[illegible] 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書後』。此文在一九〇〇年前已曾刊印，後來曾經徐州兵備道桂嵩慶爲之刪潤翻印。這裡所引的幾句話，經『刪潤』後成爲『聚衆千百，槍械林立，動言焚殺，官吏莫敢誰何？』

[illegible] 以下在本節中所引一九〇〇年的『上諭』均根據粵東僑析生所編『拳匪紀略』（光緒廿九年上洋書局石印本）前編卷上。這書按時間先後列舉這時期的『上諭』甚完備，且包含一些事後爲清廷所不願承認的文件。間有誤植的字，此地已據他書校正。所列月日，這裏已均改爲陽曆計算。

四 「結與國之歡心」

我們應該再來繼續討論各帝國主義列強在義和團事件發展中的態度與政策。當義和團運動發展到北京城以前，列强政府並沒有對它十分重視。他們到這時對於滿淸政府的不長進，固然不滿意，但事實已使他們斷定滿淸政府作爲馴服的奴才，是可以信託的。中日之戰後的幾年間，滿淸政府旣對於外國人的要求有求必應，其財政、軍事、政治又都是他們所得而控制的，所以這時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注意力都集中於他們自已相互間爲劃分勢力範圍而引起的猜忌和傾軋，對於滿淸政府的態度並不覺得有什麼可以担心的必要。至於義和團，在他們看起來，不過是一部分『暴民』的蠢動。旣已在一八九九年由美國公使的壓力使滿淸政府撤換了在山東的官員，並下令剿除拳民，帝國主義者們都以爲這事很快就會過去了。

撲特南・威爾（Putnam Weale）當時在北京的一個英國記者，他著有『北京漫記』（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一書，追記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的逐日情況。他記載一九〇〇年五月十二日的情形是：

當此之時，有一新發生之事，如一縷微雲，起於天末，雖其後將籠罩大地，使人間成險黯之世，而此時則甚微細，皆不之覺也。是事在山東省，距威海不及千里，起有距亂。由十二英人率黃種之兵六百剿平之。……此時山東省新發生之義和拳匪，使館中並不注意，但偶一談及。且其時山東巡撫爲袁世凱，乃一有魄力之人，稍知兵學，其部下有精兵一萬，故吾人恃以無恐。

到了五月廿八日，他的記載是：

前此一縷之微雲，今已漸大發展，而障蔽大地之光線矣。距今二三禮拜以前，所謂義和團者，固已漸漸蔓延，動人注意，然當不過視爲一隅之變，微末之事。而今則如何，北京至保定之鐵路已被拆散，豐台車站亦已被焚。其距北京僅六英里耳。大鐵橋亦炸毀，洋工程師皆逃入北京，尤可驚者，拳民之旗幟已飄揚于空中，鮮紅之布，大書扶清滅洋四字，彷彿吾歐人之血所染也。㈠

但到了這個時候，北京的列強各國的使館中仍認爲『北京必可安全無患』，而據說，在這時英國外務部還有電報給北京使館說：『拳民事業已厭聞，不庸再

述矣。」

由這親切的敍述，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在事先確未預料到以後的發展。這是爲什麼？因爲帝國主義者不能知道，他們對中國的蠶食壓迫的行動已經在中國人民中深深培植下了仇恨的種子。在他們不知道義和團運動雖是幼稚的組織，但却蘊藏着深厚的人民力量。他們輕視中國人民的力量，不知道這種力量一旦爆發起來，就有驚天動地的聲勢。他們更沒有料及，馴服的滿清政府，因爲牠的腐敗和昏庸，將禁不起這人民力量的激盪，一心爲求避免人民的鋒芒，竟至方寸全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幹些什麼。

因此，一九〇〇年間的局勢的飛速變化，使得列強各國政府一時驚惶失措，不知道眞象究竟如何。六月初義和團勢力竟進入北京，而且實際上成爲支配北京的勢力。北京的各國使館遭受攻擊，且被圍困，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而滿清政府的態度連各國公使都摸不清楚了。滿清政府本來已是各帝國主義者的俘虜，而這時似乎變成了義和團的俘虜。列強各國這才看出了

局面的嚴重。各國間的利害衝突更使問題複雜化，很不容易立刻得到共同接受的方針，因此他們的行動一時顯得很迂緩。

六月十日已有二千多各國合組的軍隊在英國海軍大將西摩（E. Seymour）指揮下由天津租界出發向北京進攻。但因沿途鐵路被毀，處處遇到人民反抗，而又兵力單薄，不敢深入，所以到了廊房後即行退回。六月十七日各國在大沽口外的艦隊聯合攻下了大沽，並匯合西摩退兵進攻天津。這時因爲人民反帝情緒高漲，奮起抗戰，連一部份北洋軍隊竟也表現了極度勇猛的精神以抵抗侵略，使得帝國主義軍隊遇到了在過去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從未遇見的苦戰。直到七月十四日各國聯軍才佔領了天津。津沽間的這一惡戰使得各國覺得如無充分準備，不能冒失進攻北京。同時他們又必須在繼續進行戰爭前先弄清楚局勢，調整相互間的矛盾，以確定政策。所以遲到八月四日才由天津再出兵向北京進發。這時軍隊共約四萬人，參加人數最多的是日本，以下依次爲俄、英、美、法；此外奧、意兩國只有代表參加，德國的二萬軍隊還在途中未到中國，以後在九月間趕到。到了八月十

四日聯軍攻進北京。九月開始和滿淸所派議和大臣談判，至次年（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才由這八國另加上比利時、西班牙、荷蘭三國共同和滿淸政府簽訂了所謂『辛丑和約』。

當八國聯軍出兵佔領北京期間，在有些國家中，有人主張直接實行『瓜分』中國的政策。但是這並沒有實現。其原因不僅因爲如果實行瓜分，就不免引起各國間的爭執和衝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爲在聯軍由天津出發前，各國已能看淸當時局面，知道基本問題是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緒高漲。旣然這時滿淸政府表面上附和民意而不惜對外宣戰，實際上仍通過外交關係向各國討好；因此就很淸楚，滿淸政府還是帝國主義掌握中的工具，如果捨棄牠而直接瓜分中國，就只會使各地區的中國人民反帝情緒和行動更加擴張和加强，那是對帝國主義者不利的。

所以當時他們宣佈出兵的理由，如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底俄國與英國交換文件中的聲明是『救護駐軍使館，並助中國剿匪。』㊂日本政府於七月初已致書滿淸

皇帝說：『自上月以來，各國將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能不調派兵員至該地，此係專爲彈壓匪類救護使臣起見。』㉓在帝國主義者口中所稱的『匪』，就是充滿了反帝愛國情緒的中國人民，那是不用說的。所謂『救護使臣』也不過是種飾詞，因爲帝國主義者顯然是企圖由這次戰爭來更擴大和加强他們在中國的權益。但帝國主義者用來作爲這次出兵的藉口也反映了一種眞實的情勢。我們不妨把兩次鴉片戰爭中的情形和這對比一下。在前兩次戰爭中，侵略者在作戰時都宜佈他們是要懲戒頑固的滿清，不與人民相干，想以這說法來騙取中國的民心。現在他們却是老實說明，他們出兵就是爲了對付中國人民，並不是打滿清政府，來使這專制統治者安心。這樣的不同，足以說明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後六十年間，已經把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專制統治者相結合、而與中國人民相敵對的政治關係表現得淋漓盡致了。所以在滿清朝廷逃出京城時說：『彼方以代除亂民爲詞，於國家並無他意』，㉔這所謂『國家』自然就是指滿清政府而言。

列强各國又把戰爭範圍限於北方的一定區域內。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

劉坤一、李秉衡等督撫既然不管津一帶的變亂，始終堅持在他們所轄地區內以『防範土匪，聯絡邦交』爲宗旨，所以帝國主義者對他們自然仍是十分寵愛。英國外務部副官勃樂登立克於一九〇〇年八月八日在下議院宣佈當時英國所應注意之事，有一項就是『使長江一帶無鋒火之警，萬一有事，該各省督撫兵力不足，吾英亦宜有以接濟之。』[5]同年十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表示反對德國駐北京軍隊單獨出犯保定之舉時，憤憤地說：『獲得各省督撫的幫助，本是我們的第一要着，也是我們的成功，他們在過去四個月中光輝地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是既然德國與俄國老是以行動刺激中國人民，則各省督撫還能把他們的騷動的人民控制多久，那就很難說了。……』[6]

由此可見，李鴻章等人的立場確是帝國主義者所重視，並且準備在必要時以武力加以支持的。而滿清政府下的最有力的地方大吏採取這種立場，更使列強各國相信可以使中國情況回復事變前的態勢，比了直接瓜分中國較爲有利。

各國在作戰和議和的過程中，固然猜忌和傾軋仍表現得很強烈，但在基本上

他們都採取了共同的政策，從事着共同的行動。在八國聯軍出兵前一年，由英國示意，美國提出，而各國一致同意的『門戶開放政策』，在這時就可說是成了各國間共同的基本綱領。

一九〇〇年七月初，美國又向各國第二次提出關於門戶開放政策的通牒。十月，英國與德國間也爲了『保持在中國之權益及現行條約上之權利』而成立對華政策的協定，其第一條就說：『爲了各國永久共同的利益，中國的河川及沿海諸港，對於無論何國臣民的貿易及其他各種經濟活動皆須無差別的自由開放。』㊆在美國通牒與英德協約中都說要『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和『維持中國領土不變更政策』，這話看起來似乎很漂亮，但實際的意義則已由英德協約說出他們已自行相互約定，把全中國無分彼此地一律向一切國家開放了。英德協約成立後當卽通知其他各國，要求承認所舉的原則，也都得到同意的答覆。各國態度既然一致，所以『辛丑和約』才能產生。

『辛丑和約』可說是旣維持滿淸統治者的權位，又鞏固了帝國主義列强在華的支配勢力的一個條約。列强在這和約中使滿淸政府承認它附和義和團的錯誤，（道歉、懲兇，即懲辦那擅敢主張利用人民力量而得罪外國的大臣們。）使滿淸政府從民脂民膏中拿出四萬萬五千萬兩的巨款給列强作『賠償』，使滿淸政府保證從此以後要嚴格懲辦人民中一切帶有仇外性質的行動和會社組織，還要讓列强各國自行派軍隊來『保護』在北京的使館，並駐紮在平津一帶若干指定的地點。這個條約使滿淸感激涕零，願從此更加忠順不貳地做列强的孝子賢孫；而列强由此就使自己更直接地成爲滿淸政府的監護人。北京各國公使團成爲中國實際上的太上政府，凌駕於在『禁城』中的滿淸『朝廷』之上。

如果我們還不淸楚所謂『門戶開放政策』的實際意義，那『辛丑和約』就是明白的表徵。提出這個和約的美帝國主義者對於這個和約是十分滿意的，如『美國對遠東的外交政策』作者福斯特（Foster）帶着誇耀的神情說：『美國竭力贊同懲辦眞正的罪犯領袖，並堅持要求實際保障美國人民的利益。同時，美國表示

極度的關心，不願意有什麼行動，足以妨害中國維持其穩固的政府及其領土的完整。』[4]——這就是說，美國政策，也就是表現在『辛丑和約』上的列強政策，乃是使今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權利得到最大的保障，同時讓中國在形式上保持爲一『完整』的『獨立』國家，使滿淸仍能『穩固』地統治着。

因此滿淸政府，已先受到了義和團由人民方面來的威脅，又受到了八國聯軍這一沉重的打擊，正在狼狽萬狀之時，看了這個和約自然是十分滿意的。我們說他感激涕零，並非過甚。在一九〇一年二月，列強提出和議大綱時，流亡在西安的滿淸政府已有一道『上諭』通告『天下臣民』，其中說：當初事變發生的原因是『拳匪構亂，開釁友邦』；現在政府的態度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而看了各國提出的和議大綱後的觀感是：『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5]好一個不要臉的政府，竟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帝國主義主人那裏還捨得拋棄他呢？

帝國主義是以共同壓服中國人民的立場來拉攏東南各省督撫，也用這立場來

教訓那腐朽的滿淸中央政府。還沒有足夠經驗的中國人民在義和團運動中表現了一次幼稚的行動，他們受了一次騙，跟着他們就看到所有他們的國內國外的敵人都露出了眞面目携起手來，共同進行武力的鎮壓。義和團運動是悲慘地失敗了，但中國人民由此上了一堂極有益的課程。

(一) 陳冷汰、陳詒先譯：『庚子使館被圍記』頁一ーー二，頁五ーー七。

(二) 『拳匪紀事』後編卷上頁九。

(三) 同(二)，頁一。

(四) 武波編著『中國近代史』第一分冊頁四一五以下引錄當時列强各國評論對華政策可參看。如英外部副大臣說：『中國此後仍以華人治華地』；法議員演說：『中國地方廣濶，民氣堅勁，殊非印度南洋各處可比』。老『中國通』赫德當時發表『中國實測論』，指出：『中國人數千年在沉睡中，今也大夢初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强中國拒外人爲目的者也。』因而他認爲目前不適宜於『瓜分中國』，仍應『扶植滿淸』以消弭『黃禍』（意即消弭中國人民的反抗）。

(五) 同(一)，頁十。

(六) MacNail, Modern Chiness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 616

㊆ M.J. Bau, The Open Door Doctrine, p.188

㊇ 同㊅，p. 617

㊈ 『拳匪紀略』前編卷上頁二三。

五 『保全主義』保全什麼？

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流亡在西安的滿清政府發表了一個『上諭』，宣佈要刷新政事，說是『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㊀

一九〇二年一月，流亡的滿清政府回到北京。皇太后和皇帝由西安過鄭州而北上。途中，有幾段路坐了火車，到了北京後，皇帝和皇太后分別接見各國公使和公使夫人，向他們好言慰問。這些事都在外國人中引起了讚美。原來滿清朝廷雖是回到自己的京城，其實是作爲『兒皇帝』的身份回來的。所以縱只是坐火車這樣的小事，在外國人看來，已是他誠意『革新』的表示了。

但對於人民有利的『革新』是一點也沒有的。除掉產生了內外大臣的一些空談革新的奏章文字外，實際上的『新政』只是中央官制的某些變動，科舉制的廢

除，滿漢通婚禁令的取消等等。空洞的文字和枝節的改變不能減低人民的不滿和革命風潮。於是滿清更進一步說是要實行「憲政」了。一九〇五年派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一九〇六年宣佈準備實行憲政，一九〇八年頒『憲法大綱』定九年爲預備立憲期，一九一〇年改訂三年後實行憲政。——但次年辛亥革命已爆發了。

從一九〇的一年宣佈革新的「上諭」到『預備立憲』，其作用固然是蒙蔽人民，同時也是爲了討好帝國主義列強。因爲除非他能安定對人民的統治，帝國主義便不會寵愛他。他要使帝國主義相信他不僅是忠僕，而且是很有能力的忠僕。「不要因爲我腐敗落後而捨棄我吧，我還可以把政治改革一番來使我在國內統治地位穩固，而完成您所給我做的任務。」滿清政府正是用這樣的口氣來在一九〇〇年的事變後求得帝國主義列強的諒解。所以他一面堂而皇之談『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一面卑躬屈膝地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面說要行憲政，一面則更卑屈地服侍帝國主義。這兩方面正是互爲表裏的。

滿清的假立憲，固然沒有眞能起蒙蔽人民的作用，但帝國主義者却認爲是

滿意的。所以甚至在滿清已經滅亡之後，做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的美國人古德諾（Goodnow）還表示惋惜，認爲如果滿清的君主立憲能不因革命的阻撓而實現，那實在是再好也沒有。他說：「向使滿清非異族之君主，爲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則當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漸至於立憲政治。凡其時考察憲政之大臣所計劃者皆可次第舉行，蒸蒸上理。不幸異族政制，百姓痛心，於是君位之保存爲絕對不可能之事。」㊂還有一個在滿清政府中當過顧問的英國人肯特（P.H. Kent）則把滿清「立憲」的失敗歸因於慈禧太后之死。（她死在一九〇八年的「憲法大綱」頒佈以後不久。）肯特在他的著作「滿清的逝去」中竭力說明慈禧太后是有「誠意」立憲的，「她是十分願意能在歷史上成爲一個開闢新時代的社會契約的創始者，來使人民可以幸福而繁榮，使國家能強大而和平安全。」於是，肯特又說：「如果『老佛爺』還活着，那麼在她所已經安置好了的基礎上，是很可能建立起新中國的機構來的。」㊂

原來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總是抱着一種永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希望中國政府一

方面是這樣一個專制政府，可以不顧民意而賣盡國權，一方面却又能內得民心，能使人民安分守己地生活着，不致於引起叛亂和革命而損及帝國主義者的權益。所以他們贊成滿清的君主立憲的計劃，而且他們所設想的『新中國』也就只能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如果滿清能在君主立憲制下億萬斯年地生存下去，帝國主義也就能億萬斯年地做中國的主人了。他們用帝國主義者的腦筋不能懂得爲什麼這樣好的計劃竟不能實現，只好歸因於皇室的種族問題乃至慈禧太后個人的關係上。他們不知道縱令皇帝不是滿洲人，而是漢族人，但既然這是專制的，而且是賣國的政府，那麼立憲云云，無論嚷得那麼熱鬧，也騙不了人民。他們也沒有看到，這個『老佛爺』慈禧太后在當時中國人民心目中其實是已成爲一個最邪惡，最卑劣無恥的典型了。

帝國主義者在滿清政府死亡後還如此悼念它，不是沒有理由的。既然在一九○○年前康有爲已經說，『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客予求，雖無

亡國之形而有亡國之實』，那麼到了一九〇〇年後，滿清統治下的最後十年間，這種情形是更進一步了。只就海關權擴張和鐵路借款這兩件事便可表明這情勢。

海關之爲外國人控制，本來從一八六〇後即開始。辛丑條約中的四萬五千萬兩的巨額賠款（預定三十九年償清，連同利息合計達九萬八千餘萬兩），規定以海關收入和各通商口岸的常關收入作担保，並且規定總稅務司直接管理付款的事宜。從此以後，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海關的控制擴大到了徵收土貨的常關；同時總稅務司的職權擴大成爲一手收稅，一手直接支出賠付各國的賠款，只把付賠款外剩餘下的錢交給中國政府（所謂『關餘』）。在義和團事件起時，已有力主不可得罪帝國主義的御史向朝廷說：『我中華財賦全賴海關入款，若一失和，則餉源立絀』。現在滿清政府更是在財政上仰給於帝國主義者所吃剩下的殘羹了。

鐵路的建築權本已在八國聯軍以前被各帝國主義國家按照各自劃分的『勢力範圍』而取去，現在就積極具體實施了。一九〇〇年前的鐵路如俄築中東鐵路，法築滇越鐵路，德築膠濟鐵路，均由各國直接投資經營，只有京奉路是由英國貸

欵興築。一九〇〇年後各國都採取貸款給滿清政府而由外國人監督管理的辦法。於是京漢、津浦、正太、道清、汴洛、滬寧、滬杭甬、廣九各路紛紛開始興築。爲了爭取貸款築路權，又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明爭暗鬥，爭得最激烈的是川漢粵鐵路線，最後在一九一〇年由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向滿清政府聯合貸以六百萬鎊，包攬築這一條路。

在此，還須指出帝國主義對中國直接投資的事實。一八九四年的中日馬關條約中首次規定了『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業製造』，一八九八年德國又首先攫取了沿膠濟鐵路的採礦權。從此後，列強各國就直接投資到中國從事工礦業的經營。在中日戰爭前，外國在中國的銀行只有英國的麥加利銀行與滙豐銀行，中日戰後，日本的正金銀行，英國的有利銀行，法國的東方滙理銀行，俄國的道勝銀行又相繼設立於上海。到了一九〇〇年後，原有各銀行紛紛增設分支行，擴大其經營範圍，在新設的銀行中又有美國的所謂花旗銀行。所以在滿淸的最後十年間，不但中國的工礦交通已完全在帝國主義直接控制下，扼死了

民族資本發展的可能，而且帝國主義的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財政，牢牢地掌握着中國的命運。

在如上所述的這種情形下，滿清政府這十年的存在完全是依靠帝國主義者的「恩惠」，他們分給他一部份關稅的收入，並且給他一筆筆的借款，使他可以分潤一部份作軍政費用。如果沒有外債，滿清簡直不知如何才能苟延殘喘，因此他也很樂意地把屬於國家主權的各種東西，鐵路、礦山、郵政、航線等一一交付出去，以取媚主子。北京東交民巷的各國公使便成了中國的太上政府，而雄踞上海外灘的各國銀行更已成了在中國的全權支配者

在這期間，帝國主義各國間爭奪中國權益的明爭暗鬥是更加激烈了。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就是因爭奪滿洲權益而爆發的。日本自經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戰後，現在又打敗俄國，他在遠東國際關係中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時英國在遠東採取的是拉攏日本的政策，一九〇二年已成立英日同盟條約，又於一九〇

五年根據日俄戰後情形重訂一次。但美國却開始感到對日本的利害衝突了。原來美國創議『門戶開放政策』，並在一九〇〇年的事變的解決中爭取領導地位，目的就爲擴大在中國的勢力。他默許日本打敗俄國，並使自己成爲日俄和議時的仲裁人，也爲了想讓自己可以伸展進俄國失敗後所留下的空隙中去。所以在日俄戰爭結束時，俄國把南滿鐵路讓給日本，美國立刻向日本接洽購買這段鐵路，這時美國還想從俄國購買中東鐵路，並加以擴張，以建設一條聯絡日本、滿洲、西伯利亞與歐俄的大鐵路。狡滑的日本先是答應出讓南滿鐵路，但一轉身間，不但反悔，而且反而聯絡俄國，共同排斥美國。美國資本家的雄圖大略受了挫折，十分傷心，而且眼見日本在滿洲勢力大大擴張，尤其嫉恨。從此後，日美間的矛盾便成爲環繞着中國的國際關係的中心環節。

日本爲了鞏固他的地位，所以除了與英國維持盟好外，在戰後，又漸漸謀與俄國修好，並與俄國的盟國——法國拉攏關係，於是在一九〇七年六月成立日法協定，七月成立日俄協定：這兩次協定都附有祕密條款，相互約定承認在中國某

些地區內的特殊權利。在這時候，日美間關係已十分緊張，簡直有爲中國問題而開火的可能。但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日美間也成立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協定，使緊張的關係稍趨和緩。

在日美協定成立後，美國並不放棄插足滿洲的努力。美國駐奉天總領事斯屈拉特（Wilard Straight）經過積極活動而於一九〇九年十月和滿清的東三省的總督成立一協定，由美國和英國的資本承辦修築錦州璦琿間的鐵路。接着，這一年（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美國國務卿諾克斯（Knox）又分向列強各國提出了一個『滿洲鐵路中立計劃』，大意是要滿洲的所有鐵路都讓各國共同投資並管理。美國是希望通過這計劃而使美國資本在滿洲居優勢地位。但這是已經分據南北滿洲的日俄二國所絕不願意的。因他們反對，美國這計劃又不成功，甚至連錦璦鐵路的投資修築也未能實現。於是美國又進行他的另一套做法。一九一〇年美國聯絡了英法德三國合組銀行團共同準備投資建築川粵漢鐵路，並與滿清政府訂立了一筆所謂『中國的幣制改革和振興實業借款』，預定總額爲五千萬美元。所謂振興

實業部指在滿洲的產業發展。美國事實上成爲這個銀行團的領袖。滿清政府給了這銀行團以極廣泛的活動權利，甚至在借款合同中規定：『倘中國政府招請外國資本家，參與振興滿洲實業時，應首先招請本銀行團。』美國帝國主義得到這個成績，終於可以躊躇滿志了。——然而可惜太晚了，因爲這個借款合同剛纔簽訂預備大展雄圖時，辛亥革命已經爆發了。

於此，我們就可看出，自一九〇〇年後列強爲中國問題雖然利害衝突到甚至在日俄間發生戰爭，日美間劍拔弩張，但是他們終久還是建立了協調的關係，這種協調的基礎，無疑的就是共同來吞食中國。如上節所述，一九〇〇年的事變的解決是以美國所再度提出，並由英德協約所具體規定的中國『門戶開放』、『利益均沾』、『機會均等』的原則爲根據。自此以後，列強間關於中國的協約與條約無不標榜着這一原則。如一九〇五年英日同盟條約中如此說：

保證清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並保證列國在華的商工業機會均等的原則，以維持列強在中國的共同利益。

同樣的，在一九〇七年的日法協約和日俄協約，也以這些字眼爲標榜。最後在一九〇八年的日美協約中說得更爲露骨：

兩國政府決意依其權限內之一切和平手段，維持中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和該國內的列强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以保持列强在中國的共同利益。

前述的維持現狀和機會均等主義，有侵害事件發生時，兩國政府爲協商有益的處置，應相互交換意見。

所謂「門戶開放」政策的實際意義是什麼，到這時是分外清楚了。日本爲什麼口口聲聲說要保障中國的獨立與完整，自然是因爲他已取得了侵略中國的優越地位，所以他希望以這爲掩飾而逐漸達到獨吞中國的目的。美國爲什麼要堅持機會均等的原則？自然是因爲他有着優厚的經濟實力，所以他希望在各國對華的共同投資中漸漸地獨佔鰲頭取得霸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這期間任何一個對華行動無不以門戶開放爲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一九〇九年提出「滿洲鐵路中立案」時，美國致英國覺書中說明其辦法是「列强共同出資」以建築和管理滿洲各

鐵路，而『鐵路的所有權則歸諸中國』。照美國方面說起來，這就叫做『保持中國在滿洲所享有的行政主權不受紛擾，及實際運用門戶開放與商業機會政策』。[22]由此可知，美國的所謂『門戶開放』，就是形式上，中國有主權，事實上，各國共同投資管理，而在共同管理中，美國取得領導地位。

在當時，中國國內一般人都認爲列強的對華政策是從瓜分主義發展到『保全主義』，稱之爲保全主義未始不可以，但問題是『保全』了誰呢？列強自然不是『保全』中國眞正的獨立和主權。他們所『保全』的只是中國形式上的獨立，並且『保全』着一個腐敗透頂的慣於賣國的滿清政府坐在中國的主權者的地位。所以連君主立憲派的刊物『新民叢報』在一九〇七年因日法協定成立而發表的評論，也說：『各國所標榜之主義曰領土保全，曰機會均等，其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維持東亞之現狀而已。各國在東亞之地位勢力，其既確定者，曰謀保存，其未確定者使之鞏固。……利用中國之黑暗以遂其蠶食鯨吞之野心……』[23]這段觀

察大體上是正確的。但君主立憲派幷不知道，列強所利用的『黑暗』，就是滿清的封建專制統治；他們還是像在戊戌百日維新時一樣，以爲提出了這種危機就可以促使滿淸政府振作求進步。其實，滿淸統治者這時因爲看到各國既已都採取了『保全主義』，那麼自己的地位已經十分鞏固，用不着怕什麼外患，一點也不覺得有着急的理由。

很淸楚的，帝國主義列強之要讓滿淸存在，幷加以支持，就因爲他是一個共同的好奴才。對於媚外主義的滿淸，帝國主義主人怎會不報答以保全主義呢？中國在這樣的政府下維持着形式上的獨立，既可以有助於列強在某種程度內調節他們相互間的矛盾衝突，而且爲了使中國人民相信中國到底還沒有亡國，在列強看來，也非有這樣的一個政府不可。如果這個政府再能披上一件『立憲』的外衣，因此而使中國人民對牠抱着希望，加以擁戴，忘記了帝國主義列強已成爲中國的主人的事實，那豈不是最好沒有的事麼？

㊀『拳匪紀略』前編卷上頁一九——二十。

㊁ 古德諾『共和 君主論』（引自白蕉：『中華民國與袁世凱』頁一七一）

㊂ Kent, 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 p.39, p.41

㊃ 李畔麟：『門戶開放與中國』頁一六八。

㊄ 『新民叢報』第四年第二十二號頁十四。

六 愛國和革命

一九〇〇年的巨大事變對於中國人民確是不啻上了一堂嚴肅的功課，使得中國人民的覺醒程度空前地提高。帝國主義者與滿清統治者發現中國人民已經是不易受騙的了。說是維持中國『獨立與完整』也好，說是『預備立憲』也好，無論如何，革命的呼聲是在這古老而落後的中國大地上響起來了。

試拿一九〇〇年前後的情況相比較一下，就可知道中國人民的覺醒程度的提高是何等迅速。戊戌維新運動的領導人，如前所述，並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明確思想，失敗以後且於海外設保皇黨，也沒有戰鬥的民主思想。義和團運動，如前所述，只能把底層人民的情緒表現於粗糙的排外行動中，且又受統治者的國家思想的欺騙，終至悲慘的失敗。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雖已萌芽於一八九四年成立的興中會，但其影響還極有限，而且當時興中會的革命思想也還不明確。在

一九〇〇年，興中會的領袖甚至還幻想和試圖通過英國關係、而聯絡兩廣總督李鴻章來代替滿清政權。但是到一九〇〇年以後，我們已可看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羣衆愛國運動漸漸增長，而且人民漸能認識滿清政府是個賣國政府，所以愛國人民決不能和它並立，所謂『預備立憲』的騙局一點也不能阻塞廣大人民革命的要求。孫中山於一九〇五年組織同盟會，使革命運動有了一個較健全的中心組織，在海外華僑和國內人民中都博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援。這一切情形都是在一九〇〇年前所沒有的。

由於新式的學校漸漸增加，西洋的包含着民主與科學的新知識也漸漸輸入，於是產生了一批新的知識分子，他們很快地成爲革命思想的傳播者和革命行動的組織者。這種知識分子自然在各大城市中最多。城市中的新式工商業已漸發展，在外國資本的壓迫和滿清官僚統治的壓制下，城市的工商業者按着他們自己的需要而漸漸傾向於革命的思想。有許多知識分子出洋留學，到日本去的學生在一九〇〇年後由百人激增到數千人，到歐美去的學生同時也漸形增加，革命思想在華

儒的工商業者中更形活躍。

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出，當時的革命知識份子並沒有能和人民羣衆中最大多數的農民結合。農民出身的滿清兵士中部分地受到了革命影響，包含着農民成分的會黨也有參與革命的，但是整個說來，當時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並沒有認識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這正是反映着當時的革命運動還是在初興而薄弱的資產階級的領導下，這個弱點使革命運動缺乏廣大的羣衆基礎，領導的思想也就不免顯得動搖。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也有不少在思想上其實屬於君主立憲派的士紳，只因看到大勢所趨，也來表示革命，爭取革命中的領導權；也有許多參加革命運動的人，雖然堅決反對滿清賣國政府，却不敢公然向作爲滿清政府後台的帝國主義者挑戰。這些弱點到了辛亥革命爆發時就很嚴重地表現出來了。

關於在這些年份中革命運動與革命組織的發展情形，不屬於我們此地研究的範圍，我們只是要指出，滿清末年的革命運動，表現於廣大的人民羣衆中的，決非簡單地只是排滿一點。不管當時的革命領導者能否充分把握到，但由羣衆運動

的發展軌跡上看，辛亥革命前革命潮流的澎湃是由一九〇〇年後的反帝愛國運動開端，而激烈地表現爲反對賣國的專制統治政府的。

當一九〇〇年北方形勢正十分緊急時，六月間，上海有許多名流士紳在張園召開『愛國會』，參加者有數百人，大半都還是屬於君主立憲派的所謂維新志士而不是革命者。然而他們的集會已引起滿清官方的仇視，事後與會的有許多人甚至被列入通緝名單。因爲滿清政府已經堅持媚外立場，所以溫和的愛國運動也是他所害怕的了。一九〇三年又發生拒法和拒俄運動。因帝俄軍隊佔據滿洲，藉口不退，且於這一年四月與滿淸政府訂立條約。上海張園便有羣衆集會，向滿淸政府表示全國人民決不承認這條約，同時通電各國外交當局表示『卽使（中國）政府承認，倘從此民心激變，遍國之中，無論何地再見仇洋之事，皆係俄國所致，與我國無涉。』㈠在日本的留學生也響應『拒俄』。與這同時，又有廣西巡撫王之春邀請法國駐越南的軍隊來平定當時在廣西方面的民變，許以事平之後，把廣

西的鐵路礦山權都給法國。這事也引起了各地人民激烈的反對，且提出了『驅逐王之春』的口號。

事實表明了當時人民與滿清統治者在對外立場上已漸形成尖銳的對立。所以參加愛國運動的雖不都是主張革命的，但他們一律被滿清統治者加上『革命黨』的帽子。如駐日公使蔡鈞電告北京政府說：『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拏。』㊁清廷爲這事立即密喩各督撫說：『前據御史參奏，東京留學生已蠢化爲革命黨，不可不加防備。……就使本爲忠義，然距義和團之日不久，亦深慮其有礙邦交。朕以爲該學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爲姑息。……地方督撫於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獲到，就地正法。……』㊂商約大臣呂海寰也函告江蘇巡撫恩壽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名爲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爲首之人密拏嚴辦。』㊃

到了一九〇五年，更發生了廣泛的抵制美貨運動。在這時候，美國國內發生

了歧視和排斥華工的現象，使中國人民普遍地對美帝國主義發生了深厚的惡感。廣州、上海、廈門、福州、天津 牛莊的商人同時聯合發動抵制美國貨運動，這是空前未有的事情。美國政府嚴重抗議，將以艦隊示威，滿清政府也下令嚴禁。這是中國人民以商業絕交來表現反帝情緒的第一次，也就表現着廣泛的市民羣衆（主要是工商業者）已開始走進了愛國政治運動。

更尖銳的鬥爭發生在礦權與路權問題上。人民反對外國人控制中國各地的礦山與鐵路，也就不能不直接和滿清政府的賣國政策相衝突。滿清的出賣礦權和路權不始於一九〇〇年後，但普遍的人民抗議則到這時期才發生。一九〇〇年後首先因直隸開平煤礦經過洋稅務司德璀琳（Detring）而賣給英國人，引起了直隸人的力爭。以後雲南人爲七縣礦山的出賣而力爭，山東人也力爭沂水金礦。人民的抗議居然做到了贖回很多已被滿清當局出賣的礦山。

路權問題尤其引起了巨大的風波。一九〇三年滿清當局發布「鐵路章程」，

准許商民自辦鐵路。於是粵漢鐵路本已賣給美國，後來贖回，即由民間集資設公司辦理。同樣在四川也有了川漢鐵路公司。但名為商辦，實際上也還在地方官員控制下，他們藉公司名義，向民間勒索股款，集了錢往往移作別用，始終不認真興築。這已經釀成了民間的積忿。但在既已集了不少民資後，官方忽然又和外國接洽鐵路借款，這更使民間不平。到了一九一〇年，滿清當局終於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商訂川粵漢鐵路借款，取消各省原有的鐵路公司。這時滿清當局以鐵路國有政策為標榜，但所謂「國有」，在當時人民看來卻正是用國家名義而把鐵路出賣給了外國。在四川為這事而引起的鬥爭最為激烈，發生了罷市罷課游行請願等活動。上層的士紳組請願團，入京「哭訴」；下層的農村人民在各地聚衆與官軍對抗，幾乎成為武裝起義。

簡單說來，這種情勢就是：在一九〇〇年後帝國主義者更公開地做了中國的主人，因而激起了各階級的人民愛國情緒的普遍高漲。滿清政府固然也口口聲聲

說要人民愛國，他所謂愛國就是要人民愛戴政府，但人民已能從事實的教訓中懂得了，是真正的愛國，就勢必要走上與這賣國的專制統治者不兩立的地步。在當時把這種認識說得最透澈的莫過於通俗宣傳家陳天華所著的小冊子。他說：

列位，你道今後中國政府還是滿洲政府麼？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路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遂立即奉行。……他拿定寧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隸的主見，任你口說出血來，他只是不理。㊄

因此他又說：

……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偏說我們與洋人作對，反說與現在的朝廷作對，要把我們當謀反叛逆的殺了。列位，我們若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麼？㊅

陳天華的宣傳小冊子寫於一九〇六年。他是如此明快地指出了『當今天子』其實是『洋人的朝廷』。這樣的赤裸裸的事實不可免的在廣大人民中激出了鋒芒

指向專制統治者的愛國大運動。終結了二百七十年的滿清統治的辛亥革命就在這樣的背景上爆發起來了。

㈠『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卷一，頁九九。

㈡同㈠，頁一〇〇。

㈢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一〇六。

㈣同㈠，頁一〇五。

㈤陳天華：『警世鐘』

㈥陳天華：『猛回頭』（均據『武昌革命眞史』）

第四章 『強』的人上（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一 不設防的幻想

辛亥革命的爆發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證明了人民的力量並不是不能够克服帝國主義的力量的。

帝國主義決沒有料到革命力量竟然能一舉而推倒滿淸政府。美英德法四國財團和滿淸政府訂立的一千萬磅『幣制改革及東三省實業振興借款』甫於辛亥革命爆發前整一年成立，川粵漢鐵路借款六百萬鎊的合同只在辛亥革命爆發前五個月正式簽訂。後一借款，雖然引起了四川、湖北、湖南的廣泛的『保路』風潮（人民反對政府用鐵路國有名義把路權實際上出賣給外國人），但是帝國主義者如此想：旣然五十年前有了戈登將軍參加，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就不能不失敗，

十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也在武力的鎮壓與巧妙的應付下覆滅；那麽還有什麽力量能阻止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行動呢？

對於中國人民的覺醒程度的提高和革命力量的增長，帝國主義者從來不可能正確地估計。事實上，一九一一年的情形已經和一八六〇年和一九〇〇年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保路風潮成爲武昌起義的先導，武昌起義後一個月間立刻形成了各省紛紛脫離滿清政府而獨立的形勢。滿淸統治者已經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中國人民也已不能够再在滿淸專制統治下面生活下去。帝國主義者需要滿淸政府，而人民却不需要這個賣國的專制政府。人民戰勝了滿淸統治者，也就是人民戰勝了滿淸政府背後的帝國主義者。

但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出，到一九一一年時，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比起過去幾十年來，雖然已經是空前提高，但究竟還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啓蒙階段。人民的覺醒還不够普遍，對於自求解放的鬥爭還沒有經驗。革命形勢閃電般地展開了。對於這個形勢，帝國主義者固然沒有料到，也還沒有應付這局面的經驗；

而人民方面，甚至作為當時革命的領導人物，也還沒有經驗。而且還應該說，在當時中國人民的缺乏經驗尤甚於帝國主義者的缺乏經驗。因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雖然是第一次遇到這局面，但是在本國和在殖民地的開闢事業中他們早訓練成了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本事了。所以辛亥革命的爆發雖使帝國主義者一時受到震憾，但他們立刻看出了中國的革命者和人民完全沒有經驗，狡猾地決定了下一步的做法，向人民反攻。

從什麼地方看出辛亥革命時中國人民及其革命領導人物當時還十分缺乏經驗呢？有兩點是極顯著的：第一、他們看不出君主立憲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差別。許多君主立憲派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已經擠進了革命隊伍中，而在革命爆發後，更大量地參加了進來，把革命的領導權抓到自己手裏。君主立憲派自稱也是要推翻滿清，建立民主共和，但他們努力使革命的內容限制在僅僅是滿清朝廷退位的範圍內。第二、辛亥革命時中國人民及其革命領導者雖然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是個賣國政府，所以非推翻牠不可；但他們以為這個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滿清政府一旦

垮台以後，帝國主義者就無所用其技了。因此當他們集中火力進攻滿清政府時，他們對於帝國主義者顯出了毫不設防的天眞態度，而一當帝國主義者表示並不準備再繼續支持滿清政府時，他們甚至幻想帝國主義者是眞心要做中國革命的朋友了。這種幻想尤其因爲君主立憲派混進革命隊伍中而更爲高漲。君主立憲派的首腦是康梁，早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梁啓超就已經表示希望帝國主義者幫助中國的進步維新。（見第三章第二節）君主立憲派既把對於帝國主義者的幻想充分地帶進到革命中間來，而革命派本來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沒有足夠的認識，這就造成辛亥革命中的最大弱點。

當辛亥革命前五年（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在日本組織同盟會後，曾擬定『同盟會革命方略』，其中包含着一個預定於起義後由『軍政府』來發佈的『對外宣言』，全文如下：

中華國民軍革命驅除異族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福祉，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

一、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二、償款外債，照舊担任，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

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佔領之域內人民財產。

五、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

七、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為戰爭用之物品者，一概搜獲沒收。㊀

由這可知，辛亥革命前運中山先生思想中也還沒有包含着在他晚年所明確標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反帝思想。很顯然的，這時期的革命者的對外政策是簡單地出發於一種恐懼心理，害怕中國革命會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國那樣的失敗。他們還沒有看出，如果中國人民的力量充分發動起來，帝國主義就不足懼；反之，如果以向帝國主義妥協來乞求他們的好意，則革命就會流產，就會失敗。——失敗的形式雖或與太平天國不同，但同樣是失敗。

武昌起義中，湯化龍等一班君主立憲黨人立刻在武昌軍政府中取得了優越地位，甚至於原是滿清的官僚軍人黎元洪被請出來當領袖。其他各省的獨立後的政權組成幾乎也都是這種情形。因此向帝國主義表示妥協的方針立刻被普遍接受而執行。武昌軍政府在起義發動後的三天（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即向當地各國領事致送照會，其說法和上舉同盟會革命方略的『對外宣言』完全相同。——只有個別的字眼不同。最後還加上了這樣的結語：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

武昌軍政府的態度可以代表其他獨立各省。到了十一月十六日各省代表集會於上海，成為臨時的中央政府的性質，推定伍廷芳、溫宗堯為臨時外交代表。伍廷芳曾為滿清派駐華盛頓的公使，担負了革命陣營方面的外交任務後，立即在十一月十七日發表對外宣言，其中在列舉滿清政府所造成的罪惡時提及百年來的中外關係，那是這樣說的：『列强在百年來曾個別的與集體的鎚打中國的大門，為

求傳播知識，改革國務，採用西方的科學與工業，並求中國捨棄那些使它不能進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的粗野陳舊而卑下的觀念，但他們（列強）是失敗了。』在這宣言中述及革命政府的政策時，說的是：『簡言之，我們已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以保護投資利益，尊重國際義務，維護商業的進行，保衛教育與宗教機關，而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繼續維持法律與秩序，保持和平，並在健全而持久的基礎上推行建設性的政策。』㊃這樣的話出於革命戰爭尚未完成，而北方的滿清政府還在掙扎圖存的時候，已是可異的了；而且我們還該看看所謂『尊重國際義務』在當時已宣佈獨立的各省的實際情形是如何。那可以由海關關稅一問題上最顯著地表現出來。

我們知道，滿清已把海關稅收的大部分直接用以償還外債和『賠款』。當革命發生後，許多沿海口岸樹起了革命旗幟時，這些口岸的海關的洋稅務司立刻用維持各國債權的理由自行控制了全部海關收入。當時的總稅務司安格聯（F. A. Aglen）在一個備忘錄中說：

建立這種控制，並沒有遇到什麼困難，革命的領袖們在這時雖然是在亟需要錢以從事戰爭的時候，却並沒有對於關稅的徵收作什麼干涉 還很可以說明革命領袖們的愛國心和他們對國際義務的認識。……而且我們還須記得，稅務司本是滿清政府的官員，滿清政府還能控制的北方許多口岸，由洋稅務司所徵集的稅收，仍有相當的數目繼續流入滿清政府的國庫中。……

這說的是辛亥革命發動後兩個月內的情形。那就是：在北方港口的洋稅務司仍舊和滿清政府合作處理關稅，而在南方革命地區內的海關洋稅務司則全部截留關稅在自己手裏，革命政府不但一點也不抗議，反而因爲南方的稅務司並不把稅收交給滿清，已覺得十分滿意了。到了十二月中，各國在北京的公使向滿清政府提出要求，把北方海關的稅收也全歸稅務司支配，命在垂危的滿清政府立即表示接受。安格聯的備忘錄中說：『這要求立刻被接受了。這證明政府當局並不落後於革命領袖們，也同樣願意採取正確的和適當的做法以維持國家的信用。』這是用帝國主義者的口吻，一面讚美滿清政府，一面讚美『革命領袖』，——對於革命的中國人民的侮辱可說是莫過於此了。

帝國主義者在辛亥革命發動之初，並不是不打算甚至從軍事上幫助滿清。例如，其時在北京的英國公使朱爾典（ John Jordan ）在十月十六日向本國政府所作的報告中說：『十月十日的起義爆發後，湖廣總督（瑞澂）乘了一隻停泊在英國兵艦旁的中國巡艦而逃到對江，他通知各領事，他已不能保護外國人，他並要求英國船協助防止叛軍渡江。我接到了這消息後，立刻請海軍總司令盡力與漢口以援助。他馬上接受了這要求。……』[58]

但列強在這時不可能對於中國革命實施有力的武裝干涉。因爲帝國主義列強已經捲入了第一次世界戰爭以前的相互的矛盾衝突之中，這是一；再則中國革命的形勢發展如此的快，使得列強各國發現，如果公開站在滿清一方面並不是聰敏的事。十月十八日卽由漢口各國領事團發佈中立佈告，佈告中說：

現値中國政府與中國民國軍互起戰爭。査照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應識，該國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並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援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本領事等自嚴守中立，遵照租界規則不准攜帶軍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

界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㊅

各國之所以採取中立觀望的態度，不外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因為看到滿清政府應付革命的倉皇失措情形更對它失去信心，如朱爾典公使的報告所說：「現在一般的意見是目前的叛亂將被壓制下去，但滿清朝代的前途却是很慘淡的。它已普遍地被人民所不信任。……」這是說：革命是會失敗的，但滿清却已不值得支持。又一方面就是因為革命者的對外表示看起來並不可怕。朱爾典的報告中說：「叛變的將軍黎元洪，據報告是一個很有知識的人，能說英語，曾有些在外國的經驗。他已通告漢口的各領事說，他所建立的政府必將尊重對於列強的既有條約與現狀，並將充分保護一切外國人，只要他們不幫助滿清政府。」㊆朱爾典的報告寫於漢口領事團宣佈「中立」的前三天，足以說明當時外國人的心情。由上舉宣佈中立的佈告來看，那其實是局部地區的，含義不明的「中立」，但這已經使革命陣營對於帝國主義的幻想更為加強了。

滿清政府在十月十四日挽請袁世凱出山，二十七日又答應袁世凱的條件，授

爲欽差大臣節制各軍，更於十一月二日任袁爲內閣總理大臣。十三日袁入京組織內閣。滿清的軍政大權已落到了袁世凱的手裏。同時革命的方面已光復了七八個省分，並開始進行臨時的中央政府的組織。在這情形下，帝國主義的『中立』調子就越發唱得起勁了，因爲這時袁世凱站出來儼然成爲時局的中心人物，列强各國覺得他們可以在『中立』的面幕下玩更多的把戲。袁世凱的軍隊在武漢方面頗有勝利，十一月二十九日繼漢口以後又攻佔漢陽，給革命軍一大打擊，但十二月二日革命軍佔領了南京，聲勢又振。南北政權對立的形勢已經形成。但就在這時雙方開始進行休戰和談。十二月五日袁世凱通電休戰三天，期滿又延長十五天，派出唐紹儀爲代表南下議和。

混在革命陣營中的君主立憲派人對這種情勢的發展自然是『正合孤意』，而還沒有足够的經驗與認識的革命者也看不清楚局勢發展的危險性。他們只看到列强並不積極支持滿清，居然肯承認革命軍的地位，又看到袁世凱取得大權後在還有作戰能力時居然願意休戰和談，便以爲這都是萬分値得欣幸的事；他們並沒有

想到，就在這情形下，帝國主義者與袁世凱互相配合着的陰謀正在着着進行。

㊀『總理全集』（黃季陸主編本）上卷，『方略』部，頁一六一——一七。

㊁ 張忠紱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五。

㊂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td Readings, pp.714-715

㊃ 同㊂ pp.704-705

㊄ 同㊂ p.700

㊅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頁一二〇

㊆ 同㊂p.701

二　袁世凱的『勝利』

袁世凱是繼承李鴻章衣鉢的人。在一九〇〇年，他任山東巡撫，在本省境內用武力鎮壓義和團以保護外國人；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清廷要他率軍入京防衛，他却遲遲不進，而與南方表示『中立』的各省督撫取一致態度，和列強始終保持友好關係。這些就使他開始爲帝國主義者所賞識。一九〇一年李鴻章死時，推荐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因爲這個職位是滿清的中央軍權所寄，爲大局安危所繫，李鴻章覺得在他死後，只有袁世凱既能得列強的垂青，又能有力量鎮定國內。袁世凱早在一八九六年即已在小站練兵，後來在外國人幫助下逐漸擴充，便擁有當時號稱最强的『新建陸軍』。自繼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後，他在滿清政府中取得了更高的威權，但也因此受到政府中其他派系的嫉妬，尤其爲滿洲人的官僚們所忌視，怕他篡奪滿清朝廷的皇位。在一九〇九年他被迫解職，回到

彰德故鄉中去『隱居』。可是他在滿清軍隊中的潛勢力仍舊存在，所以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義爆發後，滿清朝廷手忙脚亂，驚惶失措，不得不敦請他『出山』。十月十六日，英國公使朱爾典向政府的報告也提到這事：『袁世凱……被再三請求出來挽救帝國。……他的名字對於軍隊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他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㊀這話可以反映列强對於袁的重視。而在革命的陣營方面，尤其是由君主立憲派和原來的滿清官僚而改穿革命制服的人，對於袁世凱的出山也十分重視，他們旣害怕袁世凱的力量，又希望袁能放棄支持滿清的立場，使滿清快點垮台，而以袁爲領袖來收拾革命後的局面。

這一切情況就使得袁世凱可以順利地進行他的陰謀。他的陰謀，簡單說來，就是一方面不讓滿清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勢力立刻取得全勝。他藉革命來恐嚇滿清：如果滿清不退位，那麼我袁某也無法收拾這局面；又藉滿清來恐嚇革命：如果革命不向我袁某妥協，那麼我就要支持滿清和你打到底。

當帝國主義列强看出袁世凱的這套把戲後，他們立刻加以協助。因爲在帝國

主義者看來，滿清政府雖是忠實的僕從，但已太過軟弱，禁不起風浪；革命方面雖然一開始就表示對帝國主義妥協，但發展下去，『溫和派』是否能始終掌握領導權而建立對帝國主義有利的秩序呢？這還是疑問。那麼利用袁世凱來遮斷革命的進程，代替滿淸的位置，豈不是對帝國主義列強最有利的做法麼？

十二月初開始的休戰顯然是不利於革命形勢發展的，因爲在北方，滿淸的基本勢力尚未摧毀，而袁世凱也需要一段時間來整頓他的實力。這次和談是袁世凱在北京先和英國公使朱爾典商量好了，由朱爾典電令駐漢口英領事出面介紹南北雙方談判。談判地點本定在漢口，臨時又改到了帝國主義勢力直接控制下的上海的『租界』中。英美法俄日德六國公使並於十二月十五日向南北雙方代表提出同樣的覺書，說是『中國內亂延長將危及外國之利益及外人的生命財產，所以希望和議早日完成，勿使戰事拖延。』㊀這樣，和談就由十二月十七日開始。談判的開始也就是革命勢力向袁世凱與帝國主義妥協的開始。

在談判尚未完成時，南京的臨時政府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成立，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立刻提出責問，認為南方不該正式成立政府，總統位必須讓給袁世凱。這種荒謬的條件，南方政府居然表示可以承認。這中間帝國主義是盡了力的。原來列強在宣佈「中立」後，雖曾表示停止對滿清的一切借款，但因為不想馬上逼死滿清，又因為要支持袁世凱的地位，所以除了分給滿清政府一部分關稅收入外，又由四國銀行團提供了三百十萬兩貸款；到了南北和議開始時，關稅已停止分給滿清政府，但各國仍表示願意貸與少數款項以「作為維持北京市面之用」。美國公使芮恩思（P.Reinsch）竭力主張這種貸款，其理由是：「倘北京政府因財政困難而不能維持，則中國或將陷於無政府狀態，……且列強合作借款於袁世凱，亦可對中國南方之氣燄與以打擊，不致要求過奢，致南北和議不能成立。」㊂

到了一月下旬，南方雖已承認讓位給袁世凱，但仍附有袁世凱所不願接受的條件，談判幾乎又要決裂，這時，奧國瑞記洋行突然在一月二十九日借了七十萬鎊

給滿清政府（也就是借給袁世凱）。這是最顯著不過地表明列強在支持袁世凱而繼續逼使南京政府就範。（其所以由對華利益較少的奧國洋行貸款，自然是因爲別的大國不便出面的原故。）但如果南方政府是建立在革命人民的基礎上，自力更生，撇開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幻想，那麼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示威也就不能有什麼作用，無奈南方政府並不如此！

這時南方政府，由於對帝國主義存着幻想，處於極其可憐的情況中。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又於一月二日以臨時大總統名義向各國籲告道：

……深恐世界各邦或昧於吾民睦鄰之眞旨，故將下列各條，披瀝陳於各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鑒之：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爲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其締結於革命起事以後者則否。

（二）革命之前，滿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其在革命軍興以後則否。其前經訂借事後過付者，亦不否認。

（三）凡革命以前滿清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

其在革命軍與以後者則否。……

> 抑吾人尤有進者　民國與世界各國政府人民之交際，此後必益求輯睦，深望各國既表同意於先，更篤友誼於後，提攜親愛，視前有加。當民國改建一切未備之時，務守鎮靜之態，以俟其成；且協助吾人，俾種種大計，終得底定。蓋此艱鉅之大業，固諸友邦當日所勸告吾民，而滿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21]

當時南京政府以爲革命目的既在推翻全靠外國支持的滿清，那麼現在由『革命政府』來把滿清政府所已經簽訂的一切賣身契都承認下來，各國就不會再去和滿清打交道，甚至就會來協助『革命』政府了。但他們沒有想到，公然接受了滿清政府的醜惡遺產，那怎麼還能夠團結廣大的革命人民呢？他們更沒有料到，列強也並沒有因此就來『協助』革命；『在革命軍與以後』，外國仍向滿清政府勒索新的權利（如十二月中旬關於海關稅收由外國人支配的協定），且仍供給他新的借欵；而對於南京政府，外國人也根據和滿清政府的協定把持着全部關稅，不分一點錢給牠；更談不到任何借款了。所以這時南方政府財政上的困難甚至尤甚於北方政府。

帝國主義又不僅行使經濟壓力，而且還有經濟以外的壓力。長江上集中着日本和英國的兵艦，東北則有俄國日本的軍隊在窺伺。列強口口聲聲說是如果中國『內亂』不止，就要實行干涉。在南北和議尚未協定時，袁世凱系統下的各地軍閥官僚，左一個電報，右一個宣言，說的都是國事危急，外國干涉的危險迫在眼前，拿這來作爲脅迫南方政府讓步的理由。南方的革命陣營也捲在這種恐怖中，似乎眞是如果不向袁世凱全盤讓步，立刻就會遭逢亡國的危險。例如伍廷芳，張謇等人組成的共和統一會在十二月底宣言說：『今日列國之對於（革命）軍興，尚未干涉也，固也。今不干涉之果否可恃，可否持久，智者能測而知也。……彼今之尚未實行干涉者，一則戰禍之爲日淺也，久亂不治，斯干涉繼之矣。……一旦干涉提出，軍國之步調亂矣。』③那麼怎樣才能使列強不干涉呢？只有請袁世凱來當總統！

就在這樣的空氣下，南京政府步步退讓，終於一切順從了袁世凱的意志。作爲南京政府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受這種空氣的壓迫，只能提出些其實無用的防患未

然的條件。他在一月的談判中曾提出，在滿清退位後應由南京政府統一南北。俟各國承認這統一政府後，他才解職，而推袁繼任總統。但這條件不能實現。袁世凱旣堅決不肯讓南方來統一北方，而列強也毫無承認南京政府的意思。南京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曾兩次電請美國政府承認，美國政府都置之不理。二月十二日滿淸政府宣佈『退位』，袁世凱立刻在北京組織臨時政府，並通知各國駐華公使轉告各國政府。列強各國當卽應允與北京臨時政府發生事實上的關係，美英德法四國銀行也馬上和北京政府進行借款的商洽，而且先允墊付三百萬兩，作爲結束南京政府和組織北京政府之用。——這樣列強各國所中意的是袁世凱的政府而決不是孫中山的政府，那是再明白也不過了。可憐的南京政府到這時除繼續向袁世凱屈服承認袁世凱的『統一』外，實在已沒有別的路走。二月十三日孫中山向南京臨時參議會辭職，十四日參議會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二月二十九日，美國上下兩院通過一決議案，慶賀中國共和政府的成立。——在帝國主義者心目中，只在孫中山已決定讓位給袁世凱後，中國的共和政府才算是『成立』了。

但孫中山先生這時還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希望袁世凱南下就任總統，首都遷到南京。這仍是袁世凱不願意的，因為北方是他的實力基礎。列強各國既決心支持袁世凱，又因為辛丑條約保障着列強可以用武力控制平津一帶，所以也不同意中國首都南遷。袁世凱二月十五日電告南京政府，拒絕南下，其中說，「…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六)這已顯然是用各國外交團（那在滿清時代向來就是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的名義來恐嚇南方政府。南方政府却還不肯罷休，專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八人到北京迎袁南下。狡猾的袁世凱一面盛大歡迎專使，懇談南下問題，一面密令他的親信部隊在北平兵變，造成恐怖空氣，來證明他確不能離開北京。這時列強各國也馬上表現了配合行動，京津一帶各國駐軍紛紛出動，日本軍隊又在秦皇島登陸，形勢真好像是只要袁世凱一離北京，「內憂外患」馬上就接踵而至了。

這時，南方政府中的許多本已存心對袁世凱妥協的人又齊聲呼喊起來了。如黎元洪通電說：『頃聞京津亂黨操戈，首難雖平，餘孽未清，禍變之來，將未有艾。外人對之，極爲激昂。某國並潛謀運兵，入規京輔。設再稽時日，險狀環生。列強耽耽，難保不自由行動，瓜分之禍卽在目前。』那麼該怎麼辦呢？『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縱金陵形勢勝燕京，猶當度時審勢，量爲遷就，況利便之勢相判天淵乎？』㊆照這位革命政府的黎『副總統』的看法，如果南京政府硬要堅持主張，中國就會大亂；如果袁世凱遷就南方主張，中國就會亡國！

忠厚老實的蔡元培在北京受了袁世凱和列強的恐嚇，也認爲還是全部向袁妥協的好，連電南京，說是：『外人自由行動，恐不可免，……速建統一政府爲今日最要問題，餘儘可遷就，以定大局。』㊇又說是：『內變旣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現，無政府之狀態，其害不可終日。……外人亦嘖有煩言。若不從速解決，以安人心，恐至敗壞不可收拾。』㊈

首都之爭本已是南方政府退兵中的最後一着，這一着的失敗是不足爲異的。

我們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領袖們在心理上有兩個基本弱點，第一是害怕分裂，只求迅速『統一』，以爲如不『統一』，就會大亂；第二是害怕列强干涉，切盼外國『承認』，以爲如果不能得到列强『承認』，中華民國就不能生存。這兩個心理上的弱點自然是有實際原因的：辛亥革命沒有能眞正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當革命領袖回顧自己背後，並無可靠的力量時，就只能處處受妥協派的牽制而向反革命勢力投降了。於是非袁世凱，中國就不能統一；非承認帝國主義列强給中國選定的統治者，中國就只能亡國，——這樣的看法就成爲一時的支配意見了。民國元年三月十日，袁世凱經南方政府的同意在北京宣誓就臨時大總統職，四月一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任務。南京的參議院遂即搬到了北京。到了民國二年四月美國政府相信袁政府已經穩定，便首先正式『承認』，後來其他列强也在袁世凱被選爲大總統時相率承認。——於是『統一』和『承認』兩點都做到了，但『統一』了的，列强所『承認』了的，是帝國主義用來代替滿清政府的新工具——袁世凱的政府！

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曾正確地總結了這段歷史的經驗，他說：

>（辛亥）革命雖號稱成功……曾幾何時已爲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爲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者實爲袁世凱。其所挾持之勢力初非甚强，而革命黨人乃不能勝之者，則爲當時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且尚未能獲一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使當時而有此政黨，則必能抵制袁世凱之陰謀以取得勝利，而必不致爲其所乘。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强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與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10]

孫中山的這段話是值得仔細吟味的。辛亥革命的結果，的確是袁世凱勝利而革命失敗了。但袁世凱爲什麼能勝利呢？固然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但也不只是因爲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一方面，帝國主義者支持袁世凱，另一方面，革命勢力又向帝國主義採取了調和妥協的態度，同時也就向袁世凱採取了調和妥協的態

度。——這就是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取得了勝利的基本原因。

㈠ Mac 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701

㈡ 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三八

㈢ 同㈡，頁五六

㈣ 『總理全集』（黃季陸主編本）下卷文電類頁十八——十九

㈤ 同㈢，頁三五

㈥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頁二四

㈦ 『黎副總統書牘彙編』卷一，頁七——八

㈧ 同㈢，頁三三

㈨ 同㈣，下卷文電類頁五——六

㈩ 同㈣，上卷宣言類頁四五——四六

三　眞是「強的人」麼？

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所努力的總是在企求建立和維持一個能爲他們服務而有足够能力統治國內的政府。拉鐵摩爾說得對：

> 中國本身的組織很弱，而外國的努力在中國却組織得很強，在這樣的國家中，他們（帝國主義者）覺得，如果能把他們的要求向某一個人提出，那就最可以放心了。只要他們能够找出這樣一個人——在十九世紀末找到一個李鴻章，二十世紀初找到一個袁世凱，他們總是願意在貸款，武器裝備，軍隊訓練各方面給以充分的幫助，使他充分地強有力，來爲他們的利益而統治着中國。㈠

如果滿清皇朝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已經崩潰，則李鴻章一定是帝國主義者所滿意的繼承人；現在中國人民雖然已在辛亥革命中使得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承認滿清的死亡，但帝國主義者却找到了袁世凱，便幫助他成爲中國的新統治者。變動的風波過去了，一切仍在他們所能控制的範圍內；帝國主義者自然是躊躇滿志，得意非凡。但是有一個潛在的事實爲他們所不能看出：這就是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經過

了一九一一——一二年的事變已經又一次大大地提高了。革命——縱然是未成熟的革命，對於人民的教育作用之大，在當時常是難以估計的，帝國主義者在一心慶賀他們的『成功』時，更完全不可能看到這一個事實。

是的，對於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與革命力量，帝國主義者是從來不可能正確地認識的。當中華民國誕生時，外國人所抱着的認識是怎樣的呢？拉鐵摩爾說：

在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時期，多數美國的專家（歐洲的自然也是如此）都堅持認定，民主政體是絕對不適合於中國人的。只有皇帝是中國人民所能够懂得的東西。中國人對自治的政府並不感興趣。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父家長制式的穩定政府——法律秩序和合理的租稅。軍閥袁世凱就被說成是這樣的一個為中國所需要，為中國人所能懂得的强的人。而孫中山則被說成或者是一個可愛的但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或者是一個可惡的空想家。㊂

這樣的看法和當時中國人民所已經達到的認識水準相距是多麼的遠啊！正因此，帝國主義就在袁世凱身上寄託最大的希望，以為他既和滿清政府同樣地馴服，又比滿清政府更強更穩固，是最合理想不過的『强的人』。他們放心大膽地全力支持他，一直支持他到恢復帝制。但他們沒有料到，他們所認為『强的人』，只不

過在四年以後就受不住人民的一致唾罵和反對而一敗塗地倒下去了。

袁世凱的『統一政府』成立後，對於滿清時代對外所訂的一切賣身契約，不待說得，是一古腦兒承受下來了，——好在連辛亥革命的革命者方面也承認過這樣做的。在元年四月參議院首次在北京集會時，袁發表宣言說：『凡我國民務當……以開誠佈公鞏固邦交爲重，凡從前締結之條約均當切實遵守，其已締約而未辦之事，迅速舉辦。』㊂到了民國二年十月，他就任正式大總統時，又向各國公使外交團致詞說：『本大總統深以履行條約，循守成例，與友邦敦睦爲唯一之基礎。』㊃袁世凱在這裏說的是老實話：他的『唯一基礎』就是乞求帝國主義主人的援助。因此對於帝國主義，自然是不僅遵守成文的條約，而且遵守一切不成文的『成例』；不僅已辦的事照辦，而且『未辦』的事也要辦！於是滿清在退位前把海關稅款全部交外國人直接支配的『成例』，『民國政府』以正式文件加以承認了；而日本對滿州，帝俄對蒙古，英國對西藏的『勢力範圍』，也在民國元年

到二年間分別從袁政府得到了具體的保障。美國也得到了貸款導淮，由美孚洋行調查華北油礦並專利開採延長、承德之石油等權利。

但袁世凱有一套媚外賣國的理論。在就任正式大總統宣言中，他說：

> 夫輸入外國文明與其資本，名國家主義而實世界主義。世界文明之極，無非以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使社會各得其所，幾無國界可言。孔子嘗言大同，吾國現行共和，則開闢時代之舊思想必當掃除淨絕。凡我國民既守本國自定之法律，尤須知萬國共通之法律，與各國往來，事事文明對待，萬不可有歧視外人之意見，致生障碍，而背公理。……本大總統聲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各外國政府所訂條約協約公約必應格守，及前政府與外國公司人民所訂之正當契約亦當格守，又各外國人民在中國按國際契約及國內法律並各項成案成例已享之權利，並特權豁免各事，亦切實承認，以聯交誼而保和平。凡我國民當知此爲國際上當然之理。蓋我有眞心和好之證據，乃能以謀往來也。㊿

由此可知，袁世凱的邏輯就是：中國人民只該老老實實承認在這世界上屬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那就叫做『世界主義』，也就叫做國家主義！而且照袁世凱說起來，能够有資格還滿淸時代欠下來的洋債還算是洋大人賞臉。他說：

『臨時政府成立以來，外人之對我，驟承認國家之資格而可行使前淸之債權，就計已達英金一千二百萬鎊之多，皆屬政府應負之責；屢次催逼，百無一應。國信不立，安能奠定邦基？每一念及，此心如痗！』㊅這段話中的『我』字應該如實地解釋作『我袁世凱』的意思，那就很通順了。外國人已經承認『我袁世凱』可以行使『債權』（其實是還債權），這就是他們已正式任用『我』做代理人了；但如果『我』竟不能做到主人所付託的任務，『我』的心裏多麼難過啊！

這樣忠誠的代理人怎能不得到帝國主義主人的歡心？而且袁政府也和滿淸政府一樣，在財政上除了依靠更多借外債外，別無其他辦法。只要拉着債務一根繩子，就不怕這條狗調皮頑花樣。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這時又把日俄兩個也拉了進來，成爲六國銀行團，共同向袁政府投資。六國銀行團自袁政府開始成立後就一面先行墊款以維持袁政府，一面商量大借款的辦法，列强提出的條件是由銀行團派員直接監督中國政府的財政。這個條件一宣佈，立刻舉國譁然，使得袁世凱不敢立時答應，拖到二年四月正式訂立，共借二千五百萬鎊，條件自然完全照列强

的意思。在快要簽訂時，美國忽然因各帝國主義間的利害衝突而退出銀行團，表面的理由是認爲銀行團不應干涉中國內政，實則在一年來的商洽條件的談判中，美國旣始終參加，而且所有的條件，也是在美國參加之下決定了的。

這次非法大借款，再加上暗殺宋教仁（二年三月），這兩件事震動了中國人民。由同盟會擴大而成的國民黨，這時才開始看出了危機，發動反袁的『二次革命』。但也只是孫中山所能直接影響的一部分人覺得有必要從事新的革命鬥爭，而且國民黨因爲在這一年來向袁世凱和帝國主義步步妥協，已使牠和廣大人民脫了節。而在袁世凱方面，旣得到了帝國主義的完全支持，覺得有恃無恐，先下手爲强；以大借款爲資本，袁世凱在七八月間發動武力進攻，把國民黨在南方所能控制的一部分武力消滅掉了。當他開始動員時，就向各國公使說：『……本國政府……力求所以饜外人之望，若本國不能統一，對內則裁汰冗兵，劃一幣制，無從入手。因此於各國商業保護條件俱有妨害，不獨無以對本國良民，亦何以對和

好各國』。㊄這正是向列强報告，『我』之用兵『統一』是爲了你們的利益。

二次革命的失敗使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信任更加强了。他們相信袁世凱不僅是他們的忠僕，比滿淸有過之無不及，並且不像滿淸那樣地對內統治力太弱，而是合於需要的『强的人』，你看，只要供給他一些錢，他就能完成武力『統一』了。所以除美國已搶先『承認』外，別的列强等到袁世凱逼次武力實習後也都正式加以承認，表示對他的完全信任，雖然事實上的承認是早已開始了。帝國主義以爲有了袁世凱做代理人，一切可以放心；袁世凱也以爲有了帝國主義做靠山，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但後來的事實可以表明，當袁世凱因『勝利』而被帝國主義主人所嘉獎時，已是他力量登峯造極的時候；從此以後，他儘管還是氣燄萬丈，但實際上已開始走着下坡路。爲什麼？就因爲人民在這時已不像在辛亥革命前那樣地經驗貧乏，袁世凱的眞面目已經開始被人民看穿了。如果在二次革命前，『中國非袁不可』之說還深入人心，但經過二次革命，人民漸漸普遍地覺得，中國非去掉袁世凱不

可。孫中山在二次革命的戰爭開始時發表宣言說：『國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繫於袁氏一人之去留。……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㊇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固然是失敗了，但歷史終將證明究竟誰是更強的？ 是喚起人民的覺醒而爲帝國主義所討厭的孫中山呢？還是以人民爲敵而以帝國主義爲靠山的袁世凱？

㊀㊁ Oweg Latimore: Solution of Asia p.80;pp. 7—8.

㊂——㊆ 『袁大總統書牘彙編』，分見卷六頁四；卷首頁二七；卷首頁八—九；卷一頁四——五；卷五頁六—七。

㊇ 『總理全集』卷上宣言類頁一八。

四 『請再高陞一步』

在武力壓平了『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就一步步加强他的統治。民國二年十月他强迫國會選舉他爲正式大總統，十一月下令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的國會議員，三年一月更把其他議員也盡行撤消，另行設立一全由袁的黨羽組成的中央政治會議，又組織約法會議，於五月初公佈一袁記約法，於是辛亥革命中所產生而僅存下來的兩件遺物——國會和臨時約法，到這時完全被袁世凱取消了。民元的臨時約法中的中央政府組織接近責任內閣制，對總統權力限制頗多，而袁記的約法却使大總統能獨攬一切大權。對外繼續獻媚賣國，對內加强獨裁統一，這是袁世凱的政策。對此他也有一套辯解。他在政治會議開幕時致『訓詞』（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說：

……殊不知國力之强否，視其內政外交之若何，而內政外交之善否，又視其政府之强固與否，

而國體之爲君主爲民主不與焉。（準備行帝制的意思已經顯露了——引者）……至於外交棘手尤甚。中俄協約雖成，而庫倫獨立尚未取消，西藏交涉至今而英人不肯讓步，其他各國眈眈環伺，欲向亞東大陸染指問鼎，固未可因共和成立便可高枕而臥也。況外交之進行恒視內政之臧否爲轉移，苟內政修明，則列強之對我自必親睦。否則我先自伐，又何怪人。今我內政既如彼紊亂，則外交上當有如此之現象。總之，皆由政府權力薄弱之所致，理固然也。㊀

在這裏，袁世凱的邏輯也很清楚就是：帝國主義壓迫侵略中國民族是合理的，因爲『我袁世凱』的權力還太薄弱！所以人民不該怪我『外交』辦不好，只該讓我有更多更多的權力。但事實上，誰都看得出來，袁世凱這種集中權力的運動正是帝國主義列強所歡迎之不暇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愈能享有更大的權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權益就愈有保障，那是不用說的。

美國、日本、英國、德國對於袁世凱建立獨裁以至恢復帝制，都曾經給以慫恿和鼓勵，那是不可掩飾的事實。所以到了民國四年夏天袁世凱決心開始帝制運動時，向籌安會的負責人說，『外交上沒有問題，我已有把握，汝爲之可也。』

『此事外交一面，我已辦妥，汝等可不管。』㊁這並不是老袁的吹牛。這一年七月袁政府又派顧維鈞到美國，其使命就是爲帝制運動宣傳。㊂

在袁世凱政府中，有着爲數不少的外國人當『顧問』。日本的有賀長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親信），美國的古德諾博士（Francis J. Goodnow ——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霍浦金斯大學校長），都是袁所聘用的政治顧問。對於帝制運動的策動，都起了不少作用。『中國與世界戰爭』一書作者惠勒（W. P. Wheeler）在說到民國三年袁世凱的約法時指出，『被任爲憲法顧問的古德諾教授，對於這一文件的制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惠勒更指出，在這一個約法頒佈後，『中國看來已趨向於一個在民主外貌下的專制政府』。㉔由此可見，古德諾在發表他的著名的『共和與君主論』以前，早已在爲袁世凱獨裁制效勞了。『共和與君主論』發表於民國四年八月，至今還有些美國『學者』和中國『學者』說，袁世凱的籌安會利用古德諾的文章作帝制的理論基礎是誤解了他的原意，他的原意其實

不過是從『理論』上研究對於中國最適宜的是民主制呢還是君主制，以及在怎樣的條件下恢復帝制才有利。但如果我們一讀古德諾的原文，就知道他既從一般的『理論』上肯定：『民智卑下之國最難建立共和；故各國勉強奉行終無善果』，『自今以往一國之制度將不容其妄自建設，致召革命之紛亂，再蹈南美洲前世紀之覆轍。今後之國家當詳慎定制，維持治安，否則外人之監督恐將不免』。他又具體地討論中國情形說：『四年之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並且肯定：『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蓋中國如欲保存獨立，不得不用立憲政治，而從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與夫列強之關係觀之，則中國之立憲以君主制行之為宜，以共和制行之則較難也。』[5]這很顯然的是以列強的干涉將使中國失去其獨立資格為威脅，教訓中國人要懂得列强需要的不是眞正的民主立憲而只是君主立憲。如果我們無法否認這個做袁世凱顧問的美國大學校長的意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着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那麼我們就不能不由這裏看出，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侵略者，

所希望的中國政府就是『一個在民主外貌下的專制政府』，或者說是一個披着立憲外衣的君主政府。生成媚外骨頭的袁世凱及其嘍囉們自然要捧着這個『民主共和國』的『大政治家』的話，當做他們實行帝制的『合法經典』了。

至於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要袁政府接受，而拿承認帝制做交換，這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原來，自民國三年七月底歐戰爆發後，西方列強既都捲入帝國主義混戰中，美國雖尙未參戰，也不可能太多顧到遠東的事情。所以日本就在事實上成爲帝國主義者中對中國問題發言權力最强的一個。袁世凱想當皇帝，在知道美國方面可表贊同後還不得不力求日本的援助。於是在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隱含深意地向袁說，『若開誠交涉，則日本希望貴大總統再高陞一步』。二十一條內容的狠毒足使中國亡國而有餘，立刻引起全國人民的激烈的抗議，這使賣國性成的袁世凱也不得不躊躇好久，但因爲迫切需要日本力量以助行帝制，還是在五月九日簽字承認下來了。這中間，作爲袁世凱政府顧問的日本人有賀長雄曾反覆來往於北京東京之間，就是爲了完

成這筆交易。

我們還必須進一步認識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日本的陰謀團體黑龍會在民國三年九、十月間提出過一個祕密的備忘錄，事後被揭露。日本當時的對華政策大體上正與這備忘錄的內容相符合。最顯著的，是這裏已包含着『二十一條』的初稿。這備忘錄的基本精神是要乘歐戰的機會『從速解決支那問題』，以求在政治上和財政上完全控制中國，使中國實際上降爲日本的殖民地。如何達到這個目的呢？這就接觸到是否要支持袁世凱的問題。這個備忘錄中指出，在袁的統治下很可能發生革命和叛亂，如果沒有外力的援助，就不可能加以壓平。『當這樣情形發生時』，黑龍會的備忘錄中說，『我們是否只要有把握能影響袁政府使牠同意我們的要求，就給以支持，幫助牠壓平內部叛亂呢？還是去幫助「革命者」來達到一種成功，通過他們以實現我們的目的呢？』黑龍會不贊成前一辦法，他說：『因爲大多數中國人對於那搖搖欲倒的袁世凱已完全失去信心，全國都在攻擊他是出賣了祖國』，這是理由之一；還有另一理由是說袁政府太過依賴西方列強，

恐怕不會對日本忠實到底。提出了這樣的論據，所以黑龍會在這備忘錄中建議日本政府不要『盲目』地一直支持袁世凱下去。㊅——黑龍會的這種說法在現在來看，有什麽意義呢？很容易看得出來，黑龍會是提出了一個陰謀，這陰謀又顯然是從列強處置辛亥革命的經驗中引出來的。既然西方列强曾經通過辛亥革命而扶植出一個甚至比滿淸政府更可靠的忠僕，那麽日本爲什麽不可以在袁世凱以外找出一個對於日本比袁世凱更好的忠僕呢？黑龍會所說的『扶植革命者』，自然就是這樣的意義。日本帝國主義由獨佔中國的立場，不喜歡和西方列強共有一個在華的代理人，加以機靈的日本陰謀家在這時已看出袁政權並非眞是穩固，而集中在歐戰上的西方列強這時也不可能給袁以實際援助，所以他就覺得他可以自由選擇和製造完全受他控制的新的中國統治者。——由後來的事實發展很容易看得出來，日本政府確是接受了這套陰謀計劃，所以他一面不放棄袁世凱這工具，慫慂他帝制自爲而換取『二十一條』的簽字，一面已準備好隨時把這工具踢開，另換新的工具。由這裏，也可懂得爲什麽自滿淸以來的中國的賣國獨裁統治者對於日

本帝國主義雖也恭順，但又十分害怕他，而由衷地歡迎美帝國主義所領導的標榜着「門戶開放」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因爲在中國的統治者看來前者是「狠毒」的主人，有時會不顧一切地把他做忠僕的地位都取消掉，而後者則是「善良」的主人，只要服待得好，就能得到嘉獎和援助，不會有被硬生生地無情地踢開的危險。但是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看來，二者同樣都是扶植這一個或那一個反動統治者以奴役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侵略者。

最早支持袁世凱的帝制的還有德國。但歐戰開始後，德國在中國政治上已漸失去作用。至於英國，朱爾典公使向來就和袁世凱保有着密切的關係。「六君子傳」的作者陶菊隱指出：「二次革命時，朱（朱爾典）認爲中國僅有袁具有維持秩序和保護外僑的力量，所以外交團一致袒袁，對反袁派採取干涉手段。朱也認爲「中國應該有一個皇帝」。袁世凱的皇帝夢，至少有幾分之幾是外交關係所促成的。」[七]

當袁世凱自信已有了順利的『外交』條件後，他的帝制運動就在民國四年八月開始公開化了。到這時他還以爲重要的只是列強主人能否批准，至於人民態度到底如何，根本不必顧到。只要由他的籌安會活動一下，通過他的由上而下的官僚機構，還不就可以把所需要的全套『民意』製造出來了麼？但他沒有想到，儘管他的下屬能够爲他製造出一個全國一致擁戴袁皇帝的『民意』，但眞正的反對專制賣國統治的民意却因爲帝制陰謀的揭開而更加沸騰起來了，從這沸騰起來的民意中就會生長出致他死命的力量。

站在一旁等待機會的日本，在十月二十八日聯合英俄二國公使共同向袁政府提出口頭詢問。日本詢問的原文內容說：

中國帝制進行，其國內表面雖似無大反對，但以日本政府所得報告，其反對暗潮之烈，實出人意料之外。……日本政府…乃決定…詢問中國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穩達到帝制之目的……

對於這種友好的詢問，袁政府便由外交次長曹汝霖以忠僕的姿態稟覆說：

政府前曾電詢各省官吏，能否確保治安？各省並無地方不靖之報告，現在各省均加意防範，凡中國法權不及之處，倘要各友邦協力取締，必無發生亂事之餘地。……

到了十二月十五日，袁世凱已承認行帝制後，日本公使忽然又聯合英俄法意諸公使再到袁政府外交部，由日本公使發言說：『以後日本及其他四國對於中國決採監視之態度。』㊇兩次表示都由日本爲首，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反袁的暗潮在中國國內已在高漲（這在不久後就爆發爲雲南起義）。第二，日本是在進行兩面的做法，如果袁失敗，他可以欺騙中國人民說他本未支持袁的帝制，使自己取得爲中國人民提拔新統治者的資格；反之如果袁能成功，則在列強的共同『監視』中日本也可取得支配地位，把袁放在自己掌握中，因爲這時歐戰已進行了一年半，西方列強是更少實際力量加於遠東了。

美國政府也被日本邀請共同對袁政府責問，但未參加，這自然因爲美國不願追隨日本之後的緣故。當時的美國公使芮恩思在後來出版的『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一書記述道，當袁世凱被『選舉』做皇帝後，『俄國和法國公使已私下表示可以承認，……大多數在北京的外國代表都有意在一月一日（民國五年）正式公佈時承認這新的秩序』。但這時候，雲南起義突然爆發，袁政府只得把登極

的日期延緩。芮恩思書中批評這個延期決定是『錯誤』，他說，『假如袁和他的部下在這時敢於大胆地公佈帝制，那麼列強中有好些國家的承認是可能跟着而來的』。㊈——言外之意，對袁政府突然表現出踟躕懦弱之態不勝其惋惜。

這期間，英國人在中國辦的報紙上也有明白說出『外國人』是願意支持袁世凱集中權力的，但如果他因用欺騙手段而帝制自爲，以致衆叛親離，危亡在卽，那麼旁人也就愛莫能助，不勝遺憾了。例如上海字林西報說：『袁氏之得以鞏固其地位者，多賴外人精神上財政上之助力。……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權力以造福於國家也。今日以帝制而改良時局，……恐時局反因此而愈惡！』京津泰晤士報則說：『今日者則吾人渴望中國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竟如此，吾人對於袁氏，……能勿致其惓惜耶！』㊉——陳伯達在『竊國大盜袁世凱』一文中說得對，『帝國主義對於袁氏的必然沒落，是這樣「三嘆有餘哀」的！』

這時袁世凱確是處於狼狽萬狀之境。雲南起義的護國軍力量雖不很大，本身也有弱點，但配合了全國人民中的反袁空氣，顯得聲勢十分浩大。日本的做法既似乎是在和他搗亂，歐美的『好主人』也有愛莫能助之苦。只有美國方面在四月七日借了五百萬金元，給他打一針續命針，但已無濟於事了。在他自己的統治機構內部，受着這種情勢的影響，也發生動搖分化。據說，在雲南起義初起時，有外國人探問袁政府情形如何，袁政府回答說：『滇事僅少數人主持，該省兵力有限，六個月內當可敉平。』袁世凱還想叫帝國主義主人放心，繼續信任他，不料不到六個月後，已是他自己的死期。三月二十一日他宣佈取消帝制，這就是自行宣佈了失敗。縱然不是死得那樣快（五年六月六日死），他的政治上的崩潰也已是確定無可逃的了。

帝國主義列強曾經以為袁世凱是個『強的人』，比滿清政權更強更有用。但是結果證明他甚至還不能像滿清政權那樣較久地苟延殘喘，其在臨危時的手足無措的情形甚至也更甚於滿清。這卻並不真是表明袁政權不如滿清政權，而是因為

人民的覺悟程度已經今勝於昔了。而且帝國主義之要選擇『強的人』是爲了他可以更放胆地賣國，但愈放胆地賣國就不能不引起人民中的更大的仇視和反抗，於是這『強的人』也就終於不能不變成弱的人。日本帝國主義者這一次較早地看出了袁政權實質上並不強而是弱，他似乎是比別的列強較爲聰敏，但他以爲他捨棄了袁以後就能找出比袁更強，而對日本又更有用的人來，他就還是陷入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永遠不可避免的同樣的錯誤中間。

也許有人還以爲，袁世凱之所以慘敗，只是因爲他『不幸』而揀了那一個西方列強不可能給他充分援助的時候做皇帝。固然，如果列強再給他更多的援助，他可能再多苟活一些時，但是貫串在全部中國史的一個基本規律是不會動搖的：——反動的統治者只能因外力的援助而顯得一時的『強』，但在既暴露了賣國的原形之後，就必然遇到更高地覺悟了的人民反抗，那麽雖有帝國主義援助也還是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㊀『袁大總統書牘彙編』卷首，頁二九—三一。

㈡ 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卷下頁 六一—六七。

㈢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頁七二三。

㈣ Wheeler,Chinaand World War pp.5—6

㈤ 白蕉：『中華民國與袁世凱』，頁一六八—一七二。

㈥ 同㈣pp.191—196

㈦ 陶菊隱：『六君子傳』，頁二〇四。

㈧ 同㈤頁二九三，二九七，二九八。

㈨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pp 753 75

㈩ 同㈤頁二三一，二三四。



第五章 『強』的人 下（一九一一——一九一九）

一 不清不楚的關係

袁世凱的崩潰，在中國近代史上又一次證明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到底是不能夠自由地支配中國的命運的。

但反袁的革命鬥爭，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却又重複了辛亥革命的舊轍。因爲在這時，仍舊像孫中山檢討辛亥革命時所說的一樣，沒有一個『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就是說，仍沒有一個號召與團結廣大人民明確地爲反帝反封建的目標而奮鬥的政黨。中國的廣大人民雖然因爲已有了清末和辛亥革命的經驗，很快就識出袁世凱這個竊國大盜的原形，不再對他存什麼幻想，而且十分地厭棄他，許多地方的農民和小市民羣衆自發地參加了反袁鬥爭；但是

從人民中還時還不可能產生所要的堅強的領導力量；因爲貧產階級仍舊很軟弱不敢領導人民大衆求解放的鬥爭，而無產階級也還沒有壯大到足以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孫中山固然已在民國二年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跑到日本去重組中華革命黨，以發動反袁的鬥爭，但是其組織既很狹窄，其行動也只是單純的軍事冒險，在政治主張上，反袁的意旨雖很堅決，也還沒有觸及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在民國五年初，孫中山回國，所發表的宣言固然已不像在民國二年時只說『袁氏若存，國將不保』，而且說『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爲畢事，討賊美舉，當視其職志究竟如何，其所表示尊重者爲何，其策諸方來與建設根本者爲何，而後乃有犧牲代價之可言。』㊀這種看法比同時討袁的其他政治集團較進一步。但既然『討袁』不能以去掉一個袁世凱爲滿足，那就一定要深入到根本消滅產生袁世凱的基礎才行，也就一定要深入到根本掃除封建統治的社會秩序並且推翻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才行；對於這，中山先生當時是還不能明確地把握到的。以反對帝國主義這一點

來說，到後來在民國十三年時　孫中山說過這樣的話：『這種力量（即指帝國主義援助軍閥的力量），向來沒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還不能成功。』㊁可見他在民國五年討袁之役中也還不知道要『打破這種力量』。至於那時候在廣東、山東、湖南、上海各地揭着國民黨或中華革命黨旗幟而從事軍事行動的人物，有些甚至還遠不及孫中山當時所已經達到的水準。在這樣情形下，反袁鬥爭的中心落到了雲南和廣西，　如同陳伯達所指出的，『雖則一方面，反袁的運動有極廣泛的統一戰線，但另方面，反袁鬥爭卻缺乏人民革命的主流。運動是廣泛的，卻仍是自發的多。梁啓超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力爭反袁的領導權。』㊂

雲南護國軍於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組織軍政府，以在袁政府下原任雲南都督的唐繼堯爲領袖。貴州護軍使劉存厚，廣西都督陸榮廷相繼響應，到了五年五月，這三省加上廣東軍閥龍濟光，合組『護國軍軍務院』，唐

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撫軍副長。岑這人是滿清時代的官僚，在庚子事變時保衞太后和皇帝逃出北京，以此受太后賞識，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郵傳部尚書，民國時代爲袁世凱所壓抑不能得志，這時又乘機參加討袁，爲軍務院撫軍副長而攝行撫軍長職。此外，浙江、陝西、四川的「獨立」也無不都是由當地原有的軍閥官僚，搖身一變即成爲護國英雄。護國運動的政治上的靈魂是梁啓超。梁啓超在滿清末年是反對民主革命的保皇黨健將，辛亥革命中是擁戴袁世凱而扼殺革命發展的君主立憲派的思想領導者，他所領導的進步黨更一直都是以討好袁世凱，分取殘羹冷炙爲能事。但袁世凱在厲行獨裁中，不但不要國民黨，連進步黨也一脚踢出去了。於是這個梁啓超，很聰敏地看出了袁世凱一行帝制，必然不能久存，就機警地搶先一着，團結一批西南的軍閥，準備來搶袁世凱的天下。

固然我們不能否認，護國軍的發動是反映了當時人民對於袁的憎恨和反抗，所以得到了相當廣泛的人民的參加和支持，其領導人物中也有忠貞可敬的英雄；但是其主要領袖既然只是如上述的這樣一些人，所以護國政府的表現甚至還比不

上辛亥革命時的南京政府。而且我們還要指出，這批軍閥官僚政客之所以敢於發動討袁，和日本帝國主義當時對袁政府的陰謀不是沒有關係的。日本有一個後藤新平男爵（寺內內閣時任外務大臣），在事後著有『日支衝突之眞象』一書，其中指出，『政府（日本政府）……遂出擾亂支那全國之策，捲起支那各地抗袁運動，……凡上海民黨奪取軍艦，山東起事，雲南舉兵，及今回滿洲事件之發生，無非我國（日本）間接直接左右於其間。』[49]這說法固然有誇大之處，但並非毫無事實根據。梁啓超自己也曾在無意中於一篇記述他從事『護國運動』的經歷中透露出他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他是民國五年三月在日本人的幫助下由上海設法潛入廣西的，他如此記述：

三月初一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來謁，亦既有所聞，持以相質。吾告以實，遂乘勢託以代籌旅途，蓋逆料此行之艱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屬官松井者負其責。翌日，松井報命，言既與東京香港往復商定，囑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輪之橫濱丸至香港，更乘妙也山丸入越南之海防。……（當梁啓超按照這計劃到達香港後，）日本駐粵武官，駐港領事，郵船會社三井洋行兩支店長皆來謁，備極殷勤。……（因為弄不到去安南的護照，只好偷渡海防，）偷渡之事，今全託諸

日人矣。而日人之所規畫，倍復纖悉周備，每日以十數人通力合作，全神貫注，所以將護者惟力是視，蓋受之於彼政府也。㊄

梁啓超就是這樣地到達廣西，進入『護國運動』的大本營的。當他過安南時，曾在一個奉了日本政府命令招待他的日本商人的農莊中潛伏了十天，這篇文章就在這時所寫，所以老實說出了這些事實，但在他後來的文章就從不提到了。

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要這樣做？上節所引黑龍會文件已可使我們懂得。但是如果以爲一切反袁運動僅因日本的策動而發生，那就是帝國主義者狂妄的想法。事實上，很清楚，是因爲存在着廣大人民反對袁世凱統治的形勢，於是帝國主義也想來投一機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也想來投一機了。帝國主義所願意和可能利用的正是這些從統治階層中分化出來的改良派；而站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物，縱然在自稱爲革命者的時候，也終究是脫不開和帝國主義之間的不清不楚的關係的。他們兩方面相互配合，其目的並不只是爲了覆滅袁政權，而且是爲了在袁政權覆滅的過程中阻塞人民革命的主流。

雲南護國軍政府成立時，發表對外宣言，其口氣和辛亥革命時的南京政府也完全一樣。

：：袁氏對外政策，慣行欺詐，以致中國在世界各國國際間，威信全喪失。事勢至此，國亡乃不可免，此友邦所引以為憂者。然袁氏不知悔過，：：一方威壓人民，一方欺騙友邦。：：吾人誠懇希望各友邦同情吾人之苦衷，承認吾人之主旨，尊重吾人之正當行動。茲謹宣布天下，在此討伐大逆獨夫宣言揭佈之日——即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以前，所有與各友邦締結之一切條約，概行完全有效。在本軍管轄地方以內，所有友邦人民之生命、財產、商務，我會完全負保護責任，並履行一切條約上之義務。㊄

對於這一個文件，我們不說別的，只指出一點，袁世凱簽字承認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件是在民國四年五月，只在護國軍宣言揭佈前七個月。當時全國人民普遍認為這樣的賣國條約是人民所決不承認的，但現在的護國軍政府卻宣佈這也屬於『完全有效』的條約之內了。牠竟不敢說，袁政府的『對外政策』是賣國政策，卻說那是『欺騙友邦』的政策，牠也就不敢否認袁政府對外所締結的一切賣

國條約了。照這樣的宣言看下去，倒好像是護國軍政府將要實行一切已締結的條約，比『慣行欺詐』的袁政府更加忠實了。

而護國軍政府也和民國元年的南京政府遭逢到類似的命運。日本帝國主義固然要製造一個忠實的僕人，但還要求他有足夠『強』的武力以『安定』中國。護國軍政府一面向日本帝國主義拉關係——五年五月『軍務院』成立後，梁啓超由廣西到上海，他後來自己只含糊地說：『兩廣局面既略定，余乃復出上海欲爲他方面之活動。』㊆但當時軍務院中的副都參謀李根源却有一個電報說出他此次出行的動機：『任公爲外交及借款事，於昨日啓行經滬赴日本。』㊇——一面又和袁世凱部下的兩員大將，馮國璋和段祺瑞攀交情。馮國璋和段祺瑞也自有他們自己的打算，他們想學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時的手段，乘機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裏。尤其是段祺瑞，早已和日本帝國主義間通好關節，日本帝國主義在段祺瑞身上看到承繼了袁世凱的最合理想的人。因爲袁的遺產——北洋軍權是段所能控制的。而其他列强對於這個袁世凱的嫡系繼承人也不致於反對。袁世凱一死，段祺瑞登

台。護國政府落了一個空。既然牠本來沒有什麼遠大的革命目的，也就只好在向段政府取得了若干『軍費』後自行結束了。其中有些軍閥官僚便暫時安於一省一區的割據，等待下一個機會，而像梁啓超那樣的政客便急不及待地又投向段『總理』的門下去了。

袁世凱死後，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實際的權力在段的手裏。護國軍既已取消，北京的軍閥政府就又『統一』了中國。段祺瑞的朝代代替了袁世凱的朝代。帝國主義雖失掉了那一個工具，但又得到了這一個工具。

歸根結底說起來，袁世凱的失敗還是失敗於中國人民已不能容忍專制賣國政府的存在。但當時的民意通過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客的陰謀而又一次地被歪曲和利用，所以袁世凱死了，中國人民仍繼續在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勢力的宰割和統治下面。那麼所謂『人民的勝利』的全部內容只能是如此麼？真正屬於人民自已的道路到底還是找不出的嗎？

就在段祺瑞取得政權後三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了。中國人民的道路的確是艱難的。從辛亥以後到『五四』之間的這幾年間的歷史就足以說明這種艱難曲折的道路。但是每一個曲折都使人民的覺醒提高一層，一切的苦難都使人民的力量多受一次鍛鍊。五四運動的起來並不是偶然的，牠是拿以前的歷史為準備的。經過辛亥革命，經過袁世凱的統治，經過反袁世凱的鬥爭，又經過段祺瑞政府的時期，然後才出現了五四運動，這表現着中國人民的覺醒已到了新的峯頭，如同辛亥革命對晚清時期的人民覺醒過程而言是一個峯頭一樣，人民的覺醒過程就是這樣地從一個峯頭又爬上一更高的峯頭。如果五四以前中國政治舞台，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都是帝國主義及其所利用的工具在進進出出的唱戲，人民的力量幾乎只是不被人重視的潛流；那麼我們應該看出，就在段祺瑞更加無恥賣國的統治下面，人民革命的主流已經開始有『脫穎而出』的趨勢了。

㊀『總理全集』卷上『宣言』頁二二一——二二二。

㊁同註㊀卷下『關於內政外交之演講』頁六三。

(三) 陳伯達：『竊國大盜袁世凱』（丘引社版）頁六六。

(四) 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下冊頁七九。

(五) 梁啓超：『從軍日記』，見左舜生編『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下冊，頁五三六——五三九。

(六) 『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大同學會編）卷三頁一四九——一五〇

(七) 梁啓超：『國體戰爭躬歷談』（見左編『資料續編』下冊頁五三二）

(八) 『軍務院考實』（兩廣都司令部參謀廳編）卷四頁七二。

二　段祺瑞和日本

段祺瑞在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已爲袁的忠實部下。辛亥革命時出力助袁登台，在袁當大總統後，歷屆內閣中陸軍總長一席多由段担任。但因兵權漸集中在他身上而遭袁所忌，自民國四年底起只得退職閒居。其情形幾乎完全和袁在清末時一樣。到了袁遭遇困難而取消帝制後又不得不請段出山，初任爲參謀總長，繼請他組織責任內閣。於是袁一死，政權就落到段的身上。段的統治自然還是李鴻章、袁世凱的一脈相傳。雖然段沒有當總統，只是任國務總理，有時連國務總理的職務都不担任，但北京政府實際上是在他的勢力支配下，直到民國九年七月。後來在民國十三年後他又一度『東山再起』。

段祺瑞也是和袁世凱一樣，被帝國主義列强捧做『强』的人的——甚至比袁世凱更『强』。美國記者惠勒（Wheeler）在民國六年二月的一個通訊中舉出了

各種事實來比較黎元洪•段祺瑞的政府和袁世凱政府，他說：『根據許多有經驗的外國人判斷，……現在的政府是更强的。』惠勒的通訊又引用了在北京的英國記者卜笛南威爾（Putnam Weale）所下的判斷：『黎元洪總統這七個月來平穩地行使職權，足以表明，在袁世凱的所謂鐵的統治下還遠未能達到的最後成功，到了現在是近得多了。』㊀由此可見西方列强對這個新政府是十分欣賞的。

但是在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很和諧的，民國六年春更在是否參加歐戰的問題上關係破裂，黎元洪藉國會的援助企圖排擠堅主參戰的段祺瑞，段則挾北洋系的軍閥實力來對抗。於是軍閥張勛擁兵入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國會，繼則推翻黎元洪而請出滿清小皇帝來一幕『復辟』的滑稽劇。這本是段祺瑞預聞的陰謀，他是要借此來趕跑和他鬧彆扭的黎元洪，並取消不完全聽他話的國會；然後他又以『討逆』名義，逐出張勛，取消『復辟』，使自己成爲『再造民國』的功臣，而把政權更集中到自己手裏。他的計劃成功了（這是民國六年七月的事），另一個北洋軍閥馮國璋做了總統，他自己仍以國務總理的身分總

攬大權。

日本帝國主義是把段祺瑞勢力當做自己的囊中物的。因爲西方列强這時都捲入歐洲大戰中，無暇東顧；日本便全力培植段祺瑞來達到獨霸中國的目的。段祺瑞勢力也就完全投靠到日本帝國主義懷裏，公開賣國，換取實力支持，實行『武力統一』。這種情形到了民國七年十月歐戰結束時才開始改變。所以在民國六、七年間，也就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前兩年間，中國幾乎完全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在他羽翼下的段系軍閥的天下。

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兩年間乘歐戰方酣之際，把段派勢力一手控制，獨力宰割中國，其手段實在狠毒到極點。日本這時的寺內內閣爲了進行對於段政權的『投資』，先把台灣、朝鮮、興業三銀行擴張其機能，並特別設立銀行團，使在政府指揮下工作；另外又設立『中華匯業銀行』，以中日合辦的名義，用中國親日派官僚陸宗輿當總裁。經過這套機構，從民國六年下半年後就開始向段祺瑞內閣進

行貸款，先後訂立的借款契約共達五萬萬日元以上。款額雖大，而日本所得到的代價更大。

段祺瑞對日本的借款有各種各樣的名義，也就是段祺瑞把中國的各種各樣的權利零碎拍賣給日本。有的是把和當時中國國庫密切相關的銀行（交通銀行）出賣，有的是把滿蒙的鐵路礦產森林出賣，有的是以運河收入，印花稅和常關稅收爲抵押，有的是把全國的有線電信，無線電信全部拍賣。又有一次借款是以段政府承認日本在山東的特權爲條件。日本希望能在歐戰結束後承繼德國在山東的地位，並加以擴大，取得青島港口和膠濟鐵路的駐兵權和管理權；段政府只要拿得到借款，什麼也不顧，立刻由駐日公使作「欣然同意」的答覆。後來這句話在巴黎和會中被日本舉爲口實，特別引起愛國人民對賣國賊的痛恨。還有兩次，叫做「軍械借款」，日本交付軍械以代現款，其時中國正在內戰不已，這種「借款」自然是直接爲了幫助段祺瑞打仗，當時還祕而不宣，怕引起反對。更有所謂「參戰借款」，名義上是給中國訓練軍隊，參加歐戰，實際上也還是爲了內戰。

由此可見，段祺瑞的賣國確是又勝於袁世凱。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中本來包含着控制中國的軍警權的要求，但袁世凱那時還不敢一口允諾。現在在段祺瑞手裏，日本只輕輕地用二千萬元的『參戰借款』做代價，就取得了直接派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的權利。所以當時段祺瑞的政敵批評說：

最足異者，該軍隊（指段祺瑞的『參戰軍』，爲段武力之中堅——引者）用日本軍官教練，僱日本軍官教練之下士論，聞達數百名之多。夫國軍而用多數外國軍官訓練，獨立國家罕此先例，儼保護國、殖民地當然。㊁

此外，這時在北京政府中又陸續增聘了好些重要的日本『顧問』，如『財政顧問』坂谷，『政治顧問』有賀，『軍事顧問』青木。所以日本的內閣總理寺內下台後曾自誇說：

大隈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却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雖三倍於從前之數 但其實際上扶植日本對中國的權利何止什倍於二十一條。㊂

原來帝國主義在中國扶持一個反動統治勢力，雖然化錢，然而是一本萬利的賣買！

因爲俄國發生革命（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列强企圖武裝干涉俄國革命，日本發現這又是他的好機會到了，便以共同從事俄國境內的戰爭爲名義和段政府談判，結果在民國七年五月分別訂立了『中日兩國陸軍防敵協約』和同樣名稱的海軍協約。如果字面上的規定可以相信，這兩個軍事協約未嘗不可算是『平等互惠條約』，因爲那裏面旣說是『關於共同軍事行動，兩國之地位與利害，相互尊重其平等之見地』，又具體規定兩國『協同派遣軍隊』，兩國軍事機關『互派』職員，兵器與軍需品也『相互』供給，地圖情報『互相』交換。但實際上自然是日本軍隊以『共同作戰』爲名『合法』地開進中國境內，控制了全部滿洲，並控制了中國的軍事機構。中國方面則對於前來『合作』的佔領軍給以充分的方便和供養。段祺瑞政府爲了要換來借欵與軍事援助，不但簽訂了這樣的條約，甚至還派了一些軍隊追隨日本軍之後，由日本的大谷將軍指揮着進入了西伯利亞。那簡直就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屬下的殖民地軍隊。後來事實證明俄國革命干涉不了時，日本軍隊只得撤出西伯利亞，但滿洲從此落在日

本武力控制之下。這就是段祺瑞跟着帝國主義反蘇的結果。

但段祺瑞自己是躊躇滿志的。在日本幫助下編練的『參戰軍』，是他的武力資本；源源不絕的日本借款又使他能夠收買許多官僚政客，組成一個所謂『安福俱樂部』的集團，是他的政治資本。此外號稱『新交通系』『舊交通系』『研究系』的許多財閥、政客、名流也紛紛簇擁在他周圍。——所謂『研究系』就是袁世凱時代的進步黨的化身，梁啓超仍爲其領袖，梁氏在民國六年後出任段內閣的財政部長，還親手和日本訂立了幾筆賣國借款。當時梁啓超及別的研究系要人參加內閣，分担賣國責任，分肥賣國贓欵，還說是和段系勢力共組『聯合內閣』，其墮落的程度是驚人的。

段祺瑞勢力的擴大不免引起某些地方軍閥的不滿。在西南各省的曾經揭起反袁護國大旗而被冷落在一旁的軍閥，是最爲反感了。一到民國六年張勳『復辟』的怪劇後，段祺瑞不再召開國會，西南的軍閥們抓到了做文章的題目。雲南都督

唐繼堯首先通電，提出『護法』口號，主張舊國會應該召開，『以維法統』。兩廣四川紛起響應，宣告自主。不容於段祺瑞的國會議員擧趨廣州，組織軍政府，擁戴孫中山當『大元帥』。孫中山在討袁時旣已認定去袁之後不能容許與袁同樣的勢力再起，自然反對段祺瑞政府，但是他這次參加『護法政府』，在野心的軍閥和失意的官僚包圍下，並不能行使他的革命主張。所以到民國七年五月他只能辭去大元帥，離粵赴滬。軍政府改組，老官僚岑春煊成爲領袖。中山先生到上海後，曾說他任大元帥職的情形是：『艱難支撑一年之久，孑然無助，徒爲親厚所痛，仇讎所快。』[52]這正是因爲那些號稱『護法』的軍閥官僚都不過借此向北方政府搶利益，根本談不到革命；甚至據說他們也向日本帝國主義接洽借款[53]，更顯得是和北政府一丘之貉。段祺瑞旣自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寵兒，也就不把這個西南護法政府放在眼裏。他不理睬什麼恢復國會的主張，却在七年八月另行組成了一個完全由安福俱樂部所控制的新國會（所謂安福國會），並且堅決用兵『討伐』南方的『護法』政府，公開宣揚其所謂『武力統一政策』。所以民國六、七

年間南北戰爭連綿不絕，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應該負最大責任的。

到了歐戰結束時（民國七年十月），段祺瑞勢力仍如日中天，十分顯赫。他既已有了他御用的『國會』，他的『參戰軍』也仍在大事招募擴充。十一月他辭去內閣總理職，以應付新的局勢，但他以『參戰軍督辦』的名義和實力仍能操縱一切。他和日本訂立的軍事協定本以歐戰結束前爲有效期，但於民國八年二月又雙方協約延長，這自然是日本和段祺瑞同樣需要的。

㊀ Wheeler, China and The World War

㊁ 岑春煊：『論段祺瑞禍國書』（引自『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卷下，頁一三五）

㊂ 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卷下，頁一三七。

㊃ 『總理全集』卷下，『函札』頁一七五。

㊄ Wheeler 書中說：民國六七年間的『南方政府領袖們，也不顧一切地向日本借錢，以支持其對北方的戰爭。顯然他們也把中國的某些富源做了抵押。』

三　日本美國間的鬥爭

日本這樣地獨佔中國，免不了惹起西方列強的忌視。但自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起已捲入帝國主義大戰中的各國都不可能和日本在遠東競爭。『同盟國』方面的德國在華權利，於大戰開始後不久即被日本奪去。『協約國』方面的英法各國眼見大戰不知何時可了，很想把中國拖入戰爭，好拿中國的人力物力塡塞戰爭的需要。所以在民國六年二、三月間，英國、俄國（革命前），法國，意大利都向日本表示支持他對山東的要求，作爲日本拉攏中國參戰的報酬。只有美國，參加歐戰最遲（一九一七年四月參戰），較有能力和日本抗衡。

自一九〇〇年以來，日美兩國間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日益凸出（第三章第五節），袁世凱時代我們也可看到日美間的暗鬥（第四章第四節）。日本帝國主義之能够獨力控制段祺瑞政權，也不是沒有經過一番鬥爭的。美國在民國五年有過

兩筆各五百萬金元的借款給中國的軍閥政府，上半年的一筆給垂危的袁世凱，下半年的一筆就是給段祺瑞。對於這個新起的軍閥政府，美國這時也曾費點氣力去拉攏。試讀美國公使芮恩思（Reinsch）對於段祺瑞的描寫：

> 雖然他確是荒唐，但是他的智慧，他的基本上的誠實和他總是掩護他的下屬而自行負責 這些特點都使這沉靜而不屈不撓的人成爲中國軍人中最光輝的領袖。他的興趣集中於訓練軍官。他不是政治家，討厭政治理論。他總是把事務交給下屬處理，他常被下屬引導到不見得是他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上去。由於這點，再加上他是十分固執，就是他的影響常致有害於他國家的原因。但是他的人格，簡樸，富於思考，以及當他讓他自己的天性引導他時的真實的智慧，仍使得他成爲中國最動人的人物中的一個。㊀

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專制統治者總是用這樣的口吻贊美不絕的。

美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對德國宣佈絕交，當即由他在中國的芮恩思公使和別的活動人員竭力影響北京政府，使他和美國採一致行動。在北京政府跟着美國而向德國宣佈絕交後，日本公使馬上提出抗議，說是日本贊成此事，但何以這等大事，不先和日本商量，『甚爲遺憾』。——這件事，在美國方面是看做一件外交

勝利的。到了北京政府終於『參加』帝國主義戰爭後，日美雙方還爭着說是自己努力的結果。民國六年七月張勛『復辟』後，段祺瑞再入北京時，日本，美國，英國同時派兵到北京，這都是日美爭奪對中國的政治支配權所演的插曲。

但無論如何，歐洲戰爭牽制了美國，尤其在他自己參戰以後，更難充分顧到遠東。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後，美國的反動派更覺得用日本力量來干涉和破壞這個新生的革命國家是必要的。於是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一月日美間成立一個『藍辛石井協約』，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權益』，而以日本不否認美國對中國的權利爲交換條件。所以民國七年日本拉着段政府訂立中日軍事協定，同時達到加強對華控制和干涉俄國革命這兩個目的，是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列強的縱容和默許之下進行的。由此可見，日本與美國間，有時固因爭奪中國的權益而衝突，有時仍可以爲了某種原因，以犧牲中國的權益來求得相互協調。

一九一八年歐戰已近尾聲時，得勝的『協約國』列強，在規劃戰後的世界秩

序時，自然忘不了中國這個龐大的半殖民地國家，尤其是在大戰中損失最少，獲利最大的美國，最爲積極。他的第一步做法就是在這一年五六月間組織了美國銀行三十六家（後來又加上七家）在政府指揮下準備從事對華投資。七月十日，美國政府又向日英法三國提議合組對華的國際銀行團。我們還記得，民國初年本有六國銀行團，那也是由美國最初倡議的，但因他中途退出，成爲五國銀行團（英日法俄德）。歐戰使五國銀行團渙散，日本在財政上獨霸中國，現在美國出來創議恢復國際銀行團，正是藉其雄厚的財力來爭取領導地位。並且美國的建議中明白主張，參加銀團的各國都得把在中國的全部借款與優先權轉讓給財團共有，這更是向日本警告，把你所得到的吐出來，讓咱們大家『利益均霑』吧。

除了財政力量，這時美國又巧妙地運用他的欺騙的政治資本。原來美國在參戰時，高唱着『民族自決』的口號，確實在中國博得不少好感。他又很致力於拉攏中國官僚政客中的所謂『自由份子』以傳播親美空氣。北京政府一面固受日本控制，一面也還要向美國結下點交情。南方護法政府中的要人也有向美國頻送秋

波的。那時的某些親美論調，至今看來，也還不能不令人肉麻。例如：

一、伍廷芳（張勛復辟爲段內閣的外交總長，繼爲南方護法政府中的要角）在民國六年七月說：『我希望看到星條旗和中國的五色旗在永恆的友誼中交叉着的日子會到來。』

二、同年，顧維鈞（這時當着北京政府的駐美大使）在紐約演說中以過去中美關係的歷史當做中國對外關係上的最好的模範，他說向來在中美間，『都是以正義爲基礎而相互接觸，所以始終能保持親熱的關係和完全的理解。』

三、王正廷（國會議員，參加護法政府）在民國六年八月的一個演說中，公開向美國要求『政治上的』『財政上的』以及工業技術上的援助。他引用美國人密勒（T. F. Millard）的一段話，密勒說的是美國應積極對中國起作用，『如果這會是近於干涉中國的政治，那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責任。』王正廷說，他對密勒的說法『完全同意』。㊂

被王正廷所引用的密勒就是上海的英文『密勒氏評論報』的創辦人。那時他

在他的刊物上，鼓吹着美國對於俄國和中國的『民主化』都該負有責任，他說：『美國政府已經採取行動以鼓勵和支持俄國了，對於中國之努力維持民主，用什麼行動來支持和鼓勵，也應該趕快設計和執行才好。』㊂那時，美國是怎樣『支援』俄國的『民主化』的呢？原來就是千方百計地和其他列強配合着武裝干涉俄國革命，支持白黨的『將軍』們。美國又怎樣支援中國的『民主化』呢，如上所說，原來他已開始經營，準備在歐戰後到中國來和日本爭霸權了。

帝國主義者又懂得，僅僅靠一些官僚政客是不够的，非有『強』的實力派做代理人不可。段祺瑞既已完全落在日本掌握下，那麼西方列強不得不另行設法培植『強』的人不可。南方的護法政府還不够資格蒙受殊遇。如同袁世凱之接替李鴻章，段祺瑞之接替袁世凱一樣，帝國主義總希望從既成的『正統』實力派——北洋軍閥系統中找尋其代理人的。而在這時，北洋軍閥系統中間已開始發生了裂痕。段祺瑞與馮國璋間已很不協調，民國七年段祺瑞組成其『安福國會』後，甚至另『選』了一個老官僚——徐世昌做大總統，而把馮國璋趕下台去。屬於馮國

璟系統的曹錕，吳佩孚等的軍閥勢力便漸漸和段祺瑞唱起不同的調子來。在軍閥集團內部因分贓不勻而發生分裂，本是必然的現象；但這一次分裂的尖銳顯出恰恰在美國於歐戰後加強對中國侵略，在中國尋找新的代理人的時候，那並不是偶然的。以後我們將看到，屬於馮國璋系統的所謂「直系」軍閥正是西方列強所運用的工具，以與日本所利用的段祺瑞系統相抗衡。

既然美國在這各方面都已有了相當的準備，所以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初開幕的巴黎和會中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就成爲日美間互相「攤牌」的一個回合。但是在這時候，雙方誰也沒有力量絕對地壓倒誰，所以結果成了雙方各作若干讓步的一次「分贓」。這種情形既預示着日美間爲中國而作的更激烈的鬥爭還在後面，同時又直接激出了中國人民中的「五四」大運動——中國人民開始走上新的覺醒和新的行動。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五四」運動發生時，中國民族是正面對着

、極可怕的命運。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在中國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美國和其他列強又重振旗鼓，急起直追。他們都將以全力來進行對中國的壓迫、分割和獨佔，而且他們在中國已經培養好了和繼續培養着許多老練的代理人，死死地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他們之間，或者是激烈地火併下去，或者是分贓式的相互協調，都一定是拿中國民族做犧牲品。

但我們必須看出，像這樣性質的危機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並不能算是第一次；但是出現於中國人民已經有準備的時候，却是前所未有過的。

㊀ MacNe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 p.820

㊁ 這幾段話分見 Wheeler, China and The World War p.79, p.151, p.173,

㊂ 同㊁p.101

四　人民主流的出現

民國四年到六年（一九一五年到一七年）之間，由歐洲戰爭的原故，中國民族工業，如紡織、麵粉、絲繭、火柴等輕工業得到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機會，因此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發展了，而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同時有了更快的發展（因爲還加上日本設立的工廠的工人）。這就使得中國人民的運動有了較爲堅實的社會基礎。有了民主主義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這時在數量上和認識水準上都不是辛亥革命時的知識分子所能比擬的了。他們成爲中國人民羣衆政治認識程度的進步前嚮。這幾年間，受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的刺激，更從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相互結合統治中國的事實得到了更多的教訓，中國人民的民主愛國運動就漸漸湧起了新的高潮，終於爆發爲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民國六、七年間，雖然沒有突出的民衆運動，但是有許多跡象已可說明人民的政治認識程度在這期間已經不僅

在量上，而且在質上提高，已經在羣趨於找求人民自己的出路。這些正是五四運動的準備，也就是說，有了這樣的基礎，五四運動不能不爆發。

段祺瑞開始上台時，已經不像袁世凱那樣的還能在人民中一時造成對他的幻想。沒有人敢說：『中國非段不可。』到了民國六年初，爲了是否要參加歐戰問題已引起了民間的風波。固然當時雖較進步的知識分子也看不出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但是段祺瑞派的勢力竭力把中國拖到向來都是協同侵凌中國的列强的混戰中去，自不能不引起社會輿論的反對。內幕漸漸散佈出來，原來段派軍閥之所以這樣熱心，因爲要借此向日本借債，並有和日本訂立內容極可怕的軍事協定的消息。於是段祺瑞的真面目立刻在人民面前揭露了。五月十二日，留日學生罷課回國，組救國團，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陳友仁在北京所辦的英文『京報』五月十八日發表社論，題爲『出賣中國』，公開指斥段政府，陳友仁被捕，報紙被封。二十一日北京大學及各學校學生全體到總統府請願廢止中日軍事協定，全國各地商

民紛起響應。時勢的發展對於人民的教育作用可以從當時『新青年』雜誌的態度的變化中看出來。三四月間陳獨秀還在『新青年』上贊成參戰，甚至爲段祺瑞辯護，說『段氏在舊勢力人物中尙屬最廉正者』，㊀但在六月一日的該雜誌上，他已不得不承認他的意見的錯誤，『不料朝野兩方面，均屬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意在政爭，假外交爲手段，以國家爲孤注。嗚呼，何其大胆妄爲無愛國心一至此哉！』㊀人民中的激烈抗議，是段祺瑞的賣國的軍事協定沒有能在民國六年訂立而拖遲了一年才簽字的原因。

段祺瑞的企圖失敗了。他本以爲對外參戰可以掩蔽他暗中完成賣國獨裁的佈置。這陰謀的失敗不料竟如此的快。民國七年三月和日本訂立的軍事協定和各種借款成立以後，都祕不聲張，惟恐洩漏。可是風聲已經外傳，全國輿論和民間團體都紛紛抗議，指軍事協定的內容比袁世凱所接受的二十一條更加厲害。——所以在日段互相勾結的過程中，中國人民的反日反段的空氣也在增漲。

但這期間，中國人民，還不只是看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而且對於包括美帝國主義在內的西方列强也漸漸能認清了面目。

北京政府參加了『協約國』方面，也跟着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後面大喊起『公理』，『正義』，『人道』等等。但一班人民却很難相信這些宣傳。首先日本就是『協約國』中的一員，其次屬於協約國方面的各國，過去都對於中國有過血腥侵略的罪惡的紀錄，再則最新鮮不過的教訓是當北京政府和各國商量參戰時，還提出『修改關稅』、『庚子賠款延期償還』；『修改辛丑條約中關於平津駐軍的規定』等點作爲參戰的交換條件，不料這些極其溫和的條件全被拒絕。這時字林西報甚至說：

此庚子條約爲懲戒華人使不忘拳匪之亂，決不可寬；卽欲稍慰中國人心，也只能在參戰之後，酌量寬其末節。㊂

軍閥政府雖不敢計較帝國主義者的蠻橫與侮辱，仍甘願做帝國主義戰爭的小卒，而人民却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的認識。

在這期間最富於欺騙能力的還是美帝國主義的謊言。但是，民國六年十一月『藍辛石井協約』的成立，便把謊言揭破了。這甚至是出於當時的有許多親美派的意料之外的：美國竟公然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利益』，——但是我們還得承認，直到歐戰結束時，美帝國主義的欺騙影響，在一般中國人民中，尤其在知識分子中，還是很深的。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的威爾遜總統宣佈其堂堂皇皇的和平條件十四條，民主自由，民族自決，應有盡有。所以到了次年年初，巴黎和會在美國主持下舉行時，中國人中確是有很多人抱着天真的幻想，以爲這個列強是根據『正義』而把獨立自由『交還』給中國了。在人民的督促和鼓勵下，北京政府派去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提出『廢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警』『關稅自由』和取消袁世凱政府所承認的『二十一條』等主張。但是這些提議根本沒有能提到大會中間，因爲先送到美英日法意五國最高會議中時，就已被打回來了，說是這些問題都不在和會範圍之內。碰了一鼻子灰後，中國代表就只敢提出德國戰前在山

東的特權問題，要求把它直接交還中國。但是連這要求都被拒絕了。日本說，中國政府已經答應把山東權利讓給我了，如若不信，有「欣然同意」的覆文爲據。英法意說，我們都已在戰時和日本有約在先，要支持他對山東的要求，此時不便「失信」。美國就說，既是如此，我也沒有辦法了。

這樣，美國及協約國列強狼狽爲奸的面貌，就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了。和約中關於山東問題的條款完全照日本的意思寫定，列強更壓迫中國簽字承認，慣於賣國的北京軍閥政府也主張還是簽字爲妙。這時北京政府有一個「通電」給各省說：

> 政府若曲徇輿情，固不妨拒絕簽字，然熟權利害，如不簽字，則此後挽救維艱。……倘有不肖之徒，藉端煽惑，務希悉力制止，用遏亂萌。[2]

在這情形下，如果不是爆發了愛國青年的五四大運動，如果沒有人民羣衆進行鬥爭，反對賣國政府，反對帝國主義的分贓和約，那麼，又一張賣身文件的簽訂是一定的。

如所週知，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的政治、文化和革命運動的歷史上是具有重大的劃時期的意義的。就我們這裏所討論的問題來看，可以說：如果在五四運動以前，帝國主義者總是簡單地以爲，在中國最『强』的人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閥頭子，只要找到這樣的强的人加以支持和支配，就可以爲所欲爲了，而經過五四運動，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雖然仍舊進行其找尋和援助『强的人』的方針，但他們已經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的確是一個相當重的砝碼了。

五四運動雖是由巴黎和會而引起，但拒絕簽字的問題不過是個直接的動因。如果不是在五四以前，新的歷史條件已經使中國人民力量的組合顯出新的情況，而且殘酷的現實又已使極多數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與軍閥統治者有了較深切認識，那麽五四運動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的『爆發』是不可能設想的。所以五四愛國運動決非突發事件，在其醞釀的時期，用不着最明銳的眼睛也已能看出

來了。民國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有一篇瀏履恭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說法說出他對於時代變化的跡象的預感：

七年以來的民國是沒有人民的民國，因爲人民沒有聲息，沒有動靜，沒有對執政者說，『我們在這裏看着你了』。……現在七年將盡，轉瞬就是新歲，我們人民豈不可以跳到政治舞台上各人都發揮政治的生命或有組織的活動，使八歲的民國變成人民的國家，民治的國家呢？㉞

是的，五四運動表現着，中國人民已經大喊大叫地站出來，向他們的統治者說：『我們在這裏看着你了』，——不僅是向軍閥統治者說，而且是向帝國主義者說。雖然中國人民向來是和外國侵略者對立的，但帝國主義及其中國的代理人與說客也已在中國人民中間努力造成了對帝國主義的恐懼和幻想的心理，打破這種懼怕和幻想的呼聲也是在五四運動以前已經有勇敢的先驅者喊出來了。民國七年十一月的『新青年』中，李大釗有一篇爲世界戰爭結束和俄國革命成功而寫的文章。由他當時的認識水準上寫了下面的話：

我們對於這番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爲那一國那些國裏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爲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爲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爲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

會主義把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引者）打倒而慶祝。㈥

新的時代是非來不可了。雖然到這時中國人民仍還有艱難的前途在前面，但是已經能夠帶着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而向前邁進了。

㈠ 新青年三卷一期

㈡ 新青年三卷四期

㈢ 錄孫中山：『中國問題之眞解決』所引，見『總理全集』下卷『論著』頁六一。

㈣ 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卷下頁一九二。

㈤ 新青年五卷六期

㈥ 新青年五卷五期



第六章　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一九——二五）

一　「五四」後的反日運動（一九一九——二一）

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四運動六週年時，有人指出，五四運動是『分割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為前後兩時期的運動』。他在總結了五四時期的羣衆運動成就後，歸結說：

> 五四運動一方面反對賣國親日的官僚和軍閥——安福系曹章陸等，以革命的羣衆的直接行動驅逐賣國反動派，別方面很明顯的提出廢除二十一條收回青島等要求。於是便把辛亥以來反動派與革命派爭相『保障外人之生命財產，尊重條約權利』，而求帝國主義者之援助的局面更變了。㊀

指出這點是很重要的。『反動派與革命派爭相……求帝國主義的援助者之局面』，我們在辛亥革命與反袁世凱的鬥爭中都可看得很清楚，（見第四章第一節和第五

章第一節）；經過五四運動，這種局面確是被打破了：中國人民的覺醒與團結進入新的階段，在中國政治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廣泛的波瀾。上引的評論者說那一段話時（一九二五年五月）正是這波瀾湧上最高潮的當兒，一直發展到一九二七年的四五月才發生歷史的轉折。所以我們可以把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年看做一整個時期，人民的覺悟與團結力量不斷地向上發展構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的主線。這中間，按照人民運動發展成熟的程度又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九二一年底香港海員罷工以前爲第一階段，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以前爲第二階段，在本章中只能討論到這兩個階段，跟着這兩個階段後，就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北伐大革命了。

讓我們先來說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的羣衆愛國運動的初步展開。

五四運動是怎麼回事呢？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三千餘人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拒絕承認巴黎和會中的山東條款，要求懲辦賣國賊。而

且他們自己實施了人民的膺懲，趙家樓的曹汝霖（外交總長）住宅被燒，章宗祥（駐日本公使）被羣衆毆打。有十幾個學生在示威行動中給北京政府所逮捕。北京古城內的這一天的行動立刻普泛到全國，而且由此開始了一連串的行動。原來當時的政治情況是這樣的：國內的南北和會雖給許多人以一種希望，但事實表明那不過是在帝國主義導演下的南北大小軍閥的分贓會議；國際的巴黎和會也曾使許多人寄以幻想，但事實也表明，和會在討論到有關中國的問題時不過是以中國爲犧牲品的列強間的分贓會議。這兩方面的失望使中國人民墮入苦悶中間：到底靠什麼呢？怎麼辦呢？北京學生的行動給了一個榜樣：對，就是應該這樣幹！既不能靠軍閥，也不能靠帝國主義，只有靠人民自己，人民自己幹起來。

北京學生在五四的行動後，即宣佈總罷課，繼續抗議。六月三日又作大規模的街頭宣傳，被捕者千餘人。立刻在全國各地起了響應：不僅有學生，而且有工人、商人。從天津到廣州，從上海到成都，到處捲起了抵制日貨和反對巴黎和會的運動。人民抱着新鮮的感覺進入這運動，他們知道，他們是面對着過去幾年間

侵略中國最猛烈的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也是面對着賣國的軍閥政府而鬥爭。天津和上海的商人都曾一度罷市，上海有六七萬工人罷工，京滬鐵路工人也罷工響應，京奉鐵路的唐山和京漢鐵路的長辛店工人舉行示威游行，各地學生聯合會相繼組成，並組成全國學聯會，會同工商界組織，共同推動愛國運動。上海罷市的幾天內，革命的學生和商人居然自行行使警權。而工人中這時雖還沒有健全的新式工會，但以其原有的會黨式的組織竟也活潑地參加了鬥爭。在全國範圍內以抵制日貨爲主要表現形式的羣衆愛國運動一直繼續了有三年之久。

愛國羣衆運動表現得如此的勇猛壯大，使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都不由不大吃一驚。北京政府稱學生運動是『學閥操縱，學匪干政』，而嘉獎被羣衆辱罵的曹章陸是『體國公忠』『有裨大局』。日本政府督促北京當局乖乖地在和約上面簽字，並命令他從速鎮壓抵制日貨運動。主人的話固然不敢違拗，但這時的軍閥官僚集團對於如何對付羣衆運動，經驗還不多，顯得十分狼狽。終於北京政府不得不叫『體國公忠』的曹章陸三人辭職（六月十日），總統徐世昌甚至也提出了辭

職書（六月十一日），說是：

我國於和約萬不可不簽字。奈國內輿論，全國反對，國民暗於外交事情，實深遺憾。然共和國不宜大逆民意，進退兩難，此辭職第一原因也。……㊂

總統雖沒有真的辭職，內閣總理錢能訓却在這情形下嚇跑了。北京政府在突然崛起的人民力量前的手忙脚亂，於此可見。六月二十八日是巴黎和會簽約的日子。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因爲其中多數是親英美派，又因爲害怕在自己頭上永戴上賣國賊的帽子，所以就不顧北京政府怎樣決策，自行拒絕了簽字。人民愛國運動表面上算是得了暫時的成功。

但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自然不肯讓人民真的勝利。七月，北京政府宣佈拒簽和約經過，同時下令禁止抵制日貨運動。這個命令更激怒了人民。抵制日貨運動遂以提倡國貨的名義而繼續展開。日本帝國主義看到北京政府無用，便自行施用武力，十一月發生了福州慘案。在福州日本領事館的策劃下，便衣的日本浪人實

行有組織的暴動，殺死愛國運動的學生多人，並派軍艦到福州示威，登陸游行。這一事件更使全國的民情激昂。而北京政府名爲和日本進行交涉，實際上是曲徇日本的要求而把這事件拖延了下來。到了次一年的十一月這案件竟以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顏惠慶致日本公使的一件內容如下的照會而結束：

查福州地方，上年五月以來，人民因誤會而發生排貨風潮，雖經地方官取締，而有時仍不無軼出範圍暴動，以致貴國商民受其損害。茲爲兩國親善起見，本國政府實爲惋惜。(三)

這種奴才的口吻怎麼能叫已經覺悟了的人民忍受得下去？

福州慘案發生後一個多月，北京政府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一月二日又一次下令禁止抵制日貨，接着，日本就向北京外交部提議兩國間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在這情形下，所謂直接交涉，不外乎就是中國方面直接投降。所以民衆運動又一次高漲。上海平津各地的工商學界團體召集『國民大會』，進行更堅決的反日運動。北京政府在二月六日又有通令各省區當局的電文說：

近以山東問題，群言龐雜，在京則有糾衆阻斷交通之舉，在滬則有要挾停納賦稅之通電，凡此

行為，動擾法紀，極其所至，適使秩序不保，外侮乘之，使國家（應該說是使軍閥官僚的政府——引者）益陷於困難之境……希就近曉諭各公共團體以及地方各界，俾知以國家為重，靜鎮勿擾，以俟政府之籌劃。籌劃既定，想必有以昭示國人。設有不逞之徒，利用時機，希圖擾亂，各軍民長官有維持治安之責，應即遵照迭次明令，分別制止逮懲，勿稍弛縱貽誤。[三]

於是北京的『學生聯合會』和『國民大會』首先被軍警解散。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宣佈總罷課，五月六日上海的法國總領事竟因北京政府的請求而封閉設於法租界內的學聯會和各界聯合會。帝國主義與軍閥政府共同壓制人民運動是十分清楚了，但這也仍不能阻止人民的愛國行動。北京政府這時既不敢斷然拒絕日本的提議，也不敢公然實行『直接交涉』，親日派的內閣總理靳雲鵬為此而不得已辭職。經過再三躊躇，北京政府終於在五月二十二日發出了一個措辭溫和的覆牒給日本，說是『未便與貴國開議』。

由以上所述，可見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的這兩次愛國大運動（其實是一貫

相聯的）都得到了一些成功，但是這成功自然仍是極有限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們仍舊統治着中國，而美國與英國在這期間也在擴大加深着他們在中國的勢力和政治支配地位。但是這兩年間人民的鬥爭確已建立下鞏固的基礎預示着必有更大的開展。

固然，愛國的羣衆運動在滿清末年已經萌芽了，以經濟絕交來反抗侵略者也不始於這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早在一九〇五年，已經有過抵制美貨運動。但這時期的愛國運動不只在規模上絕非前所能比，而且在性質上也有着前此所絕不能有的特點。這就是，通過這時期的愛國運動，我們可以看到勞工運動的發展。在五四運動開始時，工人羣衆雖還是以配角的地位參加，但很快的，他就成爲獨立的力量，而在反帝的愛國運動中居於最堅決的崗位。工會組織漸漸在各地出現，在一九二〇年，我們已看到粵漢鐵路南段和隴海鐵路工人的罷工，一九二一年，上海，廣州（香港），漢口各地以及南北各重要鐵路線的工人運動都漸活躍，所以到了一九二一年底就爆發香港工人的大罷工。與工人運動的發展同時，社會主義

思想也在這時期開始在中國生根。五四運動同時又是個新文化運動，是民主主義的新文化與羣衆相結合的開始。新文化一與在鬥爭中的人民大衆相結合，社會主義的思潮就通過少數先進的知識分子而傳揚開去了。社會主義思想幫助了人民羣衆認識中國社會與中國政治，於是帝國主義與紳商買辦的哄騙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容易叫中國人民上當了。有了工人運動，有了社會主義思想，共產黨的組織也就有了產生的基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同時，我們不能不說到十月革命的影響。俄國人民的大翻身既助長了中國人民自求解放的意念，而新興的蘇俄又向中國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主張，這更激動了長久在列強侵略壓迫下的中國人民。一九二〇年四月北京政府收到俄國革命政府在前一年七月發出的通牒，要求建立邦交，重訂平等新約，並聲明取消帝俄時代在中國以侵略手段取得的一切權益，不再享受領事裁判權，也放棄庚子賠款。說來可笑，這時帝俄政府早已消滅了，但帝俄政府的公使還在北京，繼續享受着一切不平等條約上的特權，北京政府且仍按期照付給他庚子賠款。及至收到

了蘇俄政府的通牒，居然置之不理，說是要和列强採取共同態度以對俄，甚至還追電否認蘇俄政府的通牒。一九二〇年九月，蘇俄再度發出通牒，重申前議，並派全權代表優林（Yourin）到北京。北京政府這時發現別國多已取消帝俄時代的俄國使節的待遇，才向駐中國的帝俄公使通知他已不能代表俄國，但所用的理由却是「比年以來，俄國戰團林立，黨派紛爭，統一民意政府迄未組成。」⑬這種說法顯然表示北京政府是不準備承認蘇俄政府的。這時列强還從旁干涉，甚至主張俄國的一切權益都該歸各國共同代管。結果，北京政府雖在形式上收回俄租界和對俄國僑民的司法權，實際上仍聘用原有帝俄政府外交警務等人員担任各種有關職務。

革命後蘇俄的正義立場，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蘇建立邦交的阻撓，北京軍閥的追隨帝國主義的卑劣態度，這些在當時人民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到了一九二二年蘇俄再派代表來華的時候，建立中蘇邦交便成爲羣衆鬥爭中的主要口號之一。那正是中國人民反帝思想更高發展的表現。這讓我們留到下面再去

識到。

㈠ 嚮導週報一一三期。

㈡ 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卷下頁一九五。

㈢ 同㈡頁二一八。

㈣ 『梁燕孫年譜』卷下頁七四。

㈤ 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頁二八七。

二　新四國銀團和華盛頓會議

上節所說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的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爲直接對象，給了日本帝國主義和他的中國代理人以嚴重的打擊，這是因爲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歐戰結束後對中國的侵略行動還正在醞釀佈置，一時還不十分顯著的緣故。

歐戰快結束時，美國已準備憑藉優越的金融勢力以侵入中國，和日本決一高下，其第一着做法就是建議成立新的四國銀行團，這在前一章中已提到了。美國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向英法日三國提出邀請書。美國提議的內容是要由銀行團來壟斷中國的一切政治借款與經濟借款，而且參加銀行團各國所已得的各種借款優先權都須讓給四國銀行團。這樣的辦法是日本不願意完全接受的，因爲日本在滿蒙所已取得的獨占權絕不願意輕輕讓給列強共享。所以日本一面由官方表示參加，

一面通過『民間輿論』而表示反對。

一九一九年春，與巴黎和會同時，四國銀行團的籌備會議也在巴黎舉行，雖得到了初步的協議，但日本想使滿蒙劃在銀行團業務以外的企圖未能達到，所以還是繼續表示反對。於是在美英日三國政府間便爲這問題而進行正式交涉，你提一個覺書，他提一個照會，積下了一大堆檔案。歸結起來，所爭論的無非是：日本方面說：我在滿蒙有特殊利益，在藍辛石井協約中且已得到美國的承認，而且我之堅持在滿蒙地位，並非排斥你們，其實不過是爲防範俄國的『赤化勢力』而已。美國和英國方面則仍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做大題目，反對日本獨吞滿蒙；但也表示，既然你一定要堅持，事情總好商量，不妨再具體劃定滿蒙的那些鐵路（已修的和將修的）不屬於四國銀行團範圍之內。——這樣協商的結果，便由美國的銀行團代表雷蒙特（Lamont）到日本，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成立了協議。同年十月十五日這新四國銀行團（以別於滿清末年的四國銀行團）正式成立於紐約。

日本對結果很滿意。當時的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在議會中說：「英美法三國政府爲尊重日本的國防及經濟生存起見，已承認日本的特別地位」。㊀美國也很滿意，因爲在這新四國銀行團中美國無疑地已取得了領導的地位。在這時歐美帝國主義列强看來，利用日本來監視革命後的俄國，確是有利的事，所以他們也不想完全取消日本在中國的北方邊疆地區的特權，能夠略加限制也就可以滿意了。

美國組織新銀行團的作用和企圖究何在呢？美國公使芮恩施（P.S.Reinsch）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六月間向北京政府遞一備忘錄，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茲根據當時的中譯本節錄如下：

……新銀行團之組織，非欲以外人參預中國政務凌駕華官而操縱中國也。中國之統治權仍由中國人掌之。吾人深知中國人若處適當情勢之下，必能自理其財政鐵道及實業諸政，今惜情勢未當，故爲銀團計，爲中國政府及人民計，應即促成之也。（這就是說，現在中國的財政鐵道及實業諸政尙未能由中國人『自理』。——引者）

……嗣後政府借欵，無論其爲行政性質，或實業性質，其接洽與用途，皆應明白宣示。俾債權者得知其詳。此非干預之意，特爲中國利益計，自宜與債權者開誠相見，協商一切立信改良之方。

……新銀團以鞏固中政府為宗旨。蓋若中國國基穩固，百廢俱興，則各國之權益必較互爭勢力範圍為多。故該團成立以後，必以適當方法保護中政府，俾能實施其發展行政及經濟的新計劃，而免貽瓜分之禍。

……新銀團之作選將完全根據債權者並得保證之原理，非圖控制中國行政或置洋員於華官之上也。夫一國之最好担保品為其政治修明，故銀團應得預問之事有二：一為全國收支應完全公開，以昭大信，二為任官惟賢，並加以任事永久之保障。

……且銀團代表必須有查賬之權，察其收支與國家預算是否相符。設有官吏與官署不能將造國家預算或舞弊等情，應由中政府立即嚴究。……(三)

這個說明不能不使我們想到『此地無銀三十兩』的笑話。在表面上看來，口口聲聲說的是不要干預中國政治，不企圖控制中國行政；但其實不過是用轉一個灣的方式說出，這計劃就是：『中國的統治權雖仍由中國人掌之』，却由外國人來監督和實際負責，中國政府的一切財政收支均須向銀行團報告，任銀行團來查問，對於一切官員的任免，銀行團都有權過問、於是這樣的一個中國政府實際上就成為銀行團的代理人，對這樣的政府，銀行團自然是願意盡力使之『鞏固』並

加以『保護』。所以當時在中國對於銀行團就有人批評說：

> 美國……企圖組織新銀行團——國際帝國主義的托辣斯，想用經濟優勢壓力，盡量把資本輸入中國，以達到操奪中國的優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國經濟（並從而控制中國政治——引者）的主人翁。㊁

只是因為日美間的矛盾並未From即行減消，而且英美，法美之間也還存在着矛盾，所以四國銀行團雖已成立，却未能立即實施，美國大資本家的這個雄圖大略在當時也就還不能馬上實現。

如果拿來和一九四五至四七年時的美國在華地位來比較一下，當時的美國自然是遠不及此時的威風的。所以美國在完成了四國銀行團的組織時仍不能不感到苦悶。一九二一年初作為美國各銀行代表而來中國的史蒂芬（Stephen）說：

> 若美國單獨借款於中國，不特為日本所反對，且招英國之忌，而法國亦必隨英日之後而抵抗之，是美國必以勞與而讓步，故反不如英法日加入新銀行團共同投資之為癒也。……余此次担任代表職務來華，個深藏在華各國之同牀異夢，未嘗不因此而深自競惕，以冀無愧余職守也。

既然是『同牀異夢』，自然就仍舊有相互的競爭了。尤其在日美之間，為中國利益的爭奪在這幾年間是相當激烈的。

例如在四國銀團籌組期間，美國人貝克（Earl Baker ——任北京政府的交通部鐵道會計顧問）在一九一九年提出過一個『美日英法中五國共同管理中國鐵道計劃書』，想把所有中國已成和將築好的鐵路，不論是中國自有的，還是某一個外國所控制的，都一起變成五國共同管理。對這計劃，英國方面也很熱心，但是因為日本堅決反對，終於沒有能成功。又例如在四國銀行團成立後，一九二一年一月美國的福特爾電報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和北京政府訂立了『無線電台借款契約』由這公司承辦建設上海北平廣州漢口哈爾濱五處的無線電台，並在十年內有管理這些電台之權。英國與日本方面都表示抗議，尤其日本最強硬，因為他已先和北京政府訂過類似的契約。美國政府雖出面支持福特爾公司，也沒有能得勝，只好把這問題不了了之地拖延下去。

在這情形下，美國就從兩個方面來努力以求壓倒日本。一方面在列強的國際

關係上，一方面在中國的內部政治上。

在國際關係方面，因爲英日同盟條約在一九二一年期滿，日本雖想續訂，但英國已表示躊躇，美國努力設法廢除條約，想拉攏英國和別的歐洲列强來共同加壓力於日本，對他在遠東勢力給以某種限制；因此，美國便在英國的同意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發起舉行一個『軍縮會議』，兼討論遠東與太平洋問題（即通常所謂華盛頓會議）。

至於在中國內政方面，日本已在歐戰期間扶植起了以段祺瑞爲首的親日派勢力，控制着北京政府，這顯然是日本的一個最有利的條件；所以日本在反對四國銀行團的組成時，北京政府也跟着反對；等到日美間已經協商妥當，北京政府也就閉口不響了。美國英國既然要加强在中國的勢力，自然也不放棄這一方面的努力。他們所選擇的支持對象是與段祺瑞的『皖系』軍閥相對立的所謂『直系』軍閥，曹琨吳佩孚就是直系的領袖。一九二〇年七月在這兩系軍閥間爆發了一次大戰（所謂直皖之戰），結果皖系大敗，段祺瑞及其安福系的政權被剝奪。所以在新

銀團成立時已是直系軍閥取得較大權力之時，這也正是美英勢力在中國的一個成功。但日本卻也並非完全失敗。因爲經過五四運動的浪潮，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也看出皖系勢力已太聲名狼藉，難以久存了，所以他又使用起他的另一個工具，就是在關外的軍閥張作霖（所謂『奉系』），在直皖之戰中，奉系軍閥採取了與直系軍閥一致的態度，共同推翻段祺瑞。所以在直皖之戰後，北京政府便成爲直奉二派勢力共同的贓物。親日派官僚仍能在奉系武力卵翼下活躍於北京政府中。當美國發起華盛頓會議時，吳佩孚正在美英支持下發展其勢力於長江流域上，而奉直兩系的暗鬥已日漸顯露了。

華盛頓會議的主要份子是美英日法意——第一次世界戰爭後的『五强』，所討論的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其實只是中國問題。中國也被邀出席。荷蘭，葡萄牙，比利時因爲也在中國保有帝國主義的權利，所以也是參加者。這會議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開幕，至一九二二年二月結束。我們既已知道了在華會前的英日美

三國之間的基本關係和在中國內部各軍閥集團間反映着國際關係而鬥爭與結合的情形，並且可知道華會的召開正是在『五四』後的中國人民覺醒與鬥爭開始昂揚之時，根據這樣的背景，我們對於這會議的結果就很容易瞭解了。

美國英國對於日本仍只是想加以適當的限制，而決不打算也不可能消除他作爲遠東一霸的資格。所以關於一般的軍縮問題上，在會議中就決定，美英日三國的海軍噸數限制爲五五三的比例。在美英看來，日本保有這樣大的海軍軍力，是足以鎮壓東方各民族的反帝國主義勢力而不至於爲害於美英兩國的了。日本看定了美英這種想法，所以故意處處留難要挾，使美英奈何他不得。會議未開始時，日本已聲明不願意在會議中討論『個別國家間的問題和既成的事實』，這樣就把中日之間的各種問題一筆勾銷，根本使其不可能在會中提出。美國英國對這也並不堅持。所以會議中關於中國問題便只限於所謂『原則』問題的討論。至於山東問題的懸案雖是勢非解決不可，也不擺在會中討論，而在大會以外由中日代表進行『直接交涉』，英美代表則出席『調解』。

對於沸騰着愛國運動的中國人民，美國是極想藉這個會議的機會來造成自己在中國人民中的『良好』印象的，在會議開始時，美國卽贊許北京政府的代表在會議中提出關於關稅自主，撤消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軍警，取消各國在華勢力範圍等等要求。這的確一時在中國人民中又造成虛幻的樂觀空氣，以爲美國這回眞是要大大幫助中國了。可是一看到會議的結果，原來這些問題都化成了些空洞的原則的決議，具體的解決辦法呢，都要等列強派員分別組織特別委員會『調查研究』了以後再說。這不過是給中國人民吃一個『空心湯糰』而已。

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最著名的決議就是所謂『九國公約』。對於這公約的締結，美國是最熱心的，所以全文中貫徹着的中心就是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所謂門戶開放，如我們在本書中已不止一次地分析到的，不過是列强共管中國的代名詞，又是美國想藉强大的經濟勢力來控制中國的煙幕。『九國公約』的內容是以明白的條文說出了這些。最妙的是在華盛頓會議中居然由中國代表第一個提出門戶開放的原則。第一次會議裏面中國代表卽提出所謂『十項原

則』，其中第二項就是

中國極贊同門戶開放，即所謂有約各國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故自願承認並實行此主義於中華民國各地方，無有例外。㊄

接着，美國代表盧特（Root）提出了『四原則』，經大會通過：

一、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

二、供給中國以完全的和無障礙的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而鞏固的政府；

三、運用各國的權勢，以求切實樹立和維持在全中國領土上各國的商工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四、不得利用中國現狀以求取特殊權利，而致減削各友邦臣民的權利，並不得獎助有害於各友邦安全的行動。㊅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北京政府所乞求的和美國政府所積極主催的就是把中國置於各國勢力的共管之下。繼盧特的四原則之後，美國代表休士（Hughes）又向大會提出關於中國門戶開放案，其中除了具體規定『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內容外，並且規定：

中國政府……表示願意在一切外國政府與國民，不論是否參加締結本約，請求經濟上的權利和

特權時，都按照這樣的原則來處理。㊆

結果，就以盧特的四原則和休士的門戶開放爲基礎形成了九國公約的條文。如果在華盛頓會議前，門戶開放還是列强——首先是美國，爲侵略中國的行動所用的漂亮裝飾，那麼現在變成是應中國政府的請求而在列强間的共同盟約了。

美國對這結果很滿意。爲了使日本肯簽字於九國公約不惜在各種具體問題上順從日本意志。日本既在具體問題上得到勝利，對這空洞原則的成立也就無可不可。美國以爲，九國公約的原則將使他今後「合法」地在中國充分發展勢力。日本也不覺得這樣的原則就會實際上妨礙他的行動，後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就老實不客氣地撕碎了這一紙公約。

所以在整個華盛頓會議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蠻橫地堅持其『既得權力』，美國竭力綏靖日本想把日本行動限制在不致妨害美國的範圍內，英國及其他國家既怕日本發脾氣，又附和美國。而中國在會議中的姿態則表現爲聽憑別人擺佈的可憐的存在，可恥的北京政府一面既已自甘於做帝國主義的奴才，一面又以自己

能『平等』地列席於列強會議上而十分得意。

於是也就很清楚，華盛頓會議並不眞能緩和日美間的矛盾，更不能使中國人民上當。因此華盛頓會議過後，我們就看到中國國內，各派系的軍閥以各帝國主義者爲背景而進行更猛烈的火併，同時中國人民反帝反軍閥的鬥爭也更向前發展了。

㊀ 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卷下頁二八〇。

㊁ 『梁燕孫年譜』卷下頁四四——四八。

㊂ 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一個文件。

㊃ 史蒂芬和交通系財閥梁士詒的談話，見梁年譜卷下頁一四二。

㊄ 同㊀ 頁三〇八。

㊅ ㊆M. J. Bau, The Open Door Doctrine in Relation to China, pp.221—222

三　吳佩孚和美國

如前所說，我們把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看做是五四運動後政治形勢發展的第一階段。到了一九二二年初，一方面我們已看到香港海員三萬人的大罷工，這表示着中國工人已經開始表現爲自覺的強大力量，走上中國人民的反帝革命鬥爭的前哨，爲一個新的局面行了揭幕的典禮。另一方面，在一九二二年初，我們又看到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只是各帝國主義之間關係的表面的協調和實際上的緊張，爲爭奪中國權益的互鬥正方興未艾。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直系與奉系軍閥大戰危機的迫切，這場大戰在一九二二年四月是爆發起來了。

因爲各帝國主義間的關係還保持着形式上的協調，所以不致一時發展爲直接的相互武裝衝突，又因爲牠們實質上仍是在激烈地互爭中國霸權，所以就各自在中國利用一個或幾個軍閥勢力，指使其互相搏鬥。段祺瑞的皖系勢力和張作霖的

奉系勢力都不外乎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人民對他們的面目已從事實上看得清楚；曹錕吳佩孚的直系勢力高喊着反對親日派賣國而登台，但事實表明他們也不過是美國與英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既已使人看出美國英國對於中國同樣抱着侵略的野心，什麼公道與正義不過是口頭上的標榜；現在直系軍閥登台後的表現更可使人看出，美英的代理人也和日本的代理人同樣的是賣國求榮，製造內戰和殘害人民。

我們在此不能不簡單追叙一下所謂直系軍閥的來歷。原來正如袁世凱繼李鴻章衣鉢，段祺瑞又接袁世凱的香火一樣，曹錕吳佩孚的直系勢力也還是一脈相傳的。袁世凱手下有二員大將，一是段祺瑞，一是馮國璋。袁死後，段掌握了北京政權，馮的實力則在長江流域。馮雖在一九一七到一八年間入京當了一年的大總統，但仍被段排擠了出來。馮段之間的爭權奪利也就形成了直皖二系的對立。段既成了日本的工具，而因爲馮的勢力在長江流域，便自然與英國較多接觸機會。

一九一八年底馮死，直系的領導地位便落到了曹錕吳佩孚手裏。曹在滿清末年就是袁世凱的部將，吳又是曹所提拔的得力幹部。正因爲這一個個的軍閥本來都是『一家人』，所以他們都以『北洋正統』自居；好像中華民國的招牌天生該歸他們這一『統』來包辦似的。又因爲由袁世凱傳下的北洋軍系統一直是代表着當時中國國內最強的兵力，遠非其他各省小軍閥的實力所可比，所以各帝國主義也就樂於從這裏面挑選合用的『人才』。

吳佩孚雖是曹錕的部下，在一九一九年時只是師長的職位，但他却是直系勢力的靈魂。他能狡猾地利用時機，欺騙人民，勾結帝國主義而比較不露出顯著痕跡，所以他的本領可說比北洋軍閥的前輩們較高一籌。在五四運動的風潮中，他看出段系勢力已成衆矢之的，又看出英美帝國主義的意向，他便大肆活動起來。左一個通電，右一個通電，說的是反對簽字和約（巴黎和約），取消中日密約，促成南北和談，甚至主張開國民大會以解决國事，『愛國』是他的口頭禪，甚至他還努力使人民相信他其實是個『革命者』。這些漂亮話一時使得不少人相信

這一個軍人確乎與別的軍閥不同。因此，到了一九二〇年的直皖之戰中，以吳的兵力爲骨幹的直系勢力一擧推翻了段祺瑞的親日派政權，國內的同情——尤其是在中上層社會中，的確都在吳佩孚一方面。這種情形使得與日本敵對的帝國主義者大喜過望，以爲他們這才找到合於他們的理想的眞正『英雄』了。英美報紙不惜用一切美好的頭銜來稱頌他，譬之爲『強者』，稱之爲『新中國的大英雄』。帝國主義者總想找出一個既能爲帝國主義利用又受人民擁戴的英雄來做中國的統治者。袁世凱，段祺瑞都失敗了，現在看來，這『理想』將能實現在吳佩孚身上了。所以孫中山曾說：

> 他（吳）推倒了段祺瑞之後，口頭上雖然以民黨自居，總是說北京政府腐敗，要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事，心理上還是想做袁世凱第二。外國人考查到了他這個假相，以爲可以利用，便以爲奇貨可居，事事便幫助他，自己從中取利。

這裏所說的外國人實際上就是美英帝國主義者。

但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戰後，如前面所說，直系勢力還不能獨自在北京當家。

而只得和以張作霖爲首的奉系軍閥共享權力。同時，浙江軍閥盧永祥屬於段祺瑞的系統也仍屹立不倒。此外還有散在各省的零星的小軍閥。吳佩孚在直皖戰後，便以洛陽爲大本營，開始實行其『武力統一』的政策。在一九二一年先佔陝西，佔湖北，進兵宜昌逼四川，所向無不利，更使他在英美主人眼中的地位提高。

奉直二系勢力同居於北京政府中，本已註定了會因分贓不勻而破裂，尤其在他們各自的後台老板利害衝突激烈時，更非發生火併不可。所以華盛頓會議剛結束後，一九二二年四月，奉直大戰就爆發了，結果奉系大敗，退到了關外，宣佈『東北自治』，北京政府這才成爲直系勢力獨自的贓物。

直系軍閥在取得了北京政權後，又繼續着做一番粉飾門面的事情，想以此博取人民的好感，也以此報效帝國主義主人。他們把安福國會的總統徐世昌趕跑，重開民元的國會，並請黎元洪坐上總統寶座，他們以爲這就算恢復了民國的『法統』，使政治走上軌道了。直系軍閥本來曾勾結了廣東的軍閥陳烱明，使他向孫

中山倒戈，及至中山被逼離粵赴滬後，直系軍閥已取得北政府大權，便又派員到上海和中山接洽，表示希望『孫吳合作』，其實是想借中山的聲望來加強其『統一政府』的威風。這時北京有一批『名流學者』（胡適等）提出什麼『好人政府』的主張，說是：『我們：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爲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㊂直系軍閥覺得這也是拿來粉飾門面的好玩意，於是列名於『好政府』主張的王寵惠（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已在袁世凱政府和奉系軍閥控制的政府中當過幾任內閣閣員）被請出來組織內閣，另兩個列名者——羅文幹、湯爾和也同時入閣，這樣在軍閥統治下居然出現了個『好人政府』。如果用英美報紙的說法，就是『自由主義』者已經被邀入政府中了。

但這一切不過是招牌。民元國會與『合法』總統黎元洪早已被人民所厭棄，『好人政府』也只是仰軍閥鼻息的官僚集團，『和平統一』更只是一句空話。直系軍閥當權後的做法仍是借外債，擴軍備，打內仗，壓人民。與袁、段政府並無二致。吳佩孚自己這時已不大說『好話』了，仍以洛陽爲大本營繼續在美國支持

下整兵黷武。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慘案，吳佩孚的兵力直接屠殺京漢路工人，暴露了他的兇狠的面目，同年三月，吳召開洛陽軍事會議，高揭起『武力統一』的旗幟；在洛陽的策動與指揮下，戰禍遍及於川湘閩粵各省。直系的最高領袖曹錕這時便想藉吳的武力而過一下大總統癮。六月，逐出了黎元洪，十月，大規模地施行對國會議員的賄賂，使自己『選』做了總統，而且還頒佈了一套『英美式民主』的『憲法』，同時爲要求列強『承認』他當總統，更畢露了媚外賣國的眞象。——於是直系統治的醜惡便使人覺得是和段祺瑞並無二致了。所以孫中山後來說：『吳佩孚以爲外國人都這樣幫助，天下還有甚麼事不能做；所以便越發大胆，用武力橫行於全國，弄得全國人民都是不能安居樂業。』㊂

這時列强競爭中國的局面中，英國是站在美國一邊，而法國則支持日本。直皖與奉直兩次戰爭中，日本勢力受了兩次大打擊。但日本仍繼續扶助奉天的張作霖和浙江的盧永祥，準備再向覇佔北京政府的直系軍人翻本。美國方面也就竭力加強直系的武力，加强他的政權，以阻止奉浙勢力。如果直系勢力能因美國支持

而『統一』中國，那麼美國自組織新銀行團以來的全部雄圖大略便不難實現了。

爲了實現『武力統一』政策，吳佩孚在軍火與財政上得到美方的幫助確很不少。例如在一九二三年，美國曾一次供給了三百萬美元的軍火，又經過美駐華公使介紹，美國商人和吳佩孚做了步槍一萬支，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二百五十架的交易，吳佩孚在洛陽有飛機隊和飛機機械廠，替他訓練和組設的是美國人博治亞等。此外，英國的英福公司曾和吳佩孚訂立了道濟借款一百五十萬鎊。江蘇督軍齊燮元是屬於直系勢力，也以疏導淮河的名義從美國得到了一筆借款。

曹錕想當總統已籌備多時，其所顧慮的不僅在內政問題。在軍閥官僚們心目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外國人態度如何。一九二三年五月，即賄選前五個月，美國駐華公使親赴保定和曹錕商談這問題。六月，美國哈丁總統表示美國銀行團可以幫助中國『統一』的意見。曹錕賄選告成，坐上寶座後，美國公使卽首先表示稱賀。這時正因五月初的臨城劫車案而發生外交糾紛。山東土匪孫美瑤洗劫津浦路的一次列車，綁架去乘客多人，其中有外國人十一名。各國公使便藉端要挾，提

出許多條件。甚至要求把津浦全線的警權交給外國人管。曹錕爲求得各國承認，便令顧維鈞與外交團磋商，除護路警權一項外，其餘全部接受。——（自袁世凱時代以來，歷任駐美公使的顧維鈞，在曹錕政府中是外交部長，更進而爲內閣總理。）

從袁世凱以來的北洋軍閥頭子，總以爲有了帝國主義『承認』，總統皇帝，即可爲所欲爲。但是一個中國政府的統治權決不可能建立在外國的容許下；人民覺悟越高的時候，一個依靠帝國主義的政府必越受到人民的唾棄。所以對於曹錕政府，孫中山這時就在廣州發出了一個致各國政府的宣言，義正詞嚴地指出：

> 中國人民全體，視曹錕之選舉爲僭竊叛逆之行爲，必予以抗拒而懲戒之……若列强果承認曹錕，則將延中國內亂與紛擾。……

果然，在曹錕賄選後一年，軍閥大混戰又起。這時江蘇雖在直系勢力支配下，但上海卻爲日本卵翼的浙江軍閥盧永祥所控制。這是英美和直系勢力都覺得

不能容忍的。所以一九二四年九月就發生江浙之戰，盧永祥兵敗逃到日本。但是奉天的張作霖卻又乘機侵入關內來和直系「爭天下」，於是發生第二次奉直之戰。雙方動員兵力爲過去內戰所無，這也正是日美間在中國的又一次大決鬥。在戰爭剛起時，「嚮導週刊」（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加以推斷說：

> 我們可以推定此次戰爭之結果：第一，直勝，則美國將扶助直系在中國政治統一的壓制，以成就美國在中國經濟的統一侵略。第二，直敗，則爲日本勢力結合安福奉張支配中國的政治經濟。我們對於前者固然深痛惡絕，對於後者又豈能歡迎！外力侵略斷送國家的慘痛都是有加無已，中國人民早已看出，美帝國主義支配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中國，其意義是完全一樣的。[33]

戰爭的實際結果雖不像這所說的簡單。但是由此可見美帝國主義的面目這時已在事實上暴露，爲中國人民所能識破。

戰爭的結果是，直系方面因馮玉祥「倒戈」而大敗，曹錕失去寶座，吳佩孚棄甲曳兵而逃。張作霖侵入華北，日本老工具段祺瑞又東山再起，重入北京，號爲「臨時執政」。馮玉祥則別樹旗幟，叫做「國民軍」，與奉皖勢力分庭抗禮，

同享勝利果實。但吳佩孚也還沒有完全垮台，他到了湖南省，雖然一時沒有什麼作爲，仍在暗中積蓄力量，準備再起，因爲他的後台老板仍舊對他寄以希望。如同孫中山所說的：

吳佩孚這次在山海關打敗仗以後，退到天津，本是窮途末路，國民軍本可一網打盡，戰爭本可以結束。但是有某國人對吳佩孚說：『長江是我們的勢力，如果你再退到那裏，我們幫助你還是很有希望，』所以吳佩孚才再退回長江。(八)

以上說的是自華盛頓會議後三年中（一九二二——二四）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衝突反映到中國國內各派軍閥間反覆混戰的情形。但這只是這三年間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關係的一方面。如果只看見這一方面，我們就會以爲，以各帝國主義爲後台的各派軍閥互相報復互爭雄長的內戰將循環不已，很難找到出路了。然而不，中國人民的鬥爭在這三年中又已大踏步跨前了一步，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和各派軍閥在第二次奉直之戰時，已開始帶着恐怖的面容警覺到新的局面：問題將已不只是在他們自己之間誰勝誰敗，而是在他們和中國人民之間誰勝誰敗了。

㈠「總理全集」，卷下演講頁六四。

㈡「胡適文存」二集卷三頁 七。

㈢「總理全集」卷下演講六五頁。

㈣「總理全集」卷下文電頁二七。

㈤「總理全集」卷下演講頁六二。

㈥「新導」八十二期。

四　五卅前的反帝運動（一九二二——二四）

在中國人民中，開始明確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鬥爭口號，作爲民主革命進軍的方向，是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也正是勞工運動空前發展的一年。

一九二二年年初，香港有六萬工人罷工，持久至八星期，終於取得勝利，達到了提高工資和建立海員工會的目的。由此就推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這一年間就有上海紗廠、漢陽鐵工廠、京漢鐵路、安源礦場的罷工，十一月唐山煤礦五萬工人發動罷工，這煤礦有英國資本的關係，英國卽以武力協同直系軍閥的軍警施行鎭壓。一九二三年初，平漢鐵路工人組織總工會，吳佩孚用武力制止集會，工人罷工抗議，吳佩孚得到了帝國主義者的支援而在漢口、長辛店、鄭州進行對工人的大屠殺，造成『二七慘案』。——這表示着，中國工人羣衆和帝國主義及其

所雇用的軍閥之間的鬥爭越來越緊張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北京數千學生工人舉行十月革命五週年紀念大會，高呼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中蘇聯盟，要求無條件承認蘇聯。湖南、湖北和山西學生亦有同樣行動。一九二三年的『二七』的大屠殺雖然使工人運動受了挫折，但是廣大人民的反帝反軍閥鬥爭仍在繼續醞釀與澎湃。一九二四年，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進入新的高潮。在直系軍閥統治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賣國賊的呼聲響遍全國。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北京學生聯合會等五十餘團體參加，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爲全國各地的工商學團體所一致喊出。八月，上海學生聯合會總會等三十餘團體組成廢約運動大同盟，也成立反帝大同盟，這時正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爆發的前夜。在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混戰的時候，人民已經起來『向帝國主義猛攻』。（這時的山東青州各界聯合會通電中語）

但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最初提出時，很有些紳士先生譏笑和反對。例如胡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寫文章說

我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們在上海出版的嚮導週報標出兩個大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第一項，我們自然是贊成的。對於第二項，我們覺得也應該包括在第一項之內。因為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我們很誠懇地奉勸我們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㊀

胡適的這種說法正是反映了自清末以來的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致命的弱點。對於這種弱點，中國人民這時已經能夠明確地給以批判了。蔡和森於一九二三年五月發表的一篇文章雖不是為了胡適而寫，但恰恰是針鋒相對的駁斥：

中國的革命領袖（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引者），常有許多謬誤觀念；第一，他們認不清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所以他們把中國的革命專門做成為一種解決『內政』的運動，他們以為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無須昌言反抗，只要內政肅清，强鄰自然改顏相向。第二，他們誤認革命為純粹的中國事業，與國際沒有關係；他們以為只須用一種政策阻止外國的干涉，中國革命便可成功，只須聲明『承認（或不侵犯）一切條約』，外國妨害革命的舉動便可避免。第三，他們常常夢想所謂『友邦』的幫助，換過說，即一派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幫助，雖然事實上常常證明這種夢想得不到什麼益處，但是他們心中總還保留這種想頭。㊁

清算了這種錯誤以後，中國人民勢必把革命運動朝向着廣大的遠景展開。事實已經很清楚，中國的民主問題不能不和民族獨立的問題聯在一起。妨害中國人民的民主獨立運動的是軍閥統治勢力，也就是站在牠背後的帝國主義勢力。反封建的任務也就不能不和反帝的任務連在一起。只有胡適這樣立場的人才是始終喃喃着說『不必牽涉到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廣大人民是已全心全力地向着這個明確的目標進軍了。

在一九二二到二四年間，以中國人民的反帝革命運動的高漲爲背景，有兩件大事在此必須提到：第一是中蘇邦交的建立；第二是國民黨的改組與國共合作。

前面已經提到（見本章第二節），在一九二〇年，皖系統治的北京政府兩次收到蘇俄政府的建議，都置之不理。一九二二年，直系軍閥上台後，蘇俄又派越飛（Joffe）到北京，受到北京二十一民衆團體的歡迎，却仍受到北京政府的冷遇。這時越飛又派代表到上海和孫中山接洽。北京的美日英法各國公使竟向北京

政府提出照會，說越飛在中國宣傳「過激主義」，應嚴厲監視其行動。

帝國主義竭力要抹煞蘇俄的存在，不願中蘇間建立邦交，尤其害怕中國人民與蘇俄的友誼加深。但是自一九一九年起，十四個國家（其中包括中國！）聯合武裝干涉蘇聯，繼續了兩年半之久，到一九二一年已完全失敗了。蘇聯工農政權能夠堅決地存在斷然是帝國主義所抹煞不了的事，蘇聯的成功對於東方各弱小民族起了巨大的激動和影響，也是帝國主義所抵制不了的事。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北京及各地羣衆紀念十月革命大會正是對阻撓中蘇邦交的一個抗議。

一九二三年九月蘇聯又派加拉罕至北京，再度宣言完全放棄帝俄時代的特權，與中國進行談判。北京政府不可能找到拒絕理由，至次年三月，談判已有了結果，在草定的協定中蘇俄方面承認無條件地取消治外法權，歸還租界，放棄庚子賠款及關稅平等。這是中國自與外國訂約以來從未見過的內容。但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策動下，北京政府忽然提出外蒙取消自治作爲中蘇訂約的條件，談判幾乎因此而決裂。各地輿論對北京政府的這種態度紛紛提出批評，北京學生且爲

此而舉行示威（三月二十九日），並到洛陽向吳佩孚『請願』（四月十日），吳佩孚向學生說：『讀書時代，不許干政』。在人民的壓力下，到五月三十一日中蘇協定終於正式簽定，爲中國外交史闢一新紀錄。

中蘇建立邦交後，帝國主義仍滿懷不高興，借各種事端阻撓。原來北京的各國使館集中東交民巷，那是辛丑條約所保障的一特殊區域。現在中蘇建立外交關係，帝俄使館自當移交給蘇俄新派來的大使（第一個與中國互派大使的國家是蘇俄）。但各國公使團却聯合向北京政府表示，公使團已有議決，在俄國未有爲各國所共同承認的政府以前，俄國使館當由各國共同保管，不能移交。——這種說法毫無根據，顯然是無理取鬧，使得中國人民更認清楚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我們要來簡單回溯一下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前文只提到孫中山在一九一八年因不能忍受再在廣州『護法』政府中和軍閥官僚合作而離粵赴滬。（見第四章第六節）一九二〇年陳炯明率軍入粵逐出岑春

煊等一班桂系軍閥，孫中山乃又入粵，於一九二一年建「非常政府」，任非常大總統。這時北方政府中正是直奉二系共同操政的時候。到一九二二年直系向奉系開火時，先已勾結了陳烱明，使他叛變孫中山。這一次孫中山幾乎喪命，只能再度到上海。

革命事業的屢遭頓挫並不能使孫中山灰心，使他深深考慮的是究竟走什麼路才能達到他所希望的中國革命的成功。建立「非常政府」的期間顯然已受了「五四」後的學生運動與羣衆運動的影響，所以這時廣州政府不禁阻勞工運動，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廢止壓迫罷工的條例，這自然是比軍閥的北京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進步得多。但這時廣州政府的實力基礎仍不是眞正擺在人民大衆身上，只是從桂系軍閥換成了陳烱明。陳烱明的叛亂給了孫中山以深深的刺激，並且他看出在陳背後不但有直系軍閥的搗亂，而且有帝國主義操縱的魔手。

一九二二年秋到一九二三年初孫中山在上海，這正是他的革命思想大大躍進的時候。因爲這時候，工人運動與民衆運動已捲起反帝反軍閥爭民主的浪潮，而

初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已提出建立反帝反軍閥的各階級『民主主義聯合戰線』的主張（見該黨二大宣言，一九二二年五月），並且這時候一方面直系軍閥的北京政府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賣國殘民的罪惡日益顯著，另一方面蘇俄代表正以平等互助精神來與中國人民建立友誼。所以孫中山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召集有共產黨領袖參加的會議商討改組國民黨的問題；一九二三年一月發表了國民黨宣言，明確規定民主主義的綱領，在這裏面第一次把『力圖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列為對外政策的基本項目。同時他又與蘇俄代表越飛進行協商，成立『孫文越飛協定』，為中蘇兩大國人民的友誼建立了一塊紀程碑。（這也刺激了北京政府使他不得不與蘇俄恢復邦交）——聯蘇、聯共、工農的三大政策在這時都已奠定。所以這一年的二月，因陳炯明又失敗而退出廣州，孫中山再回廣州後，便正式開始進行國民黨的改組。

因國共合作而改組後的國民黨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發表的宣言可說是把若干年來中國人民的覺醒與戰鬥作了一個總結。在這裏面

既總結了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利用以禍害中國的事實，且又比一九二三年的宣言更加明確地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向就是依靠「多數人民」的力量來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固然在國民黨改組後的廣州政府的內部與其實際行動仍包含着並不是不嚴重的弱點，但是因為已經能正確地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方向，所以廣州政府自然漸漸便成為全國人民大衆鬥爭力量的團結和發動的中心，也就成為帝國主義的眼中釘，各派軍閥勢力所必欲加以消除的障礙物了。

在第二次奉直之戰中，奉系軍閥為要推倒直系政權，騙取人民同情，所以向廣州政府表示合作；及直系倒後，盤據北京的段祺瑞和張作霖邀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事，其本意是想軟化他；孫中山果然北上了，但在他的北上宣言和沿途的演說中都勇敢而明白地說出了他的政治主張，使得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們聽了不能不發抖。我們這裏只節引「北上宣言」為例。

因爲在這一年，廣州政府曾宣布北伐，所以北上宣言一開始就如此申明他的主張：

> 本年九月十九日，本黨對於出師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義以爲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欲使中國永爲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其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

這個聲明已經確定他和段張之流的軍閥絕不能共存。於是他就進一步向那還想依靠帝國主義而壓迫人民的軍閥們警告說：

> 軍閥所挾持之武力得帝國主義之援助而增其數量，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然當其盛時，雖有帝國主義爲之羽翼，及其敗也，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求逞，軍閥亦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卒之未有不爲國民覺悟所屈服者。……

然後，在這宣言中就提出了一個中國革命中的不朽的偉大的『公式』：

吾人於此更可以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相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開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跡於國內，甚代之而與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㊂

孫中山北上後，三月十二日（一九二五年）病死於北京。但在他的最後的宣言中已經在直接召喚着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了。從孫中山的一生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也曾經在有些時候表現着對於帝國主義的幻想；而在那樣的時候，他就只能向封建軍閥舊勢力妥協，而並不能真正喚起廣大人民來從事堅決的革命鬥爭。但他終於能通過實踐打破了這幻想。他終於不顧一切地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對立了起來，並且明確地看出，只要真能依靠人民力量，帝國主義力量雖然强大，然而是不足懼的。——這正是孫中山的偉大處。

㊀「胡適文存」二集卷三，頁一二八。

㊁嚮導週報一十三期。

㊂「總理全集」卷上，宣言頁六五——六六。

五 恐嚇·收買

帝國主義在中國有兩個武器，——武力與財力。他們用這兩個武器支持他們的代理人，反動的軍閥統治者；也用這兩個武器壓迫中國的人民和阻撓中國的革命。

對於太平天國，對於義和團，帝國主義早就直接自己出面施行武力鎮壓了。由於不平等條約，外國列强的軍隊可以「合法」地駐屯在中國土地上，其兵艦可以在中國沿海與長江上自由巡弋。所以當中國的軍閥統治者壓制不了人民時，帝國主義者就可以極方便地隨時自行動武。

使用財力來壓迫中國革命，說得明白一點，就是用錢來收買革命陣營中的不穩定的參加者及其變節的領袖。自滿淸以來的反動政府造成了一個傳統，非靠外債不能解決財政問題。一個革命的政府如果不能堅決打破這傳統，依靠廣大人民

來自力更生，那就不免在帝國主義的金光眩目的財力的誘惑下屈服。辛亥革命的南京政府總不能說是被收買，也確是因帝國主義不借錢而嚇倒了的（見第四章第二節）。

憑着這兩套武器，帝國主義就自以爲可以在中國爲所欲爲，無往不利。

自五四運動以後，對於泛起的中國人民運動，帝國主義已曾多次直接使用武力來配合軍閥統治者的壓制。例如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日本帝國主義在福州造成慘案（本章第一節），一九二二年十月英帝國主義在唐山鎮壓罷工（本章第四節），一九二三年六月湖南又發生「六一慘案」，這時因爲湖南人堅持對日經濟絕交，日本的伏見艦水兵登陸開槍向羣衆射擊，死傷不少。

對於國共合作，帝國主義的破壞和阻撓也從未停止過。自從一九二三年孫中山領導執行三大政策，堅定反帝立場，使廣州成爲中國革命的中心地後，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干涉廣州政府，干涉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是更加顯著了。

在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廣州政府中，既包含着一些親日派的官僚，也有親英美的政客軍閥，所以在帝國主義眼光中，這還不是絕不能容許的東西。可是對於孫中山，帝國主義者從來都是不懷好心的。有一個曾在那時在中國的英國記者查門（H.O.Chapman）說：

孫博士有許多英國和美國的朋友與同情者，但他們無意於支持反抗北京政府的叛亂，因為北京政府是他們本國政府所承認的友好政府；而且他們中大多數把孫看做是個不實際的夢想家。㈠

孫中山曾經以為他的革命事業能夠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贊助，但結果他似乎找到了一些「朋友和同情者」，終於還是不能不失望。而且這些西方的「民主國家」甚至還在暗中搗他的亂，如拉鐵摩爾（O.Lattimore）說：

在這些困難年頭裡，孫中山雖被西方列強看做是不實際的夢想家，卻仍繼續他的工作。……革命運動時時受到阻礙，有時是孫中山被和他合作的某些軍閥所丟棄或全趕跑，這些軍閥總是在一到自己能掌握一支軍隊時就不再和他合作了；有時是外國的列強，為他的「搗亂」運動的生長而害怕，就開始來威脅和收買他的政治追隨者。㈡

陳炯明就是被收買來反叛孫中山的一個例子。當陳炯明已逐出孫中山後，他

還和英國訂立了七百萬鎊借款，以使廣九路和粵漢路銜接做條件。

到了一九二三年以後，帝國主義列强干涉孫中山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態度更加兇狠了。這一年的十二月『廣東政府扣留關餘』問題就是列强的一個示威行動。原來中國海關收入一向在外國稅務司的直接控制之下，其中除了直接用以支付『庚子賠款』及其他債務外，剩下來的才由洋稅務司交給北京政府。廣東政府自一九一七年成立後，也分得『關餘』的一部份（百分之十三・七）。列强之願意分予，不用說得，實在帶有收買性質……以中國自己的錢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實在是最合算不過的事。但現在，列强覺得，對於這一個越來越離他們的希望更遠的廣州政府，已不值得再給一個錢了，雖然這還是中國的錢。廣州政府要求北京各國公使團照支一部份關餘，被拒絕，便自行把廣州海關的收入扣下來。北京公使團竟向廣東政府提出抗議，說：

此種干涉海關之舉動，使團斷難承認，倘若竟然如此，當以相當之強硬手段對付。㊂

廣東政府答覆說：

中國海關始終爲中國國家機關，本政府轄境內各海關，自應遵守本政府命令。且關稅應交北京，不當資助其叛黨，以畢其侵略政策。……㉒

對於廣東政府的强硬表示，美國和英國立刻各派軍艦十七艘到廣州白鵝潭示威。這就激起了廣州羣衆的抗議，開羣衆大會，支持廣州政府的立場，並宣佈抵制美貨英貨。

在『關餘』問題中，帝國主義者同時施行了財政上和武力上的壓迫。一九二四年八月又發生『廣州商團』事件。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陰謀更進一層。

廣州商團是買辦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一個組織，其領袖就是滙豐銀行的買辦陳廉伯。他們先以『罷市』來威脅政府，繼之從事武裝的叛亂，想一舉而推翻革命政權。這一事件的背景完全是帝國主義所操縱。我們用孫中山的話來說明吧：

前幾個月英國人在香港的言論，大吹特吹，說陳廉伯是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發生，他們總是在新聞紙上挑戰，要商團打政府，說商團如果不打政府　政府便馬上實行共產。最近更助陳廉伯在香港發行兩百萬元的債票，由他們的銀行担保。㉓

過兩年來，有幾個英國人不喜歡國民黨，不願意國民黨的政府發展，更煽動陳廉伯，運動商團全體，在廣州內部反對國民黨的政府。……因爲他（陳廉伯）做滙豐銀行的買辦，所以那幾位反對國民黨的英國人便認識他，便日日運動他反對政府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便是中國的華盛頓。』……他於是反聽英國人的話，向外國另外辦軍火，想另外組織軍隊。他所辦的頭一批的軍火，是用一隻叫做哈佛的丹麥船，運進廣州。……[illegible]

但事情還不僅此。到了廣州政府採取堅決手段肅清『商團』的叛逆時，陳廉伯的後台老板竟然自己出面提出抗議。孫中山在『爲商團事件對外宣言』中說：

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總領事致公文於我政府，聲稱沙面領團『抗爭對一無防禦之城市開砲之野蠻舉動』，末段數語則無異宣戰，其文曰：『予現接上級英海軍軍官通告，謂彼已奉香港海軍總司令訓令，倘中國當局對城市開砲，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軍應立即行動』。……（此）實爲帝國主義瘋狂之一種表現。……(丙)

『商團』事件中帝國主義的陰謀，由於廣州政府中革命分子態度堅定並及時加以揭發，沒有能得到完全成功。但是如果以爲帝國主義的陰謀毫無成就，那也錯了：

儘管中山發表那樣堅决的宣言，儘管廣州反帝國主義聲浪那樣高，然而事實上廣州政府却伴着那篇宣言取消英帝國主義走狗——陳（陳廉伯、陳恭受）的通緝令，並發還其家產，決定退還英帝國主義工具商團的槍械，任買辦商人所擁護的李福林為市長，任商搭李朗如為公安局長，凡此種種簡直是向英帝國主義莫大的讓步。然而英帝國主義豈能因此便停止推翻中山政府的陰謀。……最近英國已由本國調來七隻軍艦，直泊廣州……以助長他的工具，軍閥與買辦階級的聲勢。……㊆

國民黨的改組與國共合作表示着民主聯合陣線（包括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成立，而以帝國主義為首的革命敵人努力要拆散這個聯合陣線。商團事件不僅是一小部分買辦武力的行動，因為策動這行動的是帝國主義，而支持這行動的還有一些參加廣州政府的地方軍閥與右派政客。所以當時已有人能够明確指出，這是『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僱傭軍閥及國民黨右派分子夥同宰割革命政府』的行動，並且指出這些右派分子『一面勾結軍閥，一面依附帝國主義。……商團謀叛幾乎完全由反革命的右派從中作祟，不過外人不大知道罷了。』㊇廣州政府中左右派的分化是內部的政治形勢的發展所促成，帝國主義從旁看到，不僅儘量加以利用，而且用恐嚇和收買的雙重手段來加以擴大。商團事件雖然在表面上平復下去

了，實際上，經過這一次試探的行動，帝國主義與右派的結合加強了。帝國主義看出了，他可以不只是從外面來打擊中國革命扶植舊的北洋軍閥勢力而達到摧毀革命的目的，而且可以從內面來分化革命的陣營，扶植混在革命中的右派勢力而同樣達到摧毀革命的目的。所以在一九二四年的商團事件之後，廣州政府內部的分化情形愈益顯著，在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北上和逝世後更加表面化。這裏就埋下了一九二七年的大分裂的根子。如果沒有一九二五年『五卅』大運動後人民大衆的反帝反軍閥鬥爭的空前高潮，革命形勢較早地摧折不是不可能的。

商團事件發生於一九二四年八月到十月。正和北方的第二次奉直之戰同時。前面已經說到，奉直之戰雖然還是反映美日間的帝國主義矛盾的軍閥火併，但是由於眼見中國人民革命勢力的膨脹，各帝國主義與各派軍閥之間已開始警覺到，最重要的事還不是他們自己內部的勝敗，而是如何共同去壓倒以排山倒海的力量而昂起的人民。奉直之戰的結果也很明白，日本工具段祺瑞、張作霖雖已出據北

京，但他們顯然並無能力「統一」中國：吳佩孚在美英護持下雖然失敗，但仍保有在長江流域的潛勢力，不難『東山再起』。帝國主義者們開始進行以中國人民爲共同目標的大團結運動了。

上海英國人辦的『字林西報』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已鼓吹對中國實行『懲罰戰爭』，並且說，如果別的國家不來參加，英美也當單獨進行。——對廣州政府的屢次武裝示威，顯然就是這種『懲罰戰爭』的嘗試。而且在四月間，列強在華使團已有祕密協商，建議各國政府在華聯合組織三個艦隊，分別置於遼東直魯沿海區、長江區和浙閩粵區這三個區域。對於這樣的步驟，美國表現得很積極。四月十五日，美國衆議院通過添造駐華炮艦六艘一案，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國上議院批准增加海陸軍備預算一萬一千萬美元，並且決定在長江再添巡洋艦八艘。八月間，美國國務卿休士（Hughes）到倫敦，列強間正式開始進行商議在對華政策上的協同合作。例如當時有這樣的消息散播在報章上：

倫敦電……倫敦與華盛頓間現在考慮列強採聯合的行動以恢復中國和平與秩序的問題。

倫敦電……某有力方面現提議，邀集中國戰爭各派勢力開和平會議，解決中國內政上的困難，並爲中　建設一『不集權的聯邦政府』。此次計劃希冀成一十分穩固的政府，俾銀行團得以投資中國。(九)

十一月間，美英法比日五國又在倫敦集會，討論『中國問題』。美國建議，把『道威斯計劃』推行於中國，那也就是帝國主義列強共管中國的資源與財政的計劃。前幾年曾一度轟傳的『共管中國鐵路』的計劃也再度提出來了。

當一九二四年年底孫中山北上時，喊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並且具體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從南到北，到處發出了人民同情的響應和行動上的配合。帝國主義列強這時便一方面向北京政府辦交道，『承認』段祺瑞執政，但要他正式表示尊重不平等條約，於是段政府發表『外崇國信』的聲明，不啻是給入京的孫中山以迎頭一棒；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又正面向孫中山作裸骨的叫囂。當孫中山過上海時，上海『租界』上西文報紙是這樣地歡迎他的：美國人的『大陸報』提出三點：一、快趕孫中山出上海，不許他在

上海過冬；二、絕不理會孫所提廢止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三、不能廢除不平等條約，因爲中國還有『內亂』。

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畢露無遺。在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對立形勢已到十分緊張的時候，帝國主義公開鎮壓中國革命，並暗中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的佈置也愈來愈積極了。——這就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爆發前夕的形勢。

㈠ H.O.Chapm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27,P.42

㈡ Lat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P.132

㈢ 『總理全集』上卷，宣言，頁四二。

㈣㈤『總理全集』下卷，演講，頁六二，頁六六。

六 『總理全集』下卷，宣言，頁五八。

㈦㈧『嚮導』週報八十二期（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㈨ 上海『大陸報』九月九日所載，轉引自『嚮導』八十二期。

尾語：未完成的故事

我們從一八四〇年開始，到這裏（一九二五年）已經八十五年。雖然八十五年中充滿了繁複的事變，但也可以說，我們只是講着一個故事，而且講到這裏，自然仍是一個未完成的故事。

以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慘案』所引起的反帝大運動開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捲起了巨大風暴，使得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强一時相顧失色，但是如我們所已看到的，他們在這風暴前並不是毫無準備的。——恐嚇與收買的詭計加緊進行着，目的是爲了破壞中國革命，破壞中國人民解放事業。

拿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五——二七年這三個各有特色的革命時期看一下，可以發現很有意義的對照。這三個時期，在中國都是革命與反革命，進步勢力與倒退勢力相對抗的時期。抱着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者在三個時期的基本立

場都是破壞中國革命，阻止中國的進步，而扶持一個反革命的和倒退的勢力。他們在每一時期的革命形勢剛展開而獲得優勢時都會表示出僞裝的『中立』，且向革命方面表示『好意』；而在『中立』和『好意』的煙幕之下進行其陰謀。陰謀的具體做法則又在每一個時期不同。

在太平天國時期，如我們所已分析的，列强各國是以『中立』的姿態向反動政府勒索，在勒索到所需要的一切後就公開地直接地幫助反動政府來壓倒革命風潮，而使這反動政府能照原樣地繼存下去。

在辛亥革命時期，我們也已討論過，帝國主義者是以『中立』的表示來痲痺革命陣營，使之相信他已捨棄反動的『壞政府』；同時他就從反動陣營中選出一個他所認爲『强』的人穿上一件新衣來代替舊的政府，以繼續保持反動的統治秩序而壓倒革命風潮。

到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在武裝了的中國人民的鋒芒面前，帝國主義者也曾一時裝得是十分『老實』，好像要他承認中國革命的勝利也並不是

不可能的；而且似乎他的確已對那許多北洋軍閥不再存什麼希望了。但實際上，他却是很巧妙地利用了革命中的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繼續加以恐嚇和收買；於是他就從革命陣營中間找出他所能滿意的分子，代替舊軍閥做新的統治者，以新的面目維持舊的統治秩序而壓倒革命風潮。

帝國主義者的三次的做法各各不同，但其方向與目標是一致的，其狠毒與陰險也是一致的。具體做法之所以不同是由於中國的革命力量與反動力量之對比形勢的不同而來，也是由於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的不同而來。革命力量越佔有利形勢，人民的覺悟程度越高，帝國主義者爲達到其目標所用的手段也就愈加狠毒，愈加陰險了。但是這種手段究竟只能一時地使帝國主義者得到表面的勝利，——結果，狠毒更造成中國人民的敵意，陰險更鍛鍊了中國人民的辨識力。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失敗了，但是這個『故事』還是沒有『完成』。

從一九二七年以後，又是整整二十年過去了，這個『故事』也還是沒有『完成』。

這『故事』將如何才算是『完成』呢？不用說得，只有這樣的兩種情形中的任一種出現了時，才好算是告一段落。

一種情形是，帝國主義者支持着他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統一』了中國，達到了殖民地化中國的結果。

又一種情形是，中國的人民大衆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連根拔除一切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利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勢力，達到了中國獨立，中國人民解放的目的。

貫串在我們所已經討論過的八十五年內的『故事』中的中心環節，就是爲了決定到底是那一種結果——是這一個結果呢還是那一個結果——的鬥爭。近二十年來這一個『故事』還是在繼續着，也就是說，這一個鬥爭還是在繼續着，而且是一天天地更加尖銳了。

如果說，在前八十五年中的事實，至少可以表明，帝國主義者雖然用盡了心機，但總歸達不到他們所企求的目的；那麼，到了近二十年中的事實，就進一步表明了帝國主義者要阻止中國人民實現其所企望的目的是絕對不可能的。整個的『故事』的結果將是什麼，到現在已經像太陽一樣地明朗：中國人民能够戰勝帝國主義者而得到勝利，『完成』這故事的必然的『結果』將是這一個而決不是別的！

雖是這樣，但這個惟一的必然的『結果』是要靠中國人民大衆用他們的聰敏智力，用他們的奮鬥努力，用他們的血才能寫出來的。就是在我們所生活着的今天，中國人民正在用血寫着這一個歷史的必然結論，在這時候，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的道路并不是沒有意義的。

只從我們所討論了的八十五年的歷史，歸結起來，至少有下列幾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第一、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傳統的紀錄并不比任何別的帝國主義國家較爲

光榮一點。環繞着中國實施侵略的，曾經有着好些帝國主義國家，其中，英帝國主義在由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的五十多年間居於領頭地位，但至一八九四年後，日本帝國主義已開始成爲侵華的急先鋒，至一八九九年後，美帝國主義也在『門戶開放政策』的掩護下急起直追。由此以後，美日之間爲爭奪在華霸權的鬥爭在若干年間一直是繼續不絕。如果說，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因爲既狠毒，又陰險，十分突出，所以長期間被中國人民視爲第一號敵人；那麼美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向來是在陰險的外貌下藏着狠惡，所以尤其是狡詐的能手。

第二、帝國主義者向來總以爲有權利爲中國選擇『合適』的統治者及其統治的方式，但不論是那一個帝國主義者所選中的，也不論所選中的是誰，既是帝國主義者所選出的，就一定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點是十分明白的。爲了應付覺悟了的人民，帝國主義者曾經努力把他們所選中的對象由『舊人』變成『新人』，例如各帝國主義者共同推出袁世凱代替滿清，又如美帝國主義推出曹吳來代替段祺瑞，但中國人民每一次都能看出，帝國主義者所喜歡的人不管他穿什麼衣服，

裝什麼打扮，說什麼話，終歸是同一流的角色。

第三、對於這一個帝國主義或那一個帝國主義，對於帝國主義所選出這一個人物或那一個人物，如果寄以希望，寓以幻想，那就會對於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造成嚴重的損害，——這是幾十年來用血換得的慘痛教訓。戊戌政變中的維新志士們，辛亥革命中的有些革命領袖們都曾經有過這種幻想，更不用說自辛亥革命以來的一切改良主義者和買辦氣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們了。歷史給了中國人民以這樣的教訓，如果不去和這種幻想鬥爭，反而沾染上這種幻想，人民的解放鬥爭的徹底勝利就是不能設想的。

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而鬥爭，這個鬥爭能夠勝利，到現在還有什麼可疑呢？是一點也沒有疑問了。中國人民能夠從過去的歷史教訓和當前的實際鬥爭中學得更聰敏，鍛鍊得更有力，能夠和敢於取得徹底的勝利，那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了。於是在這一本小書裏所紀述的故事也才達到了牠最後

的應有的結束。

這本書暫時到此告一段落；但我們在實踐中爲「完成」這個「故事」而進行的最後一戰是正在展開着。